

目 录

抗战时期的女司令
——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奇俊峰
.....宝音乌力吉 (1)

达王在兰州的七年软禁生涯
.....辛文秀、张宏达 (83)

乌拉特中公旗地方武装力量的演变过程
.....韩葆口述，包瑞峰、那顺巴
牙尔、山都记录整理 (96)

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
.....孔祥毅 (115)

旅蒙商公集成
.....张晋仁 (129)

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情况
.....王廷英 (138)

两个班第喇嘛与旅蒙商的斗争
.....巴图乌力吉撰写
达瓦桑布整理 (144)

三公旗小学
.....宋布尔巴图 (160)

刘笃仁与私立河套中学	李俊 (175)
忆河套私塾概况	康兴恒 (195)
普爱中学始末	宋培让 (204)
一九四二年河套地区发生的鼠疫	王龙胜 (211)
阎锡山在河套军垦	苏希贤 (227)
解放前后绥远省农业改进所概况	周汝治 (279)

抗战时期的女司令

——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奇俊峰

宝音乌力吉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如火如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当时绥远省乌兰察布盟茂明安旗额王福晋（夫人）额仁庆达赖，乌拉特东公旗额王福晋巴云英和乌拉特西公旗石王福晋札萨克诺颜奇俊峰，率领本旗的蒙汉各族人民，奋起抗日，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特别是年仅二十三岁的奇俊峰，她不顾旗内亲日势力的重重阻挠，反对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为首的伪蒙疆政府的控制，威胁，毅然决然地冲出了敌伪占领区投奔了傅作义将军，并坚

定地站在抗日救国的一边，成为轰动全国的一位少数民族的巾帼英雄。

奇俊峰在人世间仅仅活了三十二个春秋，最后竟死在一小撮亲日派势力和国民党特务手里。算来奇俊峰执政期不到十年，但从她的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是一位有胆识、有作为、热心爱国、英勇反帝的女英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得的一位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尤其是位女性。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奇俊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讲，因她生长的时代，正处在蒙旗上层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环境中，因而，决定了她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没有这样那样的过失是不可能的，甚至重大的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奇俊峰和她的阿哥（王子的称呼）同时遭难。奇俊峰的死，一方面充分暴露了反动的王公制度的残忍和野蛮；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奇俊峰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根据搜集到的有关史料和一些同志们提供的奇俊峰的生平经历和贡献，以及被害经过等情况，我整理成《抗战时期的女司令——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奇俊峰》一文，用以纪念这位蒙古族女英雄。在文中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漏和

错误，希望知情者予以指正。

一、她生于封建贵族家庭

一九一一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此，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一百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结束。但在蒙旗却率由旧章，统治蒙旗的封建王公制度未变。

中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奇俊峰出生于阿拉善和硕特旗王府所在地定远营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里。祖父嘉伦春旺吉勒，系阿拉善旗第九代世袭亲王札萨克塔旺布理甲拉的堂弟。嘉伦春旺吉勒有三个儿子：长子齐木爱林岑，次子恩克补音，三子德沁伊钦诺日布。奇俊峰是德钦伊沁诺日布的二女儿。其母姓薄，名德那欲夏，满族人。奇俊峰幼名平格，蒙古名色布勒玛，在兄弟姐妹六人中排行老二。上有姐姐罗雪琴，下有弟弟罗景瑞、罗凤阁，罗凤翔（卓力克），妹妹罗爱兰。

德钦伊沁诺日布，又名德毅忱，人称“小三爷”。他精通蒙汉两种文字。并擅长绘画，是当时闻名于阿拉善旗的文人秀士。他做过副梅林章

京、副管旗章京等职务，并在正管旗章京休假期间，受王爷、协理的委托，代管过全旗的行政、司法事宜。德钦伊沁诺日布、虽然出身于封建贵族世家，但很少有王公贵族的纨绔习气，他经常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并特别厌恶和反对一小撮王公统治者对劳苦大众实行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我国各地，由于进步思想得到了迅速传播，这给德钦伊沁诺日布的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为了顺应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潮流，决心推倒阿拉善旗封建王公的统治，以开创在蒙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例。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农历三月三日，在冯玉祥、吉鸿昌等爱国将领的有力支持下，德钦伊沁诺日布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推翻阿拉善旗王公统治阶级的武装暴动，并一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阿拉善旗建立了革命政权。为蒙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树立了先声。这便是阿拉善旗历史上著名的“小三爷”事件。

在革命党人的影响和指导下，阿拉善旗的革命政权一经成立，就宣告了代表封建制度的塔王政权已被推翻，并通告全旗各族人民，从此废除王公制度，建立民主、平等、自由的革命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三月六日，在定远营举行的庆祝革命胜利大会上，德被各族劳动

群众推选为旗政务委员会主任，兼任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军司令官。不料，时隔不久，国民革命运动便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局面，由于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在这种形势下，阿拉善旗新生的革命政权，因为失去了革命军的支持，加之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夺取政权以后的管理经验，因而，给被废除的塔旺布日格甲拉亲王以抓紧武装准备反攻的时间，为王公统治阶级重新登台造成了可乘之机。塔旺布日格甲拉在国民党右派的武力帮助下，重新集结队伍，以屯兵压阵之势大举进攻定远营，向革命势力进行了疯狂的反扑。阿拉善旗新生的革命政权，经过七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失败后的德钦伊沁诺日布，当即携带家属离开了阿拉善旗，先后避居于银川、五原等地，经过三年来的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饱受了灾难，但后来他还是没有逃脱掉敌人的魔掌。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在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被塔王的心腹人员发现并向塔王报告。塔王立即派出密探捕捉德钦伊沁诺日布。密探们一直追踪到归绥城（今呼和浩特）才将其逮捕。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阿拉善旗王府以所谓“叛变头子”的罪名，把德钦伊沁诺日布判处无期徒刑。在流

放中，他受尽了折磨和凌辱，身体极端衰弱，最后惨死在阿旗南部察汗郭勒庙上。在同一个时间内，反动分子们，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卑鄙目的，在古奈郭勒，将其年仅十四岁的长子罗景瑞在阿旗吉日乃湖防卡予以枪杀。

父亲德钦伊沁诺日布，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壮举，在幼年奇俊峰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对她后来积极走向抗日救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据和奇俊峰生前一起共过事的人们介绍，每当她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时，便对周围的人们讲述她父亲和弟弟被一小撮王公惨杀的不幸遭遇，这时，她便对封建统治者流露出一种切齿的痛恨，表示她终有一天要为自己的亲人报仇雪恨。

二、少年时代

奇俊峰的少年时代，是在她姑母家庭中渡过的。由于她姑母家生活富裕，属于贵族阶层，因而，她从小曾受过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熏陶。

奇俊峰的姑母名叫诺月朋，原是伊克昭盟达拉特旗西官府吐斯拉嘎其诺颜（协理）敖日卜巴图的夫人，家住在达拉特旗西官府西商（今五原境内）。她们家里，拥有已开垦的数十顷上等好地和成千上万头只的牛羊。不幸的是敖日卜巴图

因病早逝，诺月朋守寡多年。她虽然生过一个儿子，但因被疯狗咬伤夭折。所以，她虽有掌管家财产的权力，可是由于自己没有亲生的儿女，经常受到丈夫家族中弟兄的诬蔑和诽谤，使她心中感到十分懊丧和悲痛。为此，她曾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回阿拉善旗定远营住娘家达半年之久。后来，诺月朋的父母劝其返婆家，她当时提出要把侄女平格（奇俊峰）带去作伴，否则不回。其父母无奈，在征得平格父母的同意后，答应了她的要求。此后，诺月朋把平格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她们俩人相依为命，共同生活，并用其丈夫的姓，给平格取汉名为奇俊峰。

诺月朋在多年的上层社会生活中，深感没有文化知识的苦恼和不便，于是她不惜代价，决心把奇俊峰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知识和有教养的人。在奇俊峰刚满七周岁时，诺月朋就从五原等地请来蒙汉两位私塾先生，作为女儿的家庭教师。及至奇俊峰长到十七、八岁时，她已经比较好地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文字。据和奇俊峰同时代的人回忆：奇俊峰天资聪明，记忆力强，学习刻苦，孜孜不倦，所以经常得到先生的夸奖。少年时代的奇俊峰，更是喜欢读历史和文艺书籍，每逢有人去五原或包头时，她总是向她姑母要钱，托人捎回些书籍来读。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将军在五原誓师，奇俊峰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马上向姑母要求去五原看看这种壮观场面，以开眼界。她的要求，被姑母拒绝了。她只好偷着让佣人跑到五原城，找回些革命军的传单来阅读，并给周围的人讲解国内发生的情况和变化。

由此不难看出，奇俊峰从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好学上进，追求真理的思想勇气，为她后来走向政治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婚姻

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妇女能够驾驭自己命运的人是为数不多的。特别是处在封建王公贵族和喇嘛宗教双重统治下的蒙古族女性更是如此。她们的婚姻，只能听天由命，由王公诺颜或家长去安排。在一般妇女中，有的在家长的逼迫下，让她同马桩子，扫地扫帚“结婚”，她们就得磕头结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个人的意愿和自由。当然，上层阶级的夫人、小姐属于例外，但她们的婚姻也是在家长的主持下，讲究“门当户对”，必须嫁给富贵人家的子弟做“贵夫人”，也没有个人的婚姻自由。

奇俊峰青年时代的爱情与婚姻，并没有逃脱出这样的结局。她在十八、九岁时，已出落成为

一个美貌出众的漂亮姑娘。她中等身材，满头黑发，有着一双晶莹的眼睛和温文尔雅的性格，接人待物热情大方，又加上有文化修养，精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因此，深得周围青年人的好感和爱慕。甚至她的姑母诺月朋，对自己养女的出类拔萃也感到无限欣慰和满足。每当她向别人谈起奇俊峰时，总是夸奖女儿的聪明和对老人的尊敬，并且赞不绝口。有次某人按照民族的礼节，拿来哈达和羊背子，提出来要为一个二等台吉（贵族）出身的青年男子说媒时，诺月朋不但拒受礼物，同时还明确答复对方，她的女儿要嫁也得嫁给有万贯家财，手握大权的台吉家族，这样一来，说媒的人只好扫兴而去。

奇俊峰一向听其养母的教诲，事事唯母命是从。但在爱情的问题上，她却和其他姑娘一样，有着自己的意愿和追求，并不想受养母的摆布。在奇俊峰读私塾时，有一个同学，姓奇，名安庆，年龄和她相仿。俩人在学习中，互帮互学，相互了解，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庆热烈地追求着奇俊峰，奇俊峰也了解安庆为人忠诚厚道，才华横溢，遂接受了他的爱情，俩人私下订立了海誓山盟，表示共偕白首，永不变心。但是，封建思想较为顽固的诺月朋，对青年人的自由婚姻，她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丑

事，从而对她们的婚姻进行百般反对和阻挠。为了拆散这门亲事，诺月朋以奇家门第不能相互通婚为由，把奇安庆赶出了西官府，让其回家放牧。但被爱情之神深深迷住了的这对恋人，他们并不因此罢休，尽管不能相见，可是他们俩人之间还是偷着书信往来，以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但抱住封建僵尸不放，被金钱、权势迷住心窍的诺月朋，既使在睡梦中，她迷向往着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权贵人物。因此，她四处托人为女儿寻找合乎她所要求的人选。说来事也凑巧，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身居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诺颜的石拉布多尔济（人称石王），继札萨克位已有八年之久，他连娶了两位福晋，但她们宛如石田一块，都没有生育子女。正当石王为子嗣后代着急之时，得知诺月朋家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尚待家闺中，便派人带上贵重的礼物，前往达拉特旗西官府奇家求婚。石王的求婚，正符合诺月朋的心愿，她不顾女儿的坚决反对，婚事一说就妥。诺月朋竟答应把养女嫁给一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石拉布多尔吉诺颜，做他的第三位福晋。在订婚当中，诺月朋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她离不开女儿，将来要随女儿住到王府。石王在达到能娶奇俊峰这样漂亮姑娘为妻的目的后，对这样的条件当然马上接受。于是立即

派人允许了诺月朋的要求。

奇俊峰虽然深深地爱着奇安庆，但是她也深知封建家教的无情，不敢公然反对与石王的婚姻关系，只好同安庆暗中取得联系，俩人商定，必须设法使奇俊峰同诺月朋脱离养女关系，才能解除与石王的婚约。于是，奇俊峰乘夜逃离了西官府，跑到五原城内，找到了正在避难的母亲德郭欲夏。在生母面前，奇峰俊表示不愿承认诺月朋为养母，并要求生母为她和安庆的婚姻作主。德郭欲夏疼爱自己的亲生骨肉，也表示反对这项包办婚姻，同意女儿嫁给安庆，为此，她曾托人在五原城内找到一处房子，为奇俊峰作新房，准备与安庆结婚。此事不久，就被诺月朋知道了，她当即亲自带上人员赶到五原城，来找德郭欲夏的麻烦。德当时身处逆境，自身尚且难保，又哪能出头保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最后诺月明强行将奇俊峰带回西商。过了不多几天，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诺月朋便把奇俊峰嫁到了乌拉特西公旗，做了石王的福晋。

昔日，王公的婚礼非同一般。新郎头戴红，顶花翎，身着蟒袍补褂；新娘戴的是珍珠玛瑙，金银首饰，坐的是上等抬轿，前呼后拥，住的是豪华宫殿，五颜六色。婚礼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这样豪华和奢侈的婚礼上，奇俊峰如坠陷

井，如坐针毡。她深知过去所向往的爱情，已经变为泡影，烟飞云散。自己已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为落入虎口的牺牲品。因此，她悲愤、绝望，痛不欲生。

为了达到与爱人重新结合的目的，婚后，奇俊峰曾密约奇安庆一同逃往北京。但事机不密，被诺月朋和石王所侦知，他们在包头火车站用武力强行将奇俊峰截回，致使他们的愿望又一次破灭了。种种不幸的遭遇，使奇俊峰开始相信了命运，她认为她的不幸都是上天的安排和命中注定的。

四、你争我夺

三十年代中期，是乌拉特西公旗上层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互相残杀，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悲惨年代。由于长期的动乱，给予广大蒙古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从石拉布多尔济登上札萨克的宝座以后，西公旗内部王公贵族，喇嘛宗教各派之间的斗争，一时有所收敛，一度出现过两、三年的平静状态，劳动人民也过了几天的安宁的日子。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的日趋激化，西公旗内部的斗争，也愈加显露出来。这种情况，对石王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被石王废除了的

前东官府吐斯拉嘎（协理）要职的额尔贺多尔济（汉名额宝斋），他竭力拉拢曾经公开反对过石拉布多尔济当札萨克的公庙子大喇嘛依西达格丹和不满石王向寺庙征税的梅力更庙活佛喇嘛等人，他们串通起来，倒向百灵庙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蒙政会。这一伙人联合起来拒绝接受石王的领导，并进行公开的抗争。

在奇俊峰嫁到石王府的时候，西公旗上层之间的相互残杀序幕已经拉开。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冬，额宝斋之长子曼头（东官府卫兵队长），因与石王第二福晋花儿发生奸情关系，引起了石额双方的军事冲突。在交战中，额宝斋被打败，他所有的牛、羊及金银财宝全部被石王没收。额当时走投无路，只好带领妻子儿女暂时躲在公庙子依西达格丹喇嘛的府第。及至蒙政会在百灵庙宣布成立之后，他和依西达格丹俩人，于民国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骑马前往达尔罕贝勒旗的百灵庙。在百灵庙，他们谒见了依附于日本的伪蒙政会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会见时，他一面向德王报告了西公旗的情况，并罗织罪名告了石拉布多尔济的状；一面代表所谓西公旗的全体贵族上层和人民，表示接受蒙政会的领导，要求蒙政会过问西公旗的事务。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德王在西公旗王公贵族中

的忠实代表。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夏末，为了消灭额、依等反对势力，石王曾经请求过阎锡山的十九路军军长，当时任包头城防司令的王靖国，派兵协助作战。当时王靖国派出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会同石王的武装，对公庙子大喇嘛府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那时，公庙子府中额、依的兵不足百人，但还是顽强抵抗了三天三夜。最后终因兵力过于悬殊而放弃了公庙子府。额、依等人连夜逃往杭锦旗塔奔萨拉一带，才勉强得以生存。这一仗，使反对石王的势力从根本上受到了摧毁。额、依及其残部无法在旗内继续立脚，只能逃遁在伊盟地区和百灵庙一带活动，并抓紧时机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以图再战，同时，还求救于德王派兵助战，以便对石王进行报复。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农历五月初，德王派出三部汽车，一个连的兵力，二百余支枪和大量弹药，还配备一部电台，在连长霍仁尼格的率领下，来西公旗驻扎。霍连在开进西公旗后，分别驻于梅力更庙和呼和宝力格一带。与此同时，大喇嘛依西达格丹也在黄河南边、伊盟境内大肆招兵。他们经过充分准备后，又借助伪蒙军的力量，开始向石王发起了进攻。他们原计划先干掉石王的管旗章京满海及其部队，然后进攻

石王。但事与愿违，当时他们没有抓住满海，结果是打死了满海之弟官布夫妇二人。在他们还未来得及进攻王府之际，石王早已闻讯逃到包头，向绥远省主席求援。傅作义主席当即命令驻在包头的补充一团一部兵力和驻五原的七十二师侯振德团的人马，星夜从东西两头驰援石王。在这两部分部队的东西夹攻下，战局形势急转直下，伪蒙军连长霍仁尼格率领全部队伍向后山退却，额宝斋部队的连长协日莫格和梅力更庙活佛部队率队军官洪格尔也纷纷出逃，唯有公庙大喇嘛依西达格丹和他的部队没能逃出包围圈，被拦截在公庙子附近，双方在相持几个小时之后，终于造成了大喇嘛和他的侄儿巴图巴雅尔以及刚满十岁的孙子一起惨遭杀害的悲剧，而其所属部队也被全部歼灭。

经此一战，乌拉特西公旗统治阶级内部延续三年多的互相仇杀的闹剧，以依西达格丹大喇嘛被杀而告一段落。从此，石王政权从飘摇不定之中，走向了相对稳定，敌对势力开始瓦解。额宝斋等人纷纷离旗，逃之夭夭。额本人隐居在百灵庙、归绥等地，一时消声匿迹；余部沙日莫格、洪格尔等人，参加了德王的伪蒙军。

由于战乱关系，奇俊峰婚后几年并未得到安宁和幸福，再加上石王喜欢花儿福晋，对她表示

冷漠、疏远，所以她住到达拉特旗官府娘家的时间多，很少回到西公旗石王身边。

五、石王之死

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冬，西公旗的石王政权，凭借国民党的武力，终于结束了王公贵族、宗教上层之间长达三年之久的相互残杀，全旗出现了暂时的平静。石拉布多尔济以“胜利者”的姿态，由旗政府所在地顿达高勒带着花儿福晋返回包头。经过几年的战乱生活，石王疲惫不堪，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和环境。另外，他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须牢固地投靠国民党，除此别无他路。为此，石王想方设法与王靖国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联络、周旋。在包期间，他曾举行过几次盛大宴会，并赠送过大量的金银财宝，鸦片烟土，以求得到国民党当政诸公的支持。在频繁的交往中，王靖国等人也都作了慷慨激昂的表态，愿作石王的坚强后盾，这使悬在石拉布多尔济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坚定了他对巩固政权的信心。

但是好景不长，外部的武装冲突刚刚趋于缓和，而家庭内部的纠纷又抬起头来，犹如一团乱麻，难分难解。原来使石王最感头疼的事情，是花儿福晋。花儿福晋除大烟瘾过甚外，还经常给

石王出难题，她絮絮叨叨地说丈夫不体贴她，另寻新欢，等等。一天，石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花儿吵了起来。当着女佣人的面，石王责骂她跟曼头胡搞，不要面皮等语。一向被石王宠得娇惯无比的花儿福晋，那堪受此刺激，在与石王吵嘴后，她几天不吃不喝，又哭又闹，弄得四邻不安，鸡犬不宁。石拉布多尔济原本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天天诵经念佛，祈求佛祖保佑，赐福降祥。有一天清早，他正在经房念经时，女佣人突然跑来报告说：“花儿福晋病倒在炕上，嘴里直吐白沫。”石王听后被惊呆了，他连忙呼人请来医生诊治。谁知花儿早把手上戴的两个金戒指吞在肚里，此时就是华陀在世，扁鹊复生。也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了。

花儿福晋是石拉布多尔济的掌上明珠。在他四个福晋中，是最受他宠爱的女人，也是王府中握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不想在他们俩人偶然发生争吵的情况下，结果导致了花儿吞金亡命，此时此刻，石王悔恨交加，他为失去花儿福晋悲痛欲绝。为了寄托对花儿福晋的哀思，石王为她举行了隆重的殡葬仪式。特买高级棺材，又请喇嘛念经，为了发送花儿，竟耗费了上千两银子。之后，石王把住在娘家的奇俊峰从查干淖尔（五原西）叫了回来，一块回到了三湖河敖特尔牧场。

这里是水草优美的牧场，放养着王府的数千头牛羊。过去每到夏秋两季，在牧场架起二十四个哈那（支撑蒙古包上顶的杆子）的两顶崭新蒙古包和数个普通蒙古包时，石王总是携带花儿福晋来这里住一个时期。自从花儿福晋不幸死亡后，石王受到的精神损失很大，饮食懒进，身体消瘦，已成病态。这次奇俊峰和石王来牧场，目的是，一边让他观赏牧场景色，振作精神；一边吃新鲜奶食补养身体。除此之外，还请喇嘛为他念《古热穆》经，祈求避邪降福，并买回昂贵的药品，为他精心医治病症。尽管如此，石王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日重一日，成天精神恍惚，胡言乱语，忽而高叫着花儿的名字，忽而又大喊着被他杀死的公庙子大喇嘛依西达格丹的名字。说什么大喇嘛携着铁绳要擒他去见阎王等一派胡话。后来石拉布多尔济竟致粒米不进，身体瘦得象柴禾棍一般。喇嘛念给他《古热穆》经不顶用，又请“古儒特木”喇嘛跳神，也不起作用。最后只好给他送“卓鲁格”（替死鬼）以求石王免于一死。于是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的九月初，请了几十个喇嘛，用黄油、莜面捏成面人，在击鼓、吹号的法器声中，喇嘛们整整念了七天经。及至第七天头上，强行给奴隶出身的牧民关其格穿上石王的补褂朝服，戴上了兰顶戴，一时

间，昔日的奴隶便成了穿戴豪华的“上层贵族”人物了。当关其格穿戴整齐后，又让他吃饱喝足，当他酩酊大醉时，人们随着喇嘛们的颂经声和雷鸣般的鼓号声，将关其格扶上石王的坐骑，由这匹马驮送关其格去代替石王向“阎王殿”报到。送过替死鬼后，人们满以为石王躲过了死神的灾难，从此以后可以安然无恙了。但谁能料到，在送“替死鬼”后不到七天的九月十五日凌晨，石王突然停止了呼吸，寿终正寝了。反之，关其格却活了下来。原来，在送替死鬼的那天午夜，他在大醉中从马身上掉下来，甩在了密林中。当他醒来时，除发现手脚受了点轻伤外，全身安然无恙，在惊异中又发现自己身上穿的是一套极为阔气的服装，他还为自己的幸运而感欣慰呢。由于他大难不死，自此以后，草原上的人们都称他是“命大的关其格”。

自从石拉布多尔济逝世后，在一时平静的西公旗政治舞台上，再次掀起了新的风云。忠于石王的那些上层贵族，吐斯拉嘎其，梅林章京等，忙于发讣告、备棺木，积极着手为石王筹办丧事。曾被石王革职的额宝斋等上层贵族中的在野派，认为时机已到，他们磨拳擦掌，四出串联，准备重新夺权。此时的奇俊峰已怀有身孕。她一面忙于料理丈夫的后事，一面观察当前的形势，

沉着而冷静的准备应付来自各方面的挑战。

六 初露头角

石拉布多尔济死后，依照蒙古民族的传统、礼节，全旗上下在三周内一律停止办理公务，集中全力办好丧事。至于札萨克职务的接替问题，要放在以后解决。但是，以额宝斋为代表的一小撮权欲熏心，野心勃勃的人，无暇顾到这些。他们经过一番策划，决定先从奇俊峰手中夺走旗府官印，以造成夺权事实。当时，他们满以为，只要把官印搞到手，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在石王死后的第二天，由管旗章京朝鲁门，参领贡其格巴自尔二人出头，顶冠束带，一同到王府公开向奇俊峰发难。他们以所谓的“为了旗内安定”作借口，提出要把旗官府印交给他们去管理。实际上这是逼迫奇俊峰交印。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寡妇的厉害。奇俊峰靠自己的敏感，早已意识到石王死了以后会遇到的麻烦。因此，她面对一小撮抢先夺权的阴谋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朝鲁门等人逼她交印时，奇当着众人的面，斥责他们是忘恩负义的东西，连一条看家狗都不如，在石王尸骨未寒之际，便逼我寡妇交印。并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是石王的福晋，有资格护理官印，而你们无权干

涉！”这样一来，朝鲁门，贡其格巴自尔，不仅没有达到夺印的目的，反而让奇俊峰骂得狗血喷头，灰溜溜地被赶出了王府。

在办理石王的丧礼方面，除请喇嘛念经七天外，九月二十八日为石王发丧。这一天来人之多，规模之大，声势之隆，都是空前的。全旗大小官员，各寺庙的喇嘛以及十二个苏木的代表，都庄严而肃穆地参加了石王的葬礼。之后，奇俊峰返回包头，积极筹办为石王在十月十日举行的追悼会。此间，她还亲自执笔撰写了一篇由旗吐斯拉嘎其（助理）沙格德尔扎布和管旗章京朝鲁门等带头，阴谋篡权的罪行录。为了防止一小撮人阴谋夺权，十月六日，她亲自携带这份材料去归绥，要求面见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次日，傅主席和绥远省蒙旗指导官石华岩，接见并听取了奇俊峰的汇报。她除汇报石王的逝世情况外，并着重报告了沙德格尔扎布等人，趁石王病故之际，纠合亲日势力，妄图抢先夺权，并列举了他们十条罪状。其内容大体是：1、人不问疾；2、不守礼法；3、不理丧事；4、索印欺凌；5、盗印；6、煽动部队哗变；7、谋杀；8、霸产；9、造谣；10、盗窃王府物品等。傅作义、石华岩在接见时，对奇俊峰给予亲切而热情的接待，他们除对石王的逝世表示慰问外，并敦嘱奇俊峰先

回去办好石王的追悼会，同时还答应选择适当的时机，由省府出面，对她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解决。

奇俊峰的绥远之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这次来绥远不仅让傅作义将军进一步了解到西公旗的种种内幕，同时也起到了奇俊峰自我介绍的重要作用。傅作义在听取了她的汇报时，连连点头，并非常赞赏她的口才。会后还夸奖奇俊峰：“是一位很不简单的年轻女人。”

按预定日期，石王的追悼会在包头的西公旗驻包办事处举行。参加追悼会的人员，除来自本旗的贵族上层，宗教界人士外，包头方面的国民党党、政、军头目以及一些商业界人士也来了不少。追悼会结束后，来宾们一一同奇俊峰握手，表示吊唁、慰问。在历史上西公旗历任札萨克诺颜去世后，能举行如此规模的追悼会，还未有先例。它不仅极大的提高了石拉布多尔济生前的身份，并对石王的反对势力也构成了威胁，同时还为以后奇俊峰登上政治舞台，站稳脚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七、调停

“乌拉特西公旗哟，麻烦成堆，
日后如何熬呀，由谁先知？”

“柳林里的雀鸟自由飞翔，
老百姓的苦难，由谁拯救？”

这两首歌谣，是三十年代乌拉特西公旗的真实写照。

在旗札萨克石王死亡以后，西公旗的大权究竟落入谁的手中？在人们的心目中笼罩着一层阴影。这时，以原旗大协理额宝斋为代表的一小撮亲日势力，他们既不希望将札萨克大权移交给别人，更不会同意由奇俊峰来接替札萨克职务。当札萨克死后的第二天，他们便开始夺权，但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在第一个回合中，便遭到了失败。他们恫吓威逼奇福晋，不但没有迫使她交出官印，反而招来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对她的支持和赏识，这给他们的篡权阴谋造成了更大的障碍。为阻止奇俊峰掌握权力，他们又变换了新的手法，在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后，便从奇福晋的腹中胎儿开刀了。不久，社会上便传出各种议论，有的说：“石王病成那个样子，哪有精力使奇俊峰怀孩子？”甚至有人还公开地声称：“我亲眼看到了奇福晋每天用长白布裹肚子。”这些言论的焦点，都集中在孩子身上，言下之意，奇俊峰并没有怀孩子，她的身孕是伪装的。有的议论更为离奇，他们说，奇俊峰即便怀上了孩子，也不是石王的。就是将来生的是男孩子，也无权接替

札萨克之位。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一时遍及全旗的每个角落，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在对立派公开提出夺权的时候，奇俊峰并不畏惧，还与之进行义正辞严的坚决斗争；可编造出这一大堆离奇古怪的谣言来，对她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时，使她感到巨大的压力，竟气得昏死了过去。但对谣言的传播她无法阻止，她既无惩治别人的权利，又不能堵住人家的嘴，只好听之任之。其养母诺月朋原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铁腕人物，在石王死后短短几个月内，西公旗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急剧变化，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作为石王遗孀的奇俊峰，已经从家庭的从属地位，被推到了权力的风口浪尖上，随时都有被强大的政治洪流所吞噬的危险，自己必须出面妥为保护，才能绕过暗礁险滩，化险为夷。为此，诺月朋亲自出马，带领奇俊峰直赴乌拉特中公旗，晋见了乌兰察布盟盟长兼旗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林王）。母女二人一边向林王诉说奇俊峰所怀身孕，确系石王的后代；一边又要求林王多加过问西公旗的事情和保证奇俊峰及未出生婴儿的人身安全。林沁僧格札萨克对诺月朋母女二人长途跋涉，不辞辛苦前来拜见，非常高兴。她们在中公旗王府的两天里，林王亲自设宴招待了她们，并表示全力支持石王生前的主张。他还主动提出

来，要与绥远省主席通话，让省方也过问西公旗的问题。最后他一再嘱咐奇俊峰要好好保护腹中的胎儿，并开玩笑说：“你一定要生个胖儿子，好接替石王的伟业。”奇俊峰对此特别高兴，连声说道：“多谢林王的大恩大德！”林沁僧格身居盟、旗要职，他的干脆利索的表态，使诺月朋母女放下心来。她们随即返回包头驻地，着手做奇俊峰的产前准备工作。时隔不久，绥远省政府通知奇俊峰和西公旗管旗章京朝鲁门去归绥城，由省府出面调解西公旗所发生的矛盾。奇俊峰在接到通知后，经过一番准备，由诺月朋陪她到了省城。在调解开始之前，傅作义将军曾单独的召见了奇俊峰，然后并由高葛光给她简单的交了这次调解工作的底。接着在有绥远省长官公署参赞石华岩，省府蒙务组长陈雨甲，乌盟盟长林沁僧格的代表那木吉勒其仁及奇俊峰、朝鲁门等十余人的参加下，开始进行了正式的调解。在会上，奇俊峰和朝鲁门双方各叙各的理由，并提出了各自的调解条件。在这次调解会议上，奇夫人用大量事实愤怒的揭露了沙克德尔扎布等人逼她交印，掠夺财产和造谣中伤等种种问题。由于证据确凿，无可抵赖，使得朝鲁门感到非常难堪。当着石华岩等高级官员的面，他不得不承认了一些错误，表示今后悔改，坚决服从调解决定。这次

调解会议为时仅半天。会上，就西公旗问题，做出了以下七条决定：

1、东西协理分别由沙格德尔扎布，色冷保充任。

2、新印系国民政府颁发，由旗政府保管，旧印系清王朝颁发，仍由奇俊峰保护供奉。

3、石王遗留的财产，全部归奇俊峰，公款则归旗府。

4、护路、水草、抓羊等捐税的收入归奇俊峰。

5、奇俊峰之安全，由全旗仕官负责保护，不准压迫，遇事仍需协商。

6、奇俊峰遗腹孕，如所生系男，正式袭位。

7、护路队归奇俊峰直接领导。

这七条决定，以绥远省政府的决议案形式，下发各个蒙旗。决定中，虽然让沙格德尔扎布继续充任要职，使其掌管一部分权力，但也充分肯定了奇俊峰的实力地位。其中，除给她指挥护路队的军权外，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她腹中胎儿是石王后代。“如果所生系男”，便令合理合法的接替其父的札萨克职位。这项规定对奇俊峰来说，是再重要不过的了。不过奇福晋腹中怀的是男？是女？尚属哑谜。是男，将来无疑继承父位；是

女，那就由别人去接替礼萨克职位了。这是王公世袭制度历来的惯例。为此，奇夫人简直得了“想儿病”。常常在夜里梦见自己怀的是男孩。有时叫醒养母，告诉自己的梦境，母女俩人都对此笑个不停，并起身给佛爷烧香叩头，乞求佛祖开恩，保佑早生贵子。

八、得子

阳春三月，满山遍野的山楂树、野樱桃、杏树，开出红的、白的、粉的、淡青的、蓝的花朵，真是一片迷人的景色。

奇俊峰的产期，快要临近了。西官府协理色冷保之妻满都尔玛，受命负责看护奇夫人坐月子。她为做好产前准备，跑前跑后，很是辛苦。而奇夫子的贴身女奴乌云格日勒、敖登格日勒二人，既给孩子缝衣，又收拾产房，昼夜不停地忙碌着。

经过两天多的阵痛，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凌晨，奇夫人终于安全的分娩了。婴儿一落地便放出“哇哇”的哭声。此时此刻，奇夫人忘记了自己难忍的疼痛，一心关注的则是婴儿的性别。她开口第一句话就问：“生了个什么？”口齿伶俐的满都尔玛，立即向夫人报喜说：“夫人大喜！生了个胖小子。”这句

话好比从天上给奇俊峰降下来的福音。当时，她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立即把头歪过去看到婴儿确为男孩子后，才真正相信这是事实。当时，她第一次体会到了做母亲的幸福和欢乐。其养母诺月朋更为自己的女儿有了儿子，高兴得脚不着地。她东跑一阵子，西跑一阵子。时而跪拜在佛象前烧香叩头，求佛祖保佑；时而跪在屋外，给已故的女婿烧纸，请石王在天之灵庇护幼儿。这时母女两代人，都感到能为石王家族养育后代，而分外高兴。

没过多久，福晋生子消息逐渐传开。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全旗人民都知道了奇福晋给石王生下了个阿哥。有不少牧民为此而高兴欢腾。他们认为，已故的札萨克石王总算是后继有人了，西公旗再也不能为旗内无主而忧愁了。与此同时，在一些阴暗角落里，一张接一张的传单在悄悄地散布于各个苏木之中。传单上写着什么：“奇福晋生孩子，完全是一个骗局。她为了蒙蔽全旗百姓，事先从包头一个姓田的农民家里抱回了刚出生的男婴，伪装成自己所生。”并告诫旗人“不要上奇福晋的当！”一件事情，两种宣传，使得不少的人一时感到惶惑或费解，他们半信半疑，无所是从。奇福晋认为这是有人故意造谣惑众，意在挑拨离间。她当即通过色冷保，

沙格德尔扎布两位协理，向全旗发出通告，在通告中明确告诉全旗人民，已故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的阿哥已经出生。并号召各界人士以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挑拨离间。通告中还要求全旗人民在旗王府的领导下，搞好全旗上下的团结。随之，也把王子出生的情况写成报告，专程派人到省府和乌兰察布盟呈报备案，以使上边及时了解真情，不受蒙蔽。

月子里，孩子长的既白又胖。为了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奇俊峰特意邀请了乌日吐高勒庙活佛喇嘛劳布僧丹壁扎拉森，给小孩取名。他翻遍了《阿拉坦甘珠尔》经说，佛祖恩赐给小王爷的名子叫“阿拉坦敖其尔”，从此，小王爷的名字被称为阿拉坦敖其尔。以后，又起汉名叫奇法武。在四月十五日满月的这一天，劳布僧丹壁扎拉森活佛大喇嘛来府祝贺满月，并在阿拉坦敖其尔洗脸时念了《吉萨》经。其后，他每个月的初一，都要亲自来给王子念《吉萨》。因此，人们称这位活佛喇嘛是：“小王爷的吉萨喇嘛。”

小王爷过百岁，热闹极了。由色冷保，沙格德尔扎布等主持筹办了隆重的庆典。参加庆典的除有本旗官员外，还有包头各界的有关人士。他们热烈祝贺小王子的降生，并祝他一生吉祥如意。

意，长命百岁。同一天还搭灵棚，设牌位，重祭石王的灵魂。在石王的遗像前摆了整羊、砖茶、瓶酒等各种祭品，点燃了香烛和佛灯，在隆重的祭祀仪式上，奇俊峰向石王表示了业已生子，事业后继有人的话，用以告慰石王的在天之灵。

当年八月份，奇俊峰带着王子阿拉坦敖其尔回到了顿达高勒王府中。从此预示着奇俊峰将要登上西公旗的政治舞台，开始掌握权力。

九、执政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草原上秋色诱人，牧草茂盛、牛羊肥壮，牧区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去包头接奇俊峰和王子回顿达高勒王府的马车，装饰的异常漂亮。这次奇福晋母子回府并没有兴师动众，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但是，东西官府的两协理，大小梅林、扎兰都纷纷出来，热烈地迎接了奇俊峰母子俩人，场面显得庄重而体面。

今昔相比，奇俊峰的地位确实大不一样了。现在她既是旗札萨克石王的遗孀，又是石王四个福晋中，唯一生出儿子的女人。因此，奇俊峰已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了。尤其是现在她从一个贵夫人，一跃而成为执掌军政权力的旗札萨克，成为全旗的统治者。这不能不说是奇俊峰在

政治上的一次大飞跃。

当“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肆进犯华北地区。迫于日寇武装压力和受所谓“兴蒙”宣传的欺骗，一些蒙旗中的王公上层，他们出卖民族利益，纷纷倒向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充当了蒙奸。但是，奇俊峰出自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不向日寇屈膝投降，坚定地站在抗日一边。她组织和领导全旗人民，积极投入御侮救亡的斗争中。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奇俊峰首先召集本旗军、政要员，重申施政纲领，明确地宣布：一、坚决接受绥远省政府的领导，反对德王在百灵庙组织所谓的“蒙政会”。二、要团结一致，提防坏人的挑拨离间。三、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允许向牧民乱搞摊派。四、军队要守纪律，严禁抢夺民财和侮辱妇女。奇俊峰这一深明大义，荣辱分明的决策，受到了有关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也使全旗人民受到了很大鼓舞。从而出现了和平向上的新局面。此时，有些过去曾与石王政权作过对的人，看到了形势的转变，也主动放弃了过去的敌意，要求重归于好。如：投奔德王的伪蒙政权的额宝斋，从归绥派参事梅林章京焦太保前来向奇俊峰表示愿“捐弃前嫌、和平共处。”奇俊峰对额宝斋的要求不但不加谴责，而且表示欢迎。她请焦太保捎话给额宝斋说：“只

要他返旗，西公旗是不会埋没他的。一定根据他过去所作的工作和功劳给他安置恰当的职务。”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奇俊峰的宽宏大量和以事业为重的英明姿态。其后，额宝斋的长子曼头和三子巴雅尔吐，也从在日本操纵下的伪蒙军中逃出，投奔了奇俊峰。她也同样以诚心相待，表示欢迎他们返回家乡，共同抗日。但后来他们兄弟二人不听奇俊峰的劝阻，离开了西公旗，不幸在杭锦旗境内遭到土匪二黑眼阴谋杀害。除此之外，奇福晋还与共产党的抗日部队有过接触，并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有一天下午，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山里要见奇俊峰。当时，奇俊峰并不知道这是通过内线取得联系而来的——中滩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负责人于占彪。当于同志拿出两边印有蒙汉两种文字写的：“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传单后，她便明白了这是位共产党派来作抗日工作的同志。于是，便把于占彪同志作为上宾，接在内室，详细听取了共产党关于抗日的方针政策和介绍的全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当天晚上，她为于占彪同志摆了全羊席，完全用蒙古民族的传统礼节进行招待。在她同于同志的短短半天的接触中，奇俊峰受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并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为此，她坚定地表示要

和共产党密切配合，为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作出积极贡献，并保证以实际行动发展和维护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在他们分手时，还互相赠送了礼品，于占彪赠送给奇俊峰手枪一支，奇俊峰回赠了带全副马鞍的骏马一匹。随后，奇俊峰派出自己的贴身卫兵护送于占彪返回驻地。

从此以后，奇俊峰经常与游击队有联系，与共产党人有接触，在长期交往中，她受的革命思想影响也越来越多，因而思想认识也在不断提高。这时，她的基本思想是倾向于拥护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她准备为早日从我国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积极的努力。后来她在参加抗日后，曾用实际行动，在国民党地区，解救和保护过党的地下工作者。

据其弟罗凤翔回忆：抗日期间，奇俊峰在陕坝除通过别人与当时担任《奋斗日报》的总编辑崔载之等人有过经常联系外，并在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还亲自出面营救过党的地下工作者汪振栋，（蒙族，解放后，曾任伊盟蒙政会教育处长）。汪原是从苏联莫斯科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归国后因暴露了身份，被傅作义下令逮捕，并准备将他执行枪决。此时，任杭锦旗小学校长的郭振声（蒙族）跑来求救。奇俊峰闻讯后，她不

顾嫌疑，不畏艰险，毅然担负起这副重担。经她向国民党第八战区军法处长刘某，送了巨额银元后，才与李隽卿（她的参谋主任）联名保释汪振栋出狱，并偷偷把他送出了后套。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国民党特务们的猜忌和仇恨，最后母子俩人以共产党嫌疑问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十、脱离虎口

小雪已过，大雪又快到了。凛冽的寒风，吹得令人发抖。

由于旧中国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没费多少力气，就很快地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不久，归绥和包头也相继沦陷了。这时的西公旗，已成为日寇和国民党军队交战时的主要前沿阵地。一时战火四起，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公旗的各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时由德王直接把持操纵下的“蒙政会”也趁火打劫。他们为了达到控制西公旗的企图，派遣伪蒙军第九师的一个骑兵团，由团长白某率领，进驻乌拉山以南的升恒号（现先锋乡境内）。这个骑兵团除下乡经常进行骚扰外，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奇俊峰的动向，深怕她进一步投靠国民党，并从中挑拨西公旗上层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图实现压服奇俊峰放弃抗日，旧附德王的

险恶用心。

伪蒙军团长白某在进入西公旗后，他除了在政治上给奇俊峰施加种种压力，逼其屈服外，又不怀好意地接二连三对奇俊峰进行纠缠和调戏。白某深知奇俊峰青年丧夫，寡居无偶，且又身居福晋，富贵无比，如与之发生关系，人财两得，岂不美哉。为此，他经常来王府一坐半夜，赖着不走。奇俊峰明知白某心怀不良，但因其重兵在握，不敢得罪，虚与周旋。每当白某来时，她邀请养母陪伴，直到白某无趣的走了，才得以休息。白团长的粗暴而又拙劣的表演，使奇俊峰清醒的认识到，如果不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摆脱日伪军的控制，随时都存在着被敌方吞掉的危险，其后果只能是导致西公旗抗日斗争的前功尽弃，使广大人民继续遭殃。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形势，脱离敌人的牢笼，奇俊峰决定潜往后套投奔国民党，正式参加联合抗日阵线。于是她派人同驻五原的国民党中央直属骑兵第七师师长门炳岳取得联系，要求门及时电告国民党中央，请求派兵接应。嗣经国民党中央同意，命门炳岳派出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去接应奇俊峰回来。恰在此时，曾在王府中工作的桑杰、斯仁朋斯格等人背叛了奇俊峰，他们把奇俊峰的行动向日伪军告了密。当国民党派出迎接奇俊峰的部队推进至前山王银奎

一带时，日伪军便用突然袭击的战术，分两路夹攻了这支部队。门炳岳部队因地形不熟，在战斗中伤亡损失大半，致使接应奇俊峰的计划受到挫折。

为了防止奇俊峰的出走，日伪军先下手扣押了西公旗保安队连长沙格德尔，这不仅造成了保安队一时失控的状态，同时也给奇俊峰母子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当时在奇俊峰的面前摆着两条路由她选择：一条是在敌人的淫威下，放弃抗日，屈服投降，甘当亡国奴；一条是坚贞不屈，顽强到底地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

在日伪军打败门炳岳派来的迎接奇俊峰的部队以后，驻在升恒号的白团长，当晚就派传令兵到王府通知奇俊峰说：“我们白团长请夫人到团部驻地，有要事相商。”早已识破白团长一伙政治阴谋的奇俊峰，此时明知白团长之请不怀好意，去必招祸，但她不露声色地让传令兵给白团长捎话说：“因夜里带孩子行走不便，明天一早定去拜见。”当时日伪军认为，奇俊峰已成为“瓮中之鳖”她是不会跑掉的。因此，他们毫不防范的等待着奇俊峰的到来。及至日伪军的传令兵一走，奇俊峰便当机立断，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决定放弃西公旗，投奔国民党。决定做

出后，她马上挑选了对乌拉山地形路线最熟悉的贴身警卫楚伦巴托，额尔登仓、佳日格勒等十来名神枪手，备好马匹，带足弹药，同她养母一起，抱着儿子，乘马由乌拉山转入山后，随即奔向套，从此走上了抗日之路。

夜沉沉，野茫茫。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里，奇夫人一行顺着顿达高勒沟，越过了许多高山陡坡，穿过了无数的森林河沟，急行了一个整夜，在次日天刚亮时，她们已越过了乌拉山，到达吉日嘎朗吐庙上。在庙上稍事休息后，又急匆匆地向西行进。当他们路经大余太的时候，国民党杂牌军团长武驼羔已接到门炳岳的电令，派出一个班的兵力，把奇俊峰一行安全护送到五原县城。

在四个昼夜的奔驰中，奇俊峰等人真是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但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几天来的辛苦，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魔掌，胜利的到达了抗日根据地，欢欣鼓舞的心情驱散了困顿劳累之意。

十一、为抗日立新功

华北的大好河山，眼睁睁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遭受沉重灾难的中国各民族同胞，无不感到痛心疾首！

面临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奇俊

峰毅然决然地举起了抗日的旗帜，这在乌、伊两盟各蒙旗王公贵族大部分投敌的情况下，她是勇敢站出来第一个参加反侵略战争的蒙古族女性，她的这种光荣历史，确实值得大书特书。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旧历二月二日，奇俊峰母子在到达五原时，曾受到了门炳岳将军的热烈欢迎。同时，门炳岳又把奇俊峰参加抗日的情况，及时地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报告。蒋介石在回电中除表扬了奇俊峰外，并委托门炳岳代表他本人向奇俊峰表示慰问。次日，在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上便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乌拉特西公旗石王遗孀携王子赴后套参加抗日救国，蒋委员长派员慰问》的消息。这一报道，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投进了一块石头一样，顿时掀起了层层波浪，在全国引起了无比的震动。除国民党行政院、军政部、阎锡山等各方面纷纷来电表示慰问、祝贺，并给汇来巨额奖金外，傅作义也曾专程到五原，亲自接见和鼓励奇俊峰母子的正义行动，并当场决定奇俊峰今后所需的一切军费开支，均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负责供给。所有这些，对奇俊峰来说，鼓舞很大，好象失散的孤雁，重归雁群，内心万分激动。当时奇俊峰除当面感谢傅作义、门炳岳两将军对她的关照和支持外，又给蒋介石发去了致敬

电，在电文中表示了她抗日到底的雄心壮志。

同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军政部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西公旗保安司令。奇俊峰在接到军政部的通知书后，还未来得及着手组建军队时，又在五月间接到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命令，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部司令、并授予少将军衔。西公旗防守司令部设在五原县城，每月由军政部拨给军费七千元，用作该司令部的开支。

由于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救国运动，这时的奇俊峰不仅是一个爱国人士，同时也成为国民党军界中的知名人物了。

因为西公旗被日军所占领，奇俊峰原来的部队中，有不少人都已投靠了日本人，充当了日伪军。后来，虽然有些人来后套投奔她，但也为数很少。总计当时她的部队人数还不足一连。为此，她只好重打锣鼓另开张，在门炳岳等人的支持下，于五原重建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兵买马，招来士兵二百人。其兵源成份大部分是蒙古人，也有相当数量的后套汉人。以这二百人为基础建立起乌拉特西公旗防守司令部，由门炳岳出面请示，经国民党军政部批准，分别派黄楚三为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黄系湖北人，黄埔军校毕业，曾任过杭锦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李隽卿为

参谋主任（李系河北昌平人），钟可师为副长官，贺生举为军需主任，李国章为书记。

西公旗防守司令部组建大会在五原县城举行。开会时，奇俊峰身着绿色军装，佩带少将军衔，同防守司令部的其他军官一起出席并主持了大会。在大会上，她发表了题为：“赤心爱国，坚持抗日到底”的重要讲话。然后由黄楚三宣布了由郑明金，郑色令分别充任防守司令部第一、二团团长的决定。全部军队经过短时间的军事训练后，根据国民党部队的统一部署，分别调两个团到西山咀和阴山以南，乌拉河以北一带担负防守任务。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并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起见，奇俊峰在每个团内都配备一名政治指导员。指导员的任务是专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士兵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在防守司令部刚刚组建、部队素质差等情况下，由于训练工作和思想工作抓得紧，全体官兵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清早，日本侵略军为了摧毁我后套抗日根据地，曾组织了一千人的兵力，分乘四十五辆汽车，集中火力进攻后套的咽喉西山咀地区。日寇来势凶猛、火力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奇俊峰部队协助门炳岳的骑兵进行猛烈反

击。由于她的部队熟悉地形，勇敢杀敌，配合门炳岳的正规军，很快将来犯的敌人全部击退，并给敌人以重创。

敌退后，各方面都来函、来电向奇俊峰表示祝贺和鼓励。这给奇俊峰部队以极大的鼓舞。首战告捷，使奇俊峰为抗日救国立下了第一次战功。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绥远抗日部队大举进攻包头。这一战役是塞北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这次战役中，奇俊峰部队受命配合友军攻打驻守在东公旗察罕高勒庙的敌伪军。他们在这一仗中打得非常勇敢，共歼灭敌人百余名，从而保证了这次战役的整个胜利。

十二、推行新政策

从奇俊峰到后套后，额宝斋在日寇和伪蒙疆政权的直接操纵下，立即返回了西公旗，并积极组织伪政府，以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篡夺西公旗最高权力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阴谋计划，首先，他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罗织了所谓的奇俊峰出卖民族利益，背叛全旗人民，充当国民党走狗等等罪名，在广大蒙古族牧民中进行广泛的传播。其次，他采取事先封官许愿的办法，对自己过去的同党进行拉拢，把这些人组织进伪政府中任职。再次，他还请来日本人小仓茂（蒙古人叫他

为库拉)，做他的高级顾问，以表示他的政府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活动后，额宝斋终于在包头成立了所谓的“乌拉特西公旗政府”。伪政府建立之后，派出了一个排的兵力，从达日盖庙强行取回了旗札萨克官印。在伪旗府中，额宝斋亲自出任大协理，并任命满海、焦太保、色仁朋斯克、敖其尔巴图、宋布尔巴图，桑杰等人为旗府重要官员。从此，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扶持和操纵下的西公旗傀儡政权便宣告成立了。

额宝斋的为人，他既是一个十足的权利狂，同时又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复仇主义者。为了巩固伪政权，排除异己起见，他曾进行了一次清理和打击曾在石王政权工作人员的活动。对原任东西官府协理的色冷保，沙格德尔以及梅林章京斯尔古楞，官其格巴自尔等人，一一予以拘禁，并加以问罪，最后都被判处无期流放，把他们分别流放于锡林郭勒盟各地。后来沙格德尔，官其格巴自尔因死于锡林郭勒大草原上。色冷保，斯尔古楞虽带病跑回，但归后不久，也相继死去。

额宝斋等一小撮亲日势力，虽然窃取了西公旗的权力，成立了伪政府，但由于没有合法的札萨克作为全旗之长，以致不能名正言顺的推行工作。为了打开这种局面，当务之急就是选出一名

札萨克来，才能摆脱群龙无首的境地。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初秋，额宝斋亲自策划并导演了一场选拔旗札萨克的丑剧。经过一番准备工作，最后选定家住在古力奔达坝的闲散台吉洛布僧桑杰的年仅十七岁的儿子阿木尔萨那，作为西公旗的新任札萨克。接着，额宝斋又报请日本军方面批准任命阿木尔萨那为西公旗统兵团长。随后便在公庙子为新札萨克举行了就职仪式。会上，额宝斋亲自主持仪式，并邀请日本顾问和伪蒙疆代表讲话。在讲话中，他们都纷纷表示要全力支持新札萨克的工作。尽管如此，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而已。实际上全旗的军政大权都由额宝斋一个人在把持，阿木尔萨那只不过是一个傀儡罢了。

西公旗日伪政权的建立，对奇俊峰以及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士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从而更加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奇俊峰当时曾向国民党中央政府，绥远省主席和乌兰察布盟盟长等处报告了西公旗事件的真相。同时她又给在敌伪把持下的西公旗发了通告，明确宣布，在日寇操纵下成立的所谓西公旗政府和选任的札萨克是非法的，无效的，要求全体人民不予承认。当年九月，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奇俊峰为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掌管全旗，为该旗合

法的领导。同时还让她分别担任了绥境蒙政会委员，并兼该会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要职。这样一来，既进一步肯定了奇俊峰在西公旗政权中的合法地位，同时，又使她在政界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奇俊峰在就任西公旗札萨克职务以后，在推行新的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她曾亲自主持召开过两次全旗的“楚格拉”（蒙语，指旗务大会）。通过“楚格拉”，定出了以下几条措施：一、正式改组旗政府，使之很好的行使职权。二、本着对札萨克负责的精神，政府一般事宜，由全体仕官轮流值班管理。三、精减官员编制，确定薪水待遇。计梅林章京二人，年俸各一百五十元。参领三人，年俸各一百元。蒙汉文秘书三人，薪水二十至五十元。书记三人，薪水各三十元。此外，对兵丁、杂役人员的薪水，都有详细规定。四、恢复旗立小学，把原设在包头的旗立小学搬迁到五原同义隆继续开办。共有教师三人，学生四十八人。校长由奇俊峰兼任。

自抗战以来，西公旗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敌伪盘居，有一部分地区处于敌我交错的状态中，因此，常有拉锯式的战斗发生。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起，在历时二十天

的时间内，奇俊峰曾率同旗府官员亲自到旗内部分地区进行慰问。在慰问期间，她一面领导群众举行国民公约宣誓，为抗战救国尽心尽力；一面发给灾民和召庙救济费，以安定和鼓舞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意志。由于奇俊峰不畏艰险，亲临前线，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她便博得了群众和士兵的信赖。

十三、南行

在日本侵略者和国内亲日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奇俊峰不顾个人安危，昂首独步，英勇奋斗，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抗日救国的卓越贡献。她的英勇事迹，在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在蒙古民族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位于绥远省西部的茂明安旗齐王福晋额仁庆达赖和乌拉特东公旗额王福晋巴云英，她们都是在奇俊峰的抗日救国影响下，设法摆脱日寇的控制和压迫，先后来到后套参加了抗日战线。为此，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除对奇俊峰通令嘉奖外，还特意安排她到内地参观游览，以便她进一步了解国内形势，为抗日救国多作贡献。

对于一个生长在塞外牧区，并且又常年累月坚持在抗日第一线的人来说，能有机会到内地参观游览，这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无疑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奇俊峰在将旗内政务安排就绪后，就立即按照事先计划的日期路线，开始了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的参观旅行。随同奇俊峰一同外出参观的人，除老太太诺月朋，王子阿拉坦敖其尔外，还有参谋长黄楚三，参谋主任李隽卿，国民党旗党部书记长刘凤池，随从副官毛宝日、舍旺道尔吉以及护兵额尔登仓、楚伦巴特尔等共二十多人。

她们一行，由五原渡黄河，南行入伊盟。经杭锦旗，于三十日到达札萨克旗王府，由札萨克旗王爷沙格德尔扎布亲自接待了奇俊峰。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元旦日，奇俊峰在札旗参加了绥境蒙政会三个常委的就职典礼。接着，奇俊峰以蒙政会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身份，就伊盟的交通、公路、电讯、建设等问题和与会者进行了商讨，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奇俊峰的高见，深得沙王的赞赏。会后沙王赠给她银元一千元，以表示对奇俊峰旅途的资助。

同年元月八日，奇俊峰等人到达榆林县城，驻在榆林的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不久，乌拉特东公旗额王福晋已故巴云英也南下参观，她们恰在榆林会了面，并决心结伴南行。当时由于国民党二战区派出迎接她们的专车迟迟不到，致使奇、巴两部分南下参观人员在榆林足足呆了七十多

天，并在那里过了春节。在等车期间，奇俊峰、巴云英和蒙边第一区防司令除世明等，除了加紧给有关当局拍发电报催要交通工具外，基本上无事可干。他们有时读读书，有时玩玩牌，借以消磨时光。

三月十八日，接他们的专车终于来临了。奇俊峰和巴云英等人乘二战区派来的专车同时南下。她们途经延安到西安，然后改乘火车去宝鸡。到宝鸡后，又乘专车到了成都，旅途上她们共走了半个月的时间。到成都后，门炳岳（此时门已提升为国民党骑兵总监）派人和她们接上了头，因此，她们在成都仅参观了三天，便被门接到了重庆。

在旅途中，奇俊峰的所见所闻，给她的印象是天灾人祸，相继而来，沿途看到的局势很不稳定。陕西闹饥荒，饿殍遍野；胡宗南抓兵拉夫，怨声载道。由于她们带着国民党中央发给的特别通行证，并打着抗日英雄的旗号，因此，通行无阻。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军政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和接待。如国民党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指导长官朱绥光，驻在榆林的高级将领邓宝珊，高双成，西安的胡宗南等都亲自出面迎送奇俊峰、巴云英一行。在各地的军政长官为她们举行的招待宴会和集会上，都由奇俊峰代表大家讲话或演

讲。有一次，在西安为她们举行的集会上，由奇俊峰代表大家发表演说，她在演说中用流利的普通汉语讲话，既不用手稿，又表情自如，语言流畅。她首先用真挚的，热情的语言对胡宗南等人的接待和欢迎表示由衷的感谢，接着，她列举了大量事实，愤怒而悲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野蛮侵略和屠杀罪行，最后，她强烈呼吁大后方的广大人民支援受苦受难的前方各民族同胞，以期抗战必胜。奇俊峰的讲演不时被阵阵掌声所打断，取得了意外的成功。会后还有很多爱国志士要求奇俊峰签名留念。在她南行之前，曾于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一月，在陕西际次亲笔为黎胜伦所著的《西蒙两女杰》一书写过序文，其中有：“两年多的抗战，我们不但没有被日本小鬼所屈服，而愈战愈强，越打越团结。他们陷入泥淖日深一日，终必至于不能自拔，而速其死，我们的胜利是日近一日。不独是打破他们分化鲸吞的迷梦，同时也奠定了复兴的基础。这是什么道理，很明显的证明了公理摧毁强权、正义无敌天下。”又写道：“加倍努力，尽我所能，献我所有，那么血洗樱花之日，便是我们抗战建国成功之时。”这些笔迹，都真实的记录了奇俊峰的豪言壮语、雄心大志，也充分地反映了这位抗日的女英雄对抗日

所持的必胜信心和决心。

十四、谒见蒋介石

北国的五月，大地尚未解冻吐绿，然而南国的风光，已是花果满山，稻禾遍野，具有夏日的景色了。

奇俊峰的南方之行，终点站是重庆。她们在到达重庆时，奇俊峰、巴云英受到了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头面人物的接见和招待。特别是对奇俊峰及其王子十分重视，由国民党骑兵总监门炳岳亲自出面，把她们母子和养母诺月朋姥姥接到重庆西郊三十华里处的青木关自己家里，进出都指定专车接送，并派专人护卫。其余人员则安排在市内招待站住地的宾馆。（其中巴云英另有安排）

在奇俊峰一行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行政院、军政部、蒙藏委员会和蒙旗指导长官部等，都派代表前往她们的住地探望，并安排她们的参观项目和商定向委员长蒋介石的汇报事宜。接着，各部门在晚上为她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何应钦，孔祥熙等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出席了招待会，并且作了即席讲话。在讲话中，他们高度评价了奇俊峰、巴云英的功绩，并说她们是在全国蒙旗王公中最早反正抗日的，是具有爱国主

义思想的勇士和女杰。当时，奇俊峰，巴云英在会上向何、孔等大员敬献了哈达，并分别赠送了事前准备好的锦旗。其中，赠给何应钦的锦旗上写有“砥柱中流。”赠给孔祥熙的锦旗上写有“时雨春风。”赠给蒙藏委员会的锦旗上写有“边民爱戴”等字样，以表示感谢。

宴会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了以“行政院、军政部，蒙藏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西蒙两女王”为题目的重要新闻。

当奇俊峰及其一行，在重庆呆了一个多月以后，经门炳岳的多方活动，蒋介石才答应接见奇俊峰及有关人员。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奇俊峰她们当时忙的团团乱转。一面让李隽卿写两年来的抗日情况的汇报材料；一面又训练小王子在晋见蒋介石时的礼貌、规矩。一时弄得小王子也筋疲力尽。

在六月初的一个中午，突然来了通知说，蒋介石在当天下午接见奇俊峰，并对被接见的人作了严格的规定，即只限于奇俊峰及其王子，黄楚三、李隽卿等四人晋见，由门炳岳陪同。

那天下午，奇俊峰等人分别乘坐两辆小轿车，被带进了一所整洁的四合大院子里。这所院子里外共有四、五层，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当她们走进一套宽敞的会客厅以后，时间不长，由何应

钦、孔祥熙等人陪着蒋介石和宋美龄出来接见。奇俊峰给蒋介石行了军礼，小王子阿拉坦敖其尔给蒋介石行了跪拜礼。随之，奇俊峰及其王子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敬献了哈达，并向他俩赠送了事先制作好的，两面非常漂亮的锦旗。在献给蒋介石的锦旗上写着，“岛夷胆寒。”给宋美龄的锦旗上写着，“妇女领袖”。

在接见中，蒋介石打破了他以往的会客的惯例，谈话一直延续了三个多小时。在会见中，奇俊峰除了详细汇报蒙旗的抗日情况外，还重点叙述了日寇侵占西公旗以后，扶持额宝斋等人建立伪政府，另选了札萨克等种种为虎作伥，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现在广大蒙古族人民正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苦，要求国民党政府大力支援，以解救蒙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奇俊峰对作好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工作，给蒋介石提出了四点建议，即：①严明功罪赏罚；②调整蒙汉关系；③加强行政机构；④改善蒙旗教育等。对此，奇俊峰当面受到蒋介石的赞许，说她是蒙古民族的女英雄，为保卫边疆立了大功。并当场宣布，奇俊峰由原来的少将军衔晋升为中将军衔，以资嘉奖。接着，他又命令军政部直接拨给奇俊峰二百支常规武器和足量的弹药，另外，还发给奇俊峰大、小汽车各一辆，军装五

百套。

接见结束后，在蒋介石的官邸内，由蒋介石夫妇陪着奇俊峰等人共进了晚餐。第二天《中央日报》又以头版报导了这一消息。

自奇俊峰被蒋介石夫妇接见以后，她的声誉日隆，地位更高了。重庆妇女界曾举行过专场报告会，请奇俊峰去作抗日演讲。宋美龄还亲自陪着奇俊峰前往位于小龙桥贾家岗的，以蒋介石的名字命名的“中正中学”演说。当时，全场五千多名师生被奇俊峰的精彩讲演深深的吸引住了，只听得在会场上不断地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演讲会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请奇俊峰签名留念。她当场使用流畅的蒙汉两种文字给大家签名，尽量满足了学生们的愿望。

奇俊峰重庆之行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成功，也是她政治生涯中的顶峰。她不仅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破例接待，得到了“抗日女英雄”的美称和中将的军衔，同时，她的重庆之行还受到了社会舆论界的广泛注意和渲染，使她名扬中外，有了特殊的政治资本。这是在当时的少数民族妇女中，独一无二，别人和她无法比拟的地方。

十五、重整旗鼓

深秋已过，冬日将临。奇俊峰满怀着成功的喜悦，经成都、兰州、宁夏等地，兼程二十多天，返回了河套。

这时奇俊峰，衣冠整洁，气宇不凡。她短发革履，衣着黄呢子军服，领口上佩戴着红边满金两颗星的中将军衔的领章。言谈举止也都带有几分高级将领的风度。

奇俊峰重庆之行，标志着她在政治上的新起点。她由重庆到陕坝后，首先谒见了傅作义。当时尽管蒋介石背叛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蓄意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使抗日统一战线遭到了严重损失的时候，傅作义将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当他及时听取了奇俊峰的汇报后，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她整顿并重新组建西公旗政权及部队。嗣经傅作义同意，奇俊峰决定将她的防守司令部和旗政府分别设于陕坝和呼和浩特（距陕坝四十公里处，是中公旗，西公旗和米仓县的交界处）同时，并根据傅作义的指示，由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协助整顿和组建西公旗部队。

时隔不久，奇俊峰即派其随从副官温格尔和楚伦巴特尔等人，返回西公旗境内收集原部队人

马，作为组建部队的基础。他们经过半个多月的奔波，从原来二百人（除离队和参加日伪军以外）的队伍中招收回不足百人。为此，她将原来的三个团的建制缩编为三个中队。中队长分别由关布色楞，沙格德尔和阿拉坦朝鲁担任。

及至一九四一年底，奇的部队人数已剧增到二百五十人左右，武器装备也有很大的改善。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奇俊峰又把部队恢复为三个团的建制。团长除由佳日格勒代替关布色楞外，沙格德尔，阿拉坦朝鲁两人的职务由中队长改任为团长。

在三个团组建后，除一个团驻守在呼和淖尔作为旗札萨克的警卫团外，其余两个团直接受傅作义部队的统一调遣，分别在阴山脚下的乌加河以北的千里庙、同义隆等地驻防，担负着保卫后套的任务。他们除了参与同日伪军的零散小股部队战斗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仗可打。相反，由于在部队中混进一些不良分子，从而抢劫和掠夺老百姓财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以致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

按照王公制度的惯例，每年都要举行启印和封印的两次“楚格拉”大会。大会期间，奇俊峰必须亲自去呼和淖尔主持处理旗政。除此以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她一般都住在陕坝城内，处

理军事方面的工作。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春季，原西公旗上层官员色冷保协理的儿子郝游龙（外号油葫芦、蒙名陶克套胡巴特尔），因在包头无落脚之处，便收罗了二十多人的队伍，从伊盟境内跑到陕坝，来投奔奇俊峰，请求收留他。对郝游龙的情况，奇早有所了解，知道郝在包头参加过“哥老会”，后来为日本鬼子报告过蒙旗的情况，是个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的人。但是，郝父生前为石拉布道尔济忠实效劳，立过大功。因此，奇俊峰一方面考虑到他老子与石王的交情，另一方面郝游龙是从战区跑来表示要参加抗日，并效忠自己的人，于是与黄楚三、李隽卿研究决定把他收留下来，并任命他为中队长。

郝游龙颇有拉拢煽动的本事。他入套后打着奇俊峰的旗号，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处搜罗了近一百人的新兵，其中有土匪、汉奸、兵痞、流氓，是一群成份复杂，乱七八糟的乌合之众。由于奇俊峰没有真正看透郝游龙的丑恶本质，又轻信了他的花言巧语，以致错误地认为郝游龙能干，有本事。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她不顾其他许多官员的反对，竟把郝游龙所属的中队升格为旗防守司令部直属团，并任命他为团长。从此以后，郝游龙的部队实际上已经成为奇司令部下的一支“劲旅”。

随着抗日斗争的日益激烈，当时有不少曾经参加过日伪军的蒙族士兵，因受不了日本鬼子的欺负和凌辱，他们纷纷起义，并调转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开火。这些人在起义后，大多数人前来投奔奇俊峰部队，她都一一表示热情欢迎。

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旧历五月份，曾在日伪军中担任中队长的贺太保（蒙名贺希格太平，西公旗人）率领八十五名蒙旗士兵，趁夜举行武装暴动，并从敌占区的乌拉特中公旗直奔后套而来。贺太保到陕坝后，首先向奇俊峰表示，他们不愿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不愿做亡国奴，要求参加抗日斗争，愿意为解放家乡而奋斗。对贺太保的爱国行动，奇俊峰当时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亲自带着贺太保去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拜见了傅作义将军，还请准把贺太保带来的八十余人编入西公旗防守司令部内。

在傅作义接见贺太保时，奇俊峰向傅介绍说：“贺太保是我们蒙古民族的勇士，他敢于在日伪军的严密控制下，率领这么多的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前来投奔傅将军，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他这样的行动，在我们西公旗还是第一次。”傅作义对此非常高兴，当场任命贺太保为西公旗防守司令部独立连连长，并授予他少校军衔。对独立连所需的粮草，决定由三十五军从同义隆供

给，并发给一百套军装和足量的枪支弹药。

后来贺太保的连队接连多次参加了打击日伪军的战斗，立了大功。有一次贺太保协助国民党三十五军攻打盘踞在山岱庙的日伪军，杀伤敌人数十名，受到了傅作义将军的通报嘉奖。

十六、凯旋而归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旧历三月二十一日，傅作义将军亲自指挥了闻名的五原战役，他以气吞山河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召集了数万人的兵力，向盘踞在五原城堡的日本军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打死日军水川中将、大桥大佐、桑原中佐等多名指挥官，还俘虏了特务队长浅沼庆太郎、警察指导长官西田信等。这次战斗共杀伤敌人三千四百人，其中日籍军人三百八十余人，缴获了大量的火炮、轻重机枪，汽车等各种武器和交通工具，从而彻底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在五原战役以后，奇俊峰为了早日收复西公旗，将她的主要部队先后改为游击部队，分别从阴山以南逐步撤出来，派至乌拉山以北和西山咀地区，进行游击活动。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向日本宣战，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英、美、苏等盟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使长期处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的各族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的春天。

日寇投降后，为了尽快接收日寇扶持下的以阿木尔萨那为首的西公旗傀儡政权，当即派出贺太保的部队进驻哈达门口子一带，作好了接收准备。同时，奇俊峰率领旗府和防守司令部的官员，一起来到了五原，打算由五原回旗执政。

“树倒猢猻散，”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生存的阿木尔萨那政权，在他主子垮台下也跟着迅速土崩瓦解。阿木尔萨那已跑回深山密林中的家里躲藏起来，大协理额宝斋，协理宋布尔巴图，以及梅林章京焦太保等人，为了保持住他们个人的名利和地位，共同商定派宋布尔巴图到五原欢迎奇俊峰及其王子。这一伙从政多年的老政客，他们有着应付一切场面的丰富经验。从日寇投降后，他们感到只有投奔奇俊峰这一条路是好办法，如奇俊峰不予怪罪，也许能转祸为福。但是，他们担心派宋布尔巴图去奇俊峰不予接见，于是让宋布尔巴图先到后山找上了在南昌驻防的郝游龙，一同去了五原。当宋布尔巴图拜见

奇俊峰时，首先表明他是代表伪政府的官员，向她表示低头认罪的，并说旗内已准备就绪，欢迎奇俊峰及王子回旗执政，并请决定回旗的日子，以便作好欢迎的准备等。奇俊峰当时并没有明确回答何时回旗，而只是告诉他们要迅速准备好五、六百人马的粮食和草料。

奇俊峰在与宋布尔巴图谈话中，特别注意地询问了额宝斋的情况。因为额的老奸巨滑是出了名的，他的一举一动，都对旧政权人员产生影响。所以，观察了解额宝斋的行动，对奇俊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额宝斋趁派宋布尔巴图来五原之际，他早已从哈叶胡同（额的家）跑到包头，归绥等地窥测方向去了。对此，奇俊峰十分警戒，为了防备万一，她把原打算回旗的日子提前了几天，于八月十七日一清早，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五百余人的队伍，由五原动身，路经扒子补隆、公庙子，第二天上午开进了旗府所在地哈拉汗。焦太保、宋布尔巴图、斯仁朋斯格、栋鲁布等伪政府官员以及其他方面人士约三十余人出来迎接了她们。

位于哈拉汗的旗府是一座四合大院，院内有一栋长达十来间房屋的砖瓦房。在中央的房间内供奉着佛爷，房里除陈列着佛像外，还当空悬挂着军旗，弓箭等。奇俊峰以及随行人员在到达大

到包头时，额宝斋早已跑到在距包头西约三十华里处迎接了奇俊峰。在他们见面后，额宝斋摆出一副十分痛心的面孔，装出诚惶诚恐的模样，把腰弯得很低，头部几乎快着地的姿势。他左一个哈敦（夫人），又一个诺颜（官长），双手高举旗府官印，再三向奇俊峰表示欢迎。随后，他们把奇俊峰母子接到西公旗驻包头办事处住下。当晚，额宝斋摆宴席向奇俊峰请罪，又赠送了上千两银子、数百两大烟土，请求奇俊峰赦免他的罪行。

奇俊峰本计划立即除掉额宝斋，以减少西公旗的祸害。因为额宝斋是多年来制造西公旗动乱的罪魁祸首。但由于额宝斋的那副伪善面孔，和狡猾的政治手段，蒙蔽了她。奇俊峰又一次改变了原来的主意，表示对他予以宽恕，宣称既往不咎。这样额宝斋不仅保住了命，同时给奇俊峰以后在政治上的上当受骗又留下了祸根。

十七、公庙子的盛会

奇俊峰为了同绥远省政府继续保持联系，并及时解决阿拉坦敖其尔的袭位问题，专程由包头到了归绥。她们在归绥城先后住了一个来月。其间几次拜见傅作义、董其武，最后经董其武同意批准，任命阿拉坦敖其尔为西公旗札萨克兼西公

旗保安司令。这样一来，奇俊峰母子便名正言顺地控制了西公旗的军政大权。同时还宣布，废除以阿木尔萨那、额宝斋为首，在日寇扶持下建立的伪政府，对原在伪政府中任职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一律解职。

奇俊峰从绥远带上董其武给她的“上方宝剑”，及时回到了西公旗。返旗后，她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旗府由哈拉汗迁到公庙子原来的旗府所在地。然后是召集伪政府的官员大会，宣布绥远省政府解除他们职务的决定，并把他们赶回各自的家。接着开始组织新政府。新政府的人选是：协理职位由于没有适当的人选，暂时空缺。管旗章京选定了一向忠实于奇俊峰的敖特根充任。斯日古楞为梅林章京，朋斯克巴自尔、敏珠尔为札兰章京。旗保安司令下设若干个团。由郝游龙，敖其尔巴吐、达林太、沙格德尔、沙格德尔其仁分别担任团长。

奇俊峰抓的第二件大事，是推行保甲制度。在沿包头附近的边区成立了忠勇乡，下设保甲。同时建立了乡武装——国民兵队。

在完成上述工作后，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秋末，经过充分准备，在公庙子举行了全旗的“楚格拉”。从全旗沦陷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这种“楚格拉”多年不举行了，

因此，全旗广大百姓无不争先恐后前来参加大会。其中有官员、贵族上层、宗教喇嘛、军界人士以及平民百姓不下一千三、四百人。“楚格拉”举行的非常隆重。在开幕的那天，新任札萨克阿拉坦敖其尔身着蟒袍补褂，头顶红顶花翎，由其母亲和其他政府官员陪同，接见了各苏木章京和上层贵族人士。会上，并以新任札萨克名义发布了《告全旗人民书》。

蒙古族举行“楚格拉”，人们最欣赏的是摔跤，赛马，射箭三项比赛。蒙古话叫额淋古拉奔那达慕。这次“楚格拉”仅摔跤一项就有一百六十八对选手参加了比赛。还有一百二十多匹马参加了赛马比赛。其中有来自乌拉特中公旗、乌拉东公旗以及达拉特旗获得过一、二等奖的快马。“楚格拉”整整连续三天，搞得非常红火热闹。奇俊峰和小札萨克天天观看比赛，目不暇接。赶来观看“楚格拉”的，还有那些昔日沉默寡言的喇嘛们，他们此时此地，也喜笑颜开，又说又笑，与过去判若两人。

当“楚格拉”结束的那天，新任札萨克以新政权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摆了“乌察”（全羊）。奇俊峰在宴席上一面祝贺“楚格拉”胜利的召开和结束，一方面借此机会发布了施政纲领。席间，奇俊峰和王子连连举杯，与大家畅

饮美酒，共话胜利。宴会办得非常成功，另外，借这次“楚格拉”之机，各个苏木也给新政权敬献了大量的牲畜和其它物资。

公庙子盛会的召开，它标志着奇俊峰政权的重新确立。从此，结束了内乱，统一了全旗，暂时出现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十八、幕后种种

奇俊峰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旗内上层贵族之间权利斗争的结束。在坚冰的复盖下，依然波涛滚滚，只是不被人们察觉罢了。旗内出现的平静和安定，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在阴暗的角落里，正酝酿着一场阴谋诡计，它正象冰下的激流滚动着。

在人吃人的旧制度下，为了政治的需要，不惜牺牲一切，有的人甚至把老子、妻子、儿女作为牺牲品，以图达到政治目的。这种现象在过去并不罕见。额宝斋从事政治工作多年，是个有几十年经验的阴谋家和野心家，西公旗几次折腾，都是与他密不可分的。在政治舞台上，他始终都扮演着一个十分拙劣的角色。抗日胜利后，额宝斋虽被赶出旗府，留下一条老命，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始终把奇氏母子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

内战后，他感到又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策划于密室。串联于四方，煽风点火，纠集队伍，准备伺机反扑。他首先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对奇俊峰不满的郝游龙身上。

郝游龙是个典型的兵痞加流氓。他抢劫民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牧民都称他为“油葫芦”。从前，他来后套时由于奇俊峰的赏识，干了几年团长。抗战胜利后，他满以为再能捞个副司令当当，以图步步高升。但奇俊峰并没有满足他的意愿，依旧让他当团长。对此郝游龙认为这是贬低自己，心中对奇俊峰极为不满。后来，他先是让他的额吉（母亲）满都尔玛出面，两次去公庙子旗府找奇俊峰司令求情，要求给郝游龙加官晋级，但都被奇拒绝。这样一来，郝游龙对奇俊峰的仇恨更象火上浇油。后来竟发展到他与土匪头子张奔楼等勾结，另拉队伍，独树一帜，公开地拒绝接受奇俊峰的指挥。

奇、郝的矛盾，对额宝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额宝斋认为如果不抓住这一机会，就好比丢掉了碗中的肉一样，那将后悔莫及。为此，他经常请郝游龙到自己家里，用好酒好肉，鸦片烟给以招待，到后来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孙女儿不声不响地送给了郝游龙。额宝斋的两个孙女儿都是十七、八的漂亮姑娘，一个是长子曼头的女儿，一

个是三子巴雅尔图的女儿。郝游龙只要一去额家，额宝斋便有意地躲开，让两个孙女儿轮流陪客。被色情和鸦片所陶醉的郝游龙，此时早已忘乎所以，并公开的占有额的两个孙女儿。后来，额把大孙女儿满德格日勒（曼头的女儿）许配给郝游龙做小老婆。这时，郝游龙不仅名正言顺地做了额宝斋的孙女婿，同时他把杀父之仇（郝父色冷保被额宝斋流放致死）也忘在九霄云外，成了额家的乘龙快婿，忠实走狗了。

第一步把郝游龙搞到手，额宝斋自然十分高兴，但这只是手段，其险恶用心是要借郝游龙之手，杀奇俊峰之头，以实现重掌西公旗政权的目的。为此，额宝斋把郝游龙的婚礼办成了推翻奇俊峰政权的第一次鼓动会。在结婚典礼上，由前西协理宋布尔巴图当主婚人，其他旧官员除阿木尔萨那外，全部到场。他们借此机会，纷纷向郝游龙道贺，并大肆渲染郝游龙的所谓“功绩”。他们在祝酒会上高唱什么：“畜群里有匹出色的红枣骝马，始终跑在马群前头。全旗府有名的陶克套呼，指挥旗军上战场。英明精干的陶克套呼，生来就有公爷的福分”。边唱边喝，简直把这个无耻之徒捧到了天上。此时的郝游龙，也被他们捧的飘飘然，完全倒向了以额宝斋为首的怀抱中。

十九、夜幕之下

五月端午临近了，当夜幕来临之际，在古城包头现中国人民银行巷内一所僻静的四合小院内，大门被顶得死死的，似乎怕有什么人闯进来。这座四合院，当时是国民党绥蒙党部委员，乌拉特中公旗国民党部书记长贺守忠的别墅。贺守忠是策划秘密的倡导者和主持者，他伙同西公旗保安司令部团长郝游龙等三人，正在紧张制定一项诡密的暗杀计划。

这项暗杀计划，已经反复讨论过两次了，今夜是最后一次密会。四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是那样激烈而周到。因为这项计划准备立即执行。

这项计划的内容是谋杀奇俊峰。现在讨论是用什么方法进行暗杀？派谁去最合适？干掉奇俊峰后权利应该怎样分配？以及用什么借口向全旗人民交待，等等。

贺守忠是一个受过国民党调统室系统训练出来的特务，凭他的本领和经验，认为杀掉奇俊峰母子并不难，关键的问题是，在干掉奇氏母子后又怎么向全旗人民交待，这事前需要编造出一套圆满的理由才能不露马脚。郝游龙是个头脑简单的鲁莽家伙，他坚持只要把奇俊峰母子杀掉就无

须宣布什么罪名。讨论来，讨论去，还是按照贺守忠的意见，他们给奇俊峰拼凑了五条所谓的罪状，即：第一，出卖西公旗人民的利益，勾结汉人李隽卿；第二，阴谋投靠共产党；第三，专横跋扈；第四，霸占由人民积攒起来的财产；第五，阿拉坦敖其尔并非石王的后代，是偷着抱来的汉人小孩。等等。并决定把这五条罪状形成文字，在全旗人民中广泛宣传。对杀害奇俊峰母子的方法、手段，有的提出来，干脆采取直接袭击的办法。但多数人感到这样做危险太大，认为奇的部队的力量较强，恐怕还会叫奇俊峰把郝部消灭。经过讨论，最后决定派出刺客，趁奇氏母子不备之际，进行密秘枪杀。

夜到五更，天色将明。满屋内烟雾缭绕，在昏黄的灯光下，恨不得马上把西公旗军政大权篡到手的四条汉子，这时讨论到最后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推翻了奇俊峰政权后，权力应该怎么分配？是平分秋色，还是按功授赏。在这个主要问题上，他们谁嘴里也不肯说破，但各人心里却各打各的算盘。后来经过一番舌战，意见暂时统一了起来。决定推举贺守忠的妹夫，曾在日伪时代充任旗札萨克的阿木尔萨那出任札萨克，郝游龙任旗保安司令，额宝斋等人为掌管全旗的大协理和协理。栋鲁布先给以团长头衔。

就这样，在包头一个黄风弥漫的夜幕下，由贺守忠等策划的一场暗杀奇俊峰母子的阴谋终于确定了。

二十、中计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冬季，作为西公旗新政权高参的李隽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被绥远省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奇俊峰与李隽卿朝夕相处，亲密无间，逐渐建立了友情和爱情，她们俩人除在工作中密不可分以外，在私生活方面也产生了爱情，并且已发展到了同行、同卧，形影不离的程度，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在李隽卿被投进监狱后，奇俊峰失去了良好的参谋和亲密的伴侣，心情是非常凄凉而焦虑的。从此，有半年多的时间，她几乎完全放弃了旗内的工作，为营救李隽卿而奔波于西公旗和绥远之间，废寝忘食，疲劳不堪。

“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旧社会，这句话确实是货真价实。在半年多的营救李隽卿活动中，奇俊峰先后拿出银元一万多元以及大量的贵重物品，托人分别向董其武，张庆恩（绥远省军统调查室主任）以及李冶芳（绥远省监狱长）等高

官显宦行贿，才勉强保住了李隽卿的命。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宣布释放李隽卿出狱的同时，附带的条件是，命他立即返回原籍，不得再去蒙旗工作。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六月中旬，奇俊峰和李隽卿在绥远见了最后一面。见面时，俩人商定李先回北平，随后奇俊峰寻找借口去北平找他。

但是，秘密并没有保住，她们准备出走的计划，很快地便被绥远省军统调查室所侦知。为了阻止奇俊峰的出走，他们决定了对奇俊峰下毒手的办法。特务头子张庆恩亲自给郝游龙下达命令，要郝尽快地寻找机会，迅速干掉奇俊峰母子，以除后患。特务头子的严令，更壮大了郝游龙杀害奇氏母子的胆子。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四人原来商定的行动计划，一方面把杀害奇俊峰母子的时间提前，另一方面，由他自己亲自充当杀害奇氏母子的刽子手。

七月初，奇俊峰返回旗里来。回旗后，她召集了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开会。会上，她除了简要的议论和安排了旗内的主要工作外，并提出了去归绥住一个时期。奇俊峰要去归绥的说法，引起了好多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心里都明白，她名为去归绥，实际则是找李隽卿去。因此，有的人当场就提出来，现在国内形势很复杂，担心西

公旗再次发生动乱，要求奇俊峰继续协助小札萨克执政，不要外出。有的人预料到奇俊峰这次外出，可能会发生问题，劝她继续呆在旗里比较安全。也有的说，听说郝游龙正集结部队去乌兰计一带，还详细打听奇俊峰去包头的的时间，路上恐怕有不测，建议奇俊峰绕后山去包头，以提防郝游龙。但这些本来是善意的建议和规劝，均被奇俊峰一一予以否定。特别是对提醒她防备郝游龙的意见，她不但听，反而说什么：“我儿子是一旗之长，谁敢动他一根毫毛！”由于她刚愎自用，不纳忠言，终于在一场招致杀身之祸的阴谋面前，完全丧失了警惕。

对奇俊峰母子的活动了如指掌的郝游龙，他明知奇俊峰去包头，乌兰计是必由之路，为此，他在乌兰计埋伏下一个连的兵力，并命令士兵枪上刺、弹上膛，以等待奇俊峰路过时下手。

七月十四日中午，奇俊峰母子由公庙子旗府启程，随身率领二十四名护兵，他们是在特务连长焦贵喜亲自督导下进行护卫的。这些护兵全副武装，骑着快马，保护着奇俊峰母子乘坐着套有两匹骡子的轿车，一路由西向东而来，当他们赶到乌兰计时，太阳离地平线只有几丈高，黄昏不远了。郝游龙看到奇俊峰所带的护兵，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全旗闻名的神枪手。每人身上

都持有两把二十响的德国造手枪，武器精良，子弹充足。他感到自己的部队在各方面都敌不过对方，此事不能操之过急，不然将有被奇俊峰护兵收拾掉的危险。因此，他未敢轻举妄动。当时，对奇俊峰的到来，他非常热情地接待，立即把奇俊峰母子和护兵们分别安置在司令部办公室和其他一些好的房子里。拿出大烟，摆好了烟具。在略进茶点后，郝游龙又请奇吸食大烟。晚间，郝游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席，招待奇俊峰一行。

在乌兰计，奇俊峰安稳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奇俊峰还未起床，奶茶和奶食就已经准备好了，并把她们的骑乘也都赶了回来，备上了马鞍，骡子也套好了轿车。奇俊峰吃罢早餐后，郝游龙亲自扶着奇俊峰母子上轿。当护兵们纷纷上马准备上路之际，突然院墙内外伏兵四起，高喊“缴枪不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焦贵喜等人立即拔枪准备开火，拼死保护奇俊峰母子，眼看着一场生死搏斗即在眼前，一场流血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了。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此时奇俊峰在轿车里制止她的卫队动武，并说：“自己人千万不要互相动武，弟兄们有话可以慢慢讲嘛。”这时郝游龙来车前说：“请奇司令出来，弟兄们有话要对司令讲。”就这样，奇俊峰

中了郝游龙的圈套，在所有的卫兵把枪放下之后，奇俊峰便身遭监禁，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之中。

二十一、遇难

郝游龙抓到了奇俊峰母子，只是完成了暗杀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要实现他阴谋篡权的目的，必须尽快地除掉奇俊峰母子。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如把奇俊峰母子杀害在乌兰计，这样一来，目标过于明显，对己不利。后经考虑，决定先把奇俊峰母子乘夜转移到达日盖庙。因为这座庙背靠乌拉山，离陕包公路较远，是平时来往人少的偏僻地方。等待奇俊峰母子被送在达日盖庙后，郝游龙为了防备意外，专门让他的亲信人物赵芝（团长），派两个班的士兵进行看管，并把奇俊峰母子押在巴吐巴雅尔喇嘛的四合小院内，每天只给送两顿饭和一次茶水。他还规定，除少数指定人员可以进入外，其他任何人严禁出入。在这种情况下，奇俊峰母子二人便与世完全隔绝了。

十六日晚，额宝斋、焦太保、斯仁朋斯格等人，一个个象闻了血腥味而红了眼的饿狼一般，先后都赶到了达日盖庙。他们都是暗杀奇俊峰母子的策划者。这些家伙怀着强烈的个人野心，恨不得立即杀掉奇俊峰，把权利一下子搞到手。他

们经过一番策划后，决定用带驹的骡马一匹，现洋两千块，和两辆轿车等钱物，买通了赵芝部下的田小三（汉族），让他去充当杀害奇俊峰母子的刽子手。

十五日，郝游龙扣押奇俊峰母子的消息，被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得知后，立即电示包头市长温永栋，让他赶紧派人奔赴出事地点，同郝游龙进行交涉，要保证奇俊峰母子的安全。温永栋遵命于十八日派出了王靖国专程到西公旗，来解决奇俊峰母子被扣问题。王靖国在见到西公旗国民党部书记长王学良和郝游龙后，如实向他们传达了董其武的命令。郝游龙当面表示，他绝对保证奇俊峰母子的人身安全。之后，他亲自陪同王靖国一起到了达日盖庙关押奇俊峰母子的地方去看望。在探望中，王靖国当面告诉了董其武主席关心她的安全，并努力使她们早日获得自由的话以后，奇俊峰当时两眼落泪，除对董其武和王靖国的关心表示感谢外，又当场揭露和痛骂了郝游龙。当天晚上，王靖国住在达日盖庙上。郝游龙善于使用他的惯用伎俩，一面用酒肉招待王靖国，表示不会亏待奇俊峰，让王放心离去，另一方面却在背地里抓紧策划杀害奇俊峰母子的办法。

十九日上午，王靖国、王学良所乘坐的汽车刚一离开达日盖庙，在汽车煽起的灰尘还未完全

消散之际，田小三趁奇俊峰出院小便的时候，他躲在阴暗角落里向奇俊峰连开两枪，奇俊峰应声倒在血泊之中。阿拉坦敖其尔看到母亲被打倒在地，立即撒腿跑回屋子里，钻进了供佛象的佛龕内。但是，田小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亡命徒，硬把小王子从佛龕中拉出来，不顾阿拉坦敖其尔“我不当你们那个王爷了，请叔叔饶我一条小命吧”的哀求，当头给了一枪。就这样，一条幼小的生命，也被残忍地杀害了。

奇俊峰母子遇难后，据郝游龙内部人员透露：在奇俊峰被押送到达日盖庙上后，她和郝游龙曾有过一次谈话。当时，奇义正辞严地责备郝的行为，说他不识大体，忘恩负义，反恩为仇，认贼作父，最后必将自取灭亡等一番道理。由于情真辞切，郝游龙颇受感动，乃至改变主意，决定杀死额宝斋以报父仇，而赎己过。及至郝游龙气势汹汹的提枪进入额宝斋的住室后，额宝斋察颜观色，见郝游龙面带杀机，来意不善，遂佯装笑脸以迎之。并以挑拨者的口吻说：“如今你可以打死我，但我死后，只怕你也活不长！”又说：

“现在你已搞成骑虎之势，擒虎容易纵虎难。当前，你如杀了奇俊峰母子二人，便可掌握旗政，为所欲为；反之，你放虎归山，祸在眼前，不仅你我二人死无葬身之地，不知还有多少人的人头

落地。孰轻孰重？请三思之。”郝游龙原是一个头脑简单、反复无常的小人，额宝斋的一番话他感到十分有理，加之以张庆恩的使命必须完成。于是，他打消了杀额之念，反过来，又和额宝斋共同谋杀了奇俊峰母子。

关于奇俊峰母子遇害的消息，当时有的报纸以显著位置公开作了报导。如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的报道中写道：“乌盟西公旗血案，女王奇俊峰及幼子被杀，凶手系保安团长郝游龙”等。这一惨案震动了国内各界人士。对此，绥远省政府不得不加以过问。在四个月内，董其武先后三次接见了前来绥远告状的奇俊峰养母诺月朋及奇俊峰的弟弟罗凤翔。诺每次都向董提出：一、要严惩凶手郝游龙；二、要省里派人给奇俊峰母子收尸。董其武只是答应给予调查处理，但对其两点要求不作具体答复。只是说，此事已经上报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让诺夫人耐心等待。诺夫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通过私人关系，找到绥远省蒙旗福利委员会主任胡风山，特请他出面跟董其武说情，后来得到胡风山的回答说：关于奇俊峰的被害，是有政治背景的。李隽卿是共产党，而李与奇俊峰的关系密切，奇的行动已构成了共产党嫌疑，她的死是有原因的。并说不要再为此事找他，他

无能为力。因此，奇被害一事就这样拖而不决。

然而，郝游龙政权，承受不了旗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他迫不得已对奇俊峰母子的死作出一些让步。一是把奇俊峰母子的尸体，从达日盖庙南河槽中挖出来，迁至三印河头埋葬。二是为奇俊峰母子赔偿损失。他向全旗各苏木摊派五百只羊，二百头牛，二百匹马，三十峰骆驼。然后派人专程去归绥，请求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从中给予调解。后经荣祥出面调解，初步定为，为保证诺夫人的生活，由西公旗从明安川的大西滩中拨出一百顷好地，并拿出二百头牛，一百匹马，三十峰骆驼，五百只羊，作为奇俊峰母子的死亡损失赔偿。根据这个决定，派人装满了一辆脚蹬三轮车礼物，其中包括奇俊峰生前的东西，有头戴，十两黄金以及两百元现洋等，送至诺月朋住地，请她收领。

血海深仇，岂能容忍。被一群暴徒杀害了亲人的诺月朋，一见到来人，犹如见到豺狼一般，她开口痛骂他们是：“一群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禽兽，你们共同杀害了我的女儿和外孙子。”尽管来人给诺夫人赔了很多不是，但终究被诺月朋赶了出来，一点也没有接收他们送来赔偿的东西。最后，那么多的牛、马、骆驼

和羊，均被郝游龙，额宝斋等一小撮吸血鬼给吞掉了。多年来，奇俊峰及其幼子的血案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得到结案。而一直为女儿和外孙子的被害而四处奔命的诺月朋，也于一九五〇年惨死在新民旅社。

二十二、正义的力量

奇俊峰母子的遇害，引起了乌拉特西公旗人民的深切怀念。牧民们在悲痛愤怒之余，自编歌词以纪念这位抗战女英雄。这首歌在当时，曾广泛流传。歌词是：

松柏丛生的乌拉山哟，
谁料到你会被烧尽。
抗日八年的女英雄哟，
竟遭到了油葫芦的暗算。
活蹦乱跳的小马驹哟，
谁看了都喜欢。
聪明过人的小阿哥哟，
却被魔鬼夺去了生命。

这首民谣表达了人们对奇俊峰母子的同情和怀念。

郝游龙在杀害奇俊峰母子以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自封为西公旗保安司令。并让阿木

尔萨那充当旗札萨克，额宝斋为大协理，斯仁朋斯格，焦太保分别出任管旗章京，和梅林章京。这些人上台以后，一方面向广大牧民征收苛捐杂税，大量地搜刮民财。同时，郝游龙还出兵二百余人，在包头一带帮助国民党军队攻打解放军。后来，郝游龙因打解放军有功，被国民党正式任命为西公旗少将保安司令。国民党反共义勇军华北总司令部任命他为华北反共义勇军第七路第十九纵队司令。不到一年的时间，郝游龙扶摇直上，变成了身兼多职的反共英雄。从此，他更加明目张胆地进行抢劫虏掠，巧取豪夺，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当时老百姓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唱道：

“黑压压的乌云哟，何日才能驱散？
豺狼般的油葫芦呀，你是人民的祸害。
阴森森的黑夜哟，黎明即将来临，
丧尽天良的油葫芦呀，必定被人民铲除”。

有压迫，就有反抗。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对郝游龙等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罪恶行径，早已被其有正义感的部下道尔吉色楞、贺太保、陶克腾格日勒等人所深恶痛绝。为了给西公旗人民铲除祸害，替奇俊峰母子报仇雪恨，他们经过五个多月的精心策划和紧张

准备，共串通了二十余名军人，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中午，在哈叶胡同举行武装暴动。

贺太保原为郝游龙部下的一个团长。一九四八年三月郝命令贺太保团进驻蹬口，攻打解放军，但贺拒绝接受郝的命令，跑到了后山地区，他们一团人不仅没有参战，还同国民党张锁子团的残余部队遭遇，缴获了该团三十余支枪。郝游龙对此大动肝火，除解除全团的武装外，还扣捕了贺太保，并以所谓违背军令，从战场上脱逃，擅自缴了国民党军队的枪支，预谋投奔共产党等罪名，决定对贺太保执行枪决。但由于有八十多个牧民出来担保，才免去贺的死罪，将他流放回家。道尔吉色楞是郝游龙的特务连长，陶克腾格日勒在特务连内充任排长。他们为了执行暴动计划，经过一番侦察，了解到郝游龙在七月十八日从公庙子返回哈叶胡同，他们原打算在郝游龙回来的当天，就下手杀死他。但出乎预料的是，郝第二天中午才回来。郝游龙回来后，刚进屋开始抽大烟，这时，事先已埋伏好的陶克腾格日勒，达林太等人，立即向郝游龙开枪射击。因心慌手颤，枪法不准，他们打出去的子弹只是擦过郝游龙的头皮，未中要害。老奸巨滑的郝游龙当即炕上借机装死，一动不动。于是他们打死了郝游龙的警卫连长那木吉拉和姓任的一名副官。

陶克騰格日勒等人误认为那一枪已打死了郝游龙，未仔细查看，草率收场，便骑马往山上转移了。事后他们才知道，当时并没有打死郝游龙。在陶克騰格日勒他们走后，他爬起来，驱车到了包头。从包头请回大批国民党军队，追赶参加暴动的部队，实行了野蛮的报复。此时，贺太保，道尔吉色楞，陶克騰格日勒等人，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在乌拉山中埋葬了牺牲的士兵查干呼鲁嘎后，在锡热山一带迂回了一个阶段，最后直奔驻守四子王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古骑兵第四师毕力格巴特尔师长的部队，从此他们走向了革命，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雨过天晴，一九四九年，乌拉特草原解放了。在党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乌拉特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九五〇年仲秋的深夜，一列满载旅客的列车，徐徐开进了张家口车站。车停后，四位人民公安战士，登上火车，他们手里拿着铮亮的手枪，紧紧地对准了一个三十开外，镶有两颗金牙，头长的好似剥掉皮的木葫芦模样的人。四人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德式马牌手枪和国民党国防部乌兰察布盟保安司令的委任状。他就是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郝游龙。他是在党组织的民族上层人士进京参观团的旅途中，被依法

逮捕的。

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给郝游龙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决定让他参加赴北京国庆典礼代表团，进行参观。为了首都的安全，事前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随身携带武器。但是，从骨髓里对新制度极端仇恨的反动分子郝游龙，企图趁机在北京制造重大政治事件。根据郝游龙所犯下的新旧罪行，一九五一年春天，在乌拉特前旗政府所在地哈拉汗镇，召开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会上，宣读了乌盟人民法院判决书，然后把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罪恶累累的家伙执行了枪决。

达王在兰州的七年软禁生涯

记抗战初期达理札雅全家被蒋马挟持 到银川兰州的经过

辛文秀 张宏达

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彦淖尔盟盟长达理札雅先生，原为阿拉善和硕特特别旗的世袭亲王，字锐荪，幼年随父居住北京，曾在北平求实中学和北京大学读书，对汉文颇有研究，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蒙语尚在其次。其父塔旺布立甲拉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逝世，达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承袭父位，任命为阿拉善旗札萨克。回旗主政数年，旗务焕然一新，是内蒙各盟旗青年札萨克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的夫人金允诚是晚清皇室贝勒载涛之女。

他的祖先和罗理，于满清入关初期，康熙二十五年，上表归顺。后在平定西藏、新疆诸部落的战争中立了战功。特别是第三代王爷罗卜桑多尔济，勇敢善战，战功显著。因而受到满清王朝

的特殊恩遇，乾隆皇帝时尚公主，封为多罗额駙。后晋爵为和硕亲王、赐世袭罔替，准在北京建造府第。可谓功高爵显，盛极一时。

他的父亲塔旺布立甲拉，生前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清末民初，同在北京居官。二人结为金兰之交，塔为兄，马为弟，两家成了通家之好。民国初建时，达理札雅和马鸿逵都是二十岁出头，他们两人都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侍卫武官。他们俩因父辈的交谊，也结为把兄弟，成了莫逆之交，称兄道弟，非常亲密。

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分裂，出现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马氏父子脱离了北洋政府，投靠了冯玉祥。冯以西北联军总司令的名义，任马鸿逵为陆军第七师师长，几年后升为第四军军长。还任过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总司令。

一九二六年春，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共同倒蒋，在中原地区大战。在这场战争中，马鸿逵和他的把兄弟韩复榘、石友三，被蒋介石收买，实行倒戈，使阎冯大败，蒋介石获胜。因此，马氏父子深得蒋介石的赏识。在官场上步步高升，马福祥当了国民政府委员、青岛市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安徽省主席。儿子马鸿逵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兼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国民党宁夏省党部特派员。把党、政、军大权都抓在自己手

里，成了宁夏的土皇帝。

塔王父子，在北洋政府和蒋介石统治时期，虽没有象马氏父子那样飞黄腾达，然而却有满清王朝赐封给他们的阿拉善和硕特旗这块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政治上一直沿用封建世袭王公制度。是特别旗，直属中央政府。一九三一年，达理札雅袭位后，很想振作一番，干出一番事业，确保祖辈相传基业的完整。他在旗内加强了各苏木之间的团结，消除隔阂，采取了许多革新措施，使阿拉善旗的面貌大为改观。

此时正巧盟兄马鸿逵升任宁夏省政府主席。这位大哥兵多将广，占据了宁夏全省。阿拉善旗的地理位置与宁夏省紧紧相连，历来公私交往频繁。经济上互相依赖，互相支援，这对广大蒙汉回人民群众是非常有利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达理札雅是标准的蒙古民族性格，忠厚老实，是说一不二的正人君子风度。他满以为盟兄马鸿逵当了宁夏省主席，对我盟弟的阿拉善旗，必定会有所提携的，论公事，论私交，都应当如此。但是马鸿逵不是这样，他心怀叵测，一贯玩弄权术。他占据了宁夏这片肥沃地盘后，并不满足。时时想把阿拉善旗这块地域辽阔、水草丰茂的土地吞并，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早在民国十五年，冯玉祥率领国民军西北联

军西进途中，为了行军需要，下令在阿拉善旗的磴口设立兵站。大军过境后，当时统治宁夏的护军使马福祥，强行把磴口兵站改为磴口县。从此，阿旗磴口沿黄河一带的大片土地，便被宁夏占去了。后于抗日战争初，宁夏主席已是马鸿逵了。他以抗战需要为名，在定远营强行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准备设立紫湖县治。还派来军警联合督察处，插手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建立保甲，控制了商会，清查户口，大肆征兵、收税。又派来宁夏省银行办事处，垄断了皮毛业务。派来马宝琳的警备旅驻扎定远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控制了阿拉善旗。

通过上述事实，使达王和旗政府的官员们认清了马鸿逵的用心。必须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和抵制。因此，旗府加强了自己的军、政、警等各方面的力量，与马鸿逵抗衡。从此，两家矛盾日趋尖锐，各不相让，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一家是积极操练人马，加强防范；另一家则磨拳擦掌，准备随时进犯。

这时正是抗日战争初期，有一件事给马鸿逵造成了可趁之机。那就是：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时，达王的母亲和三弟都没来得及退出，滞留北平。北平沦陷，交通断绝，达王母子兄弟之间音讯不通。为了表达思念之情，他三弟达穆林旺

楚克，通过当时在百灵庙德王的伪蒙疆政府电台，给达理札雅发来一封电报，相约在阿旗北部会面。而这封电报被马鸿逵驻军电台收去，立即向马报告，马鸿逵得到这一报告，喜出望外，认为是天赐良机，他立即呈报蒋介石和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说达王图谋不轨，通敌叛变。朱绍良曾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电报通知马鸿逵，让达王离开旗下，率眷移住宁夏。电报原文如下：

“达王蒙兵不应开枪打行路之官兵，现在既知错误，表示服从，可告其率眷移住宁夏，以免受日伪鼓惑，藉可保该王之清白，即希查照办理，情形如何随时电报。朱绍良感午。”马鸿逵接到朱绍良的感午电报，立即派三个团的兵力，围攻定远营。这三个团是王有禄的步兵第一团、何玉魁的步兵第二团和马鸿宾部的张海禄步兵团。由马腾蛟任总指挥，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将定远营四面包围。砍伐树木设置路障，以防达王突围出走。而城内王府中的达理札雅，虽说早有戒备，但没想到马鸿逵的部队来得如此突然。当时城内只有少部分保安队和他的护卫人员，总共不过百人，力量单薄，大部骑兵保安队都在牧区，一时无法集中，发现自己已被包围，只好仓促应战。他将保安队和卫士分为两路，以一部分守卫定远营的制高点即城后

面的营盘山，此山是定远营城的屏障，山顶筑有兵营三座。能守住此山，定远营城是万无一失。以另一部分上城墙拒守。

马腾蛟于当日黄昏后下令攻城，他们也是先以营盘山为攻击目标，打算先攻占此山，再行破城。但马部对城内情况虚实不明，且又惧怕蒙古骑兵的精良骑射，始终未敢接近城墙和营盘山顶。虽有少部分士兵攻至山腰，遭到山上保安队的还击，便立即退下，只在远处放枪，双方就这样枪战了一夜，直到天亮，马部才发现城内守兵很少。马腾蛟再次命令强攻，首先用迫击炮向城内轰击，欲击毁阿旗电台，割断与外界联系。

此时定远营商会会长李吉堂、王兴斋与回民中有声望的仕绅周生祥（人称周四爷）清真寺长老马金虎等人出面调停，要求双方停火，进行谈判。

经马腾蛟电话请示马鸿逵，马鸿逵就坡下驴，同意停火，但要达王立即前往银川。达王则要马鸿逵先行撤兵，再行谈判，并表示不去银川。经周生祥等人几次进城与达商谈无效，双方形成僵局。此时马鸿逵又想出一条妙计。既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又可软化达王，以达到他控制阿拉善旗的目的。把他的母亲（人称河州老太太）和马鸿宾用汽车送到定远营。对达王进行劝

降。马老太太和马鸿宾到达定远营，下榻在清真寺傍的周四爷家中，通知达理札雅出城来见。前面说过他们两家是世交，河州老太太应是达王的婶母，马鸿宾是堂兄，当他听到婶母大人和堂兄亲临，先是一惊！继而一想，既是老太太和堂兄出面。谅无恶意，礼应一见。于是便携同夫人金允诚出城到周四爷家中，与老婶母和堂兄见面。见面后诉说了大哥对他的无理行动，以武力相逼，欺人太甚等情。马老太太，当然向着自己儿子，马鸿宾也偏着兄弟，他们一面替马鸿逵辩解，说这一事件是因部队换防，发生误会；一面劝说达理札雅放心，请他们全家去银川暂住一个时期，两家应消除误会，和好如初。并以婶母、堂兄身份担保他全家安全无事。达理札雅经过再三考虑，心想既有婶母、堂兄担保，谅也无妨。便答应暂到银川小住。当即和马鸿宾签订了九条停火协议。原文如下：

- 一、城门由旗府派门岗二名严禁军队入城。
- 二、旗府留存长枪二十枝，手枪四枝、八音枪两枝。
- 三、请马师长暂住定远营镇摄。
- 四、派巡查官兵维持附近秩序。
- 五、应驻部队及早决定由双方派员安置。
- 六、请陈调查员永治从中帮忙。

七、速撤四周防务恢复交通。

八、由旗府派员赴各地宣传解释误会。

九、驻军一切用品旗府在城外设一办事处，由团部派军需员接洽。马鸿宾盖章。达理札雅签字。

另外签订了九条“驻定团部与旗政府会同办事条例，”原文如下：

一、团部与旗政府各派委员两名担任稽查工作并设立办事处处理一切事项。

一、当地素不安分无正当营业者一律驱逐出境。

一、严禁兵士无故入城或乱入城外民家。

一、来往经过行人或由包绥来者尤要注意间谍汉奸，即有认识之人亦必觅妥保并不准久住。

一、检验旅客由本人亲手解行李，军人不准动手或掏摸旅客衣袋，以避瓜李之嫌。

一、凡本旗蒙民来往贸易者由蒙员负责稽查，驻军不得为难。

一、军人不得随便进城，如有接洽事件可到办事处商议。

一、驻军负城乡治安责任。城内治安由旗政府负责。

一、办事处如有重大事件不能就地了结者随时向宁夏长官请示，不得擅行刑罚或耽延日时。马鸿宾盖章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一日。

这两个协议签字后，他草草收拾一下，就带领全家及随从人员，跟马老太太与马鸿宾乘车到了银川。马鸿逵已为他一家的居住作了安排，在银川市鼓楼北大街东巷，准备下一所院落，铺陈设备齐全，让达王一家居住，一切生活费用开支，均由宁夏负担。离定时的随行人员，政府官员有罗巴图孟柯、张仁、张元忻，副官张宏达、王韞德、罗甲木素。照料生活起居的有张根敦夫妇，魏双桂、王喜喜、张根年，轿车司机孙玉科，卡车司机万振标。

居住不久，银川市发生白喉传染病，达王的三女儿换格被传染而死，达王夫妇十分悲痛，认为住宅不吉利，便向马鸿逵提出迁居，马也表示同情，又在银川磴子市将教育厅厅长童耀华的旧居拨给达王居住。为了摆脱马鸿逵的羁绊，在磴子市居住不久，他便退去马鸿逵的一切款待，自己在银川小庙巷买了一所院落，迁入居住，一切费用开支由阿旗自理。

当时对阿拉善旗的问题。蒋马之间是有矛盾的。马鸿逵一心要把达王掌握在自己手中，扩大地盘。国民党中央不同意，便指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邀请达王迁往兰州居住。特派第八战区长官部总参议张春浦到银川当面邀请，马鸿逵迫于上命，只好服从。达王便于当年九月乘欧亚

航空公司的飞机到了兰州。朱绍良早有准备，命令甘肃省政府在兰州五泉山十四号为达王设立公馆，拨发经费，派员接待，设置了警卫，达王来到兰州居住，摆脱马鸿逵羁绊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达王迁居兰州，实际上就是被国民党软禁。他自己则是身在兰州，心怀故乡。在兰州聘用了谢翰年等几位文案人员，在住所设立起办事机构，就是阿旗驻兰州办事处的前身。达与旗内函电往返，密切联系，指示机宜。那时旗内政务是由协理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呢巴图，白诚禧，段巴图尔等人主持。这些人在牧民中威望很高，又都是达王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在国民党和马鸿逵反动势力面前，没有被吓倒。他们与被软禁在兰州的王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加强与广大牧民群众的团结。努力整顿旗务，加强戒备，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精神，继续与国民党周旋，与马鸿逵抗争。在定远营旗内，加强充实稽查局，增设一个警察队，编制四十余人。理事官厅增设一个法警队，编制为三十人。对保甲长、商会、各手工业行会都加以控制。严格禁止保甲长到牧区抓兵或搞其它活动，严防马家势力向牧区渗入。

马鸿逵也不示弱，除了从政治上加强控制和

经济上加紧掠夺外，又对阿旗实行粮食禁运。他严禁宁夏一带的粮食进入阿旗。派军警联合督察处负责查禁，查获贩运粮食的农民或商贩，人即治罪，车马骆驼、粮食等一律没收。造成阿旗境内粮食奇缺，粮价飞涨，使广大劳苦大众都在饥饿线上挣扎。

趁达王被软禁兰州之际，马鸿逵以抗战需要为名，呈报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要在定远营设立县政府，与旗政府对立，造成旗县并存局面。达王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与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等旗府官员们取得联系，并根据历史根源和蒙旗地区的现实情况，都不宜设县，如设立县政府，恐怕地方生变为由。呈报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据理力争。蒙藏委员会权衡轻重，慎重考虑后，没有批准马鸿逵的设县报告。

达王在兰州过着被软禁的生活。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是一种含冤负屈的心情。但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以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精神，在兰州作了大量工作。首先在住所设立起办事机构，与旗下保持着密切联系。对旗内事务指示布置，起着遥控作用。凡有对外的重大事件，他在兰州就近与第八战区和甘肃省政府有关部门交涉解决。阿旗对外事情最多的是盐务，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征驼、征马、征兵等事务也日渐增多。这些

方面的纠纷都是他在兰州出面解决的。例如运盐蒙驼的运费及池租的调整等都经他妥善处理，维护了牧民利益。他在兰州的个人交谊也很广泛，和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党政军官员交朋友，如与朱绍良、谷正伦、胡宗南、张春浦、水梓等人过从甚密。重庆的国民党要员如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吴忠信、赵丕廉、顾祝同、陈诚等来兰州时都要拜访达王。通过与这些人的交往，加深了国民党对他和阿拉善旗的了解。

达王关心民间疾苦，素有“善人”之称。遇到灾年即下令豁免牧民的“色道”即草头税。如一九三九年定远营发生了白喉传染病，死人很多。那时阿旗没有医疗设备，私营药铺，私人医生的药价与诊费昂贵，一般贫民得了传染病，无力治疗，只有等死。记得那次白喉病漫延。商人周行山外号周大头，存有一批特效药白喉血清，奇货可居，他以五块银元的高价出售，获利无数。这次疫情由旗政府电告达王，他立即自解私囊，在兰州市购买了一批白喉血清，送回定远营，给白喉患者注射。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达王为向国民党当局申辩马鸿逵对他的诬陷，曾于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冬），亲赴重庆谒见了蒋介石、何应钦、吴忠信，申诉了冤情。此后，旗政府的官员们也联名上书蒙藏委员

会和第八战区长官部，代表全旗牧民强烈要求达王回旗主政。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同意让他回旗。于是他于一九四四年八月，携眷由兰州经草地回到定远营，重新执掌旗政。结束了他被软禁七年的苦闷生涯。

乌拉特中公旗地方 武装力量的演变过程

韩葆 口述 包瑞峰

那顺巴雅尔·山都记录 整理

一、建立地方武装组织的背景

乌拉特中公旗的地方武装组织，始建于二十世纪之初。在大清国时的乌拉特各旗、苏木，不仅是个军事组织，也是个行政组织。从满清到二十世纪初这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地处边境的乌拉特中公旗，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人们靠经营畜牧业和打猎维持生活。封建王公贵族们，世世代代统治、压迫着这里的贫苦牧民们。牧民们只知道拜天地、拜活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从未发生过什么大型变乱。因此，军事机构松散，弓箭、火炮成了人们打猎用的工具。人们的生活虽然贫穷落后，但也算得太平清静。

一九一一年七月，在沙皇俄国的阴谋策动

下，喀尔喀宗教信仰的总头子哲布尊丹巴活佛，勾结一批封建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人物，从各旗招集军马，用俄国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妄图登上全蒙古帝国大可汗之位。此年十月十八日，驻大库伦（即乌兰巴托）的沙俄特使，代表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反叛集团宣告所谓“独立”，向驻守在大库伦的满洲都统的护卫军发起进攻，缴了护卫军的武器，并把山道等满洲官吏从喀尔喀蒙古赶了出来。

一九一三年，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反叛集团，还发动了有名的“乙丑大乱”，气焰十分嚣张。叛军到达乌拉特中公旗乌拉山北部翼公宝力格附近时，和从包头来的民国昆庚部队相遇，双方在哈达莫勒北口激战了三个月。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欧国家之间互相残杀，无暇东顾。中国国内是袁世凯掌权，政治形势很不稳定。战乱频繁，盗贼蜂起，掠夺成灾，民不聊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沙俄吞并蒙古的计划失败了，哲布尊丹巴当蒙古大可汗的美梦也破灭了。

喀尔喀叛军撤走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九年间，以芦占魁为首，纠集巴雅尔公、达来公、喀喇沁贺喜格图、嘎日扎老五、嘎海苏龙等约三

千余兵马，全部用俄国武器装备，集结在武争（现乌拉特中旗德岭山乡的乌兰道布），重新打出“独立”旗号，自称“独立”部队。这些匪徒到处抢劫，强奸妇女，为所欲为，残酷欺压人民群众。特别是嘎海苏龙那一伙，为害更大。牧民们称他们是“独立匪徒”。

当时，乌拉特地区不仅有大量的“独立匪徒”，而且还有三、五成群的小股匪徒。有的拥有枪支弹药，有的只是手持棍棒刀剑，或拦路抢劫，或打家劫舍，无法无天，人们把他们称作“棍棒队”。

匪徒如此猖獗，乌拉特中公旗札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却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他只顾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一家人的安乐，全然不管民众的死活。事实上他的生命财产也难以自保，不得已携带全家老小逃到险峻的巴日哈山躲避匪祸。

一九一八年，土匪头子喀喇沁贺喜格图等七人，在抢劫途中碰上了巴布道尔吉诺颜。匪徒们大喜过望，认为是上帝赐给自己的一块肥肉，便大肆抢劫。他们威胁巴布道尔吉说：“你要按时把金银、枪支弹药、骑乘给我们送来，不然就要你的命。”巴布道尔吉诺颜又急又怕，立即答应了所有的条件，并请求推迟交物时间。喀喇沁贺喜格图说：“可以推迟交物时间。我们今后长期

在中公旗，你什么时候都逃不脱我们的掌心，你的命运就在我们手里握着。”说完，牵上巴布道尔吉诺颜用七个元宝买来的，据说日行八百里的“乌拉特乌湖纳”宝马，扬长而去。

巴布道尔吉当时带有步枪，他很远就看见七个匪徒向他逼近，本来他是完全可以自卫的，但由于他胆小怕事，才束手被擒。

一九一九年的正月初一黎明时分，巴布道尔吉一家人正在叩拜天地神灵之际，突然听到了马蹄声，见几个骑马的人向山顶冲来。巴布道尔吉丧魂落魄，立即带着全家人爬过山顶，才逃脱了被又一次抓获的命运。匪徒们没有抓住巴布道尔吉，气得咬牙切齿地说：“总有一天会碰上我们的！”巴布道尔吉吓得魂不附体，当夜就选了一批好马、好骆驼，准备好驮运，带着全家老少和金银财宝，向西北方向逃去。到底逃向何处，他没有给任何人透露，连旗衙门都未通知。后来旗衙门派专人寻找，才知是他躲在阿拉坦豪日古山乌嘎拉计的乌兰哈达。

匪徒肆虐，无人幸免，无人不怕，连札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也东奔西窜，何况平民百姓！对札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不管民众疾苦、懦弱逃跑的表现，人民怨声载道，当时的都统那顺贺喜格也十分反感。从上层统治者到平民百姓，都认为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保卫家乡，救民于水火，确实势在必行了。

二、武装组织的建立经过和发展壮大

一九一九年春节期间，那顺贺喜格都统到了本巴吐庙，和曾经当过桑达庙东庙仓活佛、旗协理的萨仁嘎商量为保卫家乡成立部队事宜。决定：

1、从中公旗西部地区选拔二十名枪法好的猎手，作为武装组织的骨干力量，再招收两名新兵，成立一支二十二人的队伍。那顺贺喜格都统还把自己的两支别旦式步枪和二百发子弹捐赠给新建立的队伍。

2、二十二名兵分为两个“什”，每个什配备一名什长。什长带别旦式枪，其余人员仍带火枪。

3、军队的骑乘、粮食、肉食，暂由桑达、本巴吐两庙给予准备。

那天，在本巴吐庙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典礼。首先是升旗仪式、祭钟、放礼炮，接着，新组建的骑兵队伍雄纠纠地绕本巴吐庙转了三圈，举行了游行。

来参加典礼的牧民很多，他们献上奶食品，慰问了部队，说了许多祝福的话。

那顺贺喜格都统也在典礼上讲话，中心意思

是；保卫家乡是每个人的神圣任务，鼓励士兵们英勇杀敌。他在讲话完毕后，亲自向新兵敬酒，大大激发了战士的斗志，鼓起了他们消灭匪徒的勇气。

新成立的部队没有辜负父老乡亲的祝愿。军队建立不久，即和“独立匪徒”作战，打死匪徒三名，缴获了他们的步枪，把军队扩建为二十五名。

胜利的喜讯象春风似的传遍了乌拉特草原，广大牧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到巴布道尔吉诺颜的胞弟朱日梅德道尔吉的耳朵边。朱日梅德是个武警官，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感动，对那顺贺喜格都统建立军队，消灭土匪，保卫家乡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事迹大加赞扬，并表示支持。他和那顺贺喜格商量后，决定到喀尔喀购买枪支弹药，扩大武装部队。

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朱日梅德道尔吉不但拿出了自己的金钱，还向富户借钱，准备好了运输工具和食品，领上五名枪手，改扮成商人模样，出发去大库伦购买枪支弹药。

到大库伦后，他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仍以商人身份和那里的俄国商人广泛接触。经过多次接触，相互比较熟悉后，达成了购买枪支弹药的协议。共买了五十支别旦式步枪，七千二百

五十发子弹和一部分靴子。为了途中安全，还买了两支手枪，以备防身之用。返回途中，夜行昼宿，终于安全返回。

回旗后，同那顺贺喜格都统商量，又招收了五十名新兵，委任了一名队长，一个保管员，共五十二人组建成一个队。队长配备了手枪。这个队称为“西路军”，驻守在乌加河口。与此同时，对第一批组建起来的二十名火枪手，进行了表彰，并把他们全部遣散回家，没有特殊情况，不再召他们回来服兵役。

中公旗虽然以新式武器装备组建起了一支五十二人的军队，但力量仍很薄弱。朱日梅德道尔吉同族里的各位都统研究，决定再次去喀尔喀购买枪支弹药，继续扩大武装力量。当年九月初，朱日梅德道尔吉带着金钱、运输工具、食品和随行人员，二进大库伦。这次他是身着官服，以公开身份同喀尔喀官吏接触，通过他们买到了一百支连九枪，三千发连九枪子弹，五支手枪，一千发手枪子弹，于十月底返回中公旗。朱日梅德道尔吉召集各位都统和官吏，讨论了第二次整顿扩充军队的有关问题，又招收一百兵，分成了两个队，分别称为“中路军”和“东路军”。每队配备了三十六支九连枪、十六支别旦式枪，每支枪带子弹一百发，并给每个队长配备手枪一

支，带子弹一百发，队长拥有长短两支枪。这两个队分别驻守在雅玛吐和宝日特格等地。

这两个新建队都分编了五个什，分别任命了什长。给养方面，每队每月供给二百一十斤炒米、九十斤粮食，两只羊，一块茶，三十斤盐，过节时每人配给二斤白面，以及军队所需骑乘、蒙古包等，均由六个苏木供给。新军成立时，旗里每人发给一条红头巾和一个黑边红坎肩。坎肩前面和背后镶有碗大的白布，上面用汉字写着“乌拉特中公旗游击队”，显得颇有精神。

大约到一九二一年，驻在乌拉山南部昆都伦庙的宝尼亚什和乌拉山北部沙德盖的巴音贺喜格什都增加了新兵，又编为一个队，称为第四队，驻守在乌拉山。第四队的给养从好林吉勒山、南明安山、西纳嘎山等地的土地税和水草税中解决。因此，第四队的供应比其它三个队要好一些。

三，中公旗地方武装力量的活动情况

中公旗地方武装力量建立以后，主要开展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轮流驻守旗司库。经常有三个什的兵力轮换守护。这些守护司库的兵士，战时作战，无战时还抽出力量给衙门当差，干一些其它杂活；二是征剿匪徒，保卫乡民。随着军队力量的发展壮大，那些“独立土匪”的声名日渐

低落，他们盘据的地盘日渐缩小。当时，许多被迫加入匪伙的乌拉特籍的牧民，纷纷弃暗投明。象达瓦敖斯尔、敖特恒宝日、套格来、苏德宝、朝鲁等青年人，都先后设法脱离了土匪队伍，加入了旗军。

值得特别书一笔的是那个叫敖德恒宝日的青年人。他在土匪头子嘎海苏龙手下干事多年，深得嘎匪信任。在旗武装力量的影响下，他决定脱离匪伙，投靠新军。他决定杀死匪首嘎海苏龙，作为进见之礼。一天，他在给嘎海苏龙拆擦手枪的时候，趁其毫无戒备，从脑后给了嘎匪一枪，当即毙命。敖特恒宝日带上他的枪，骑上他从巴布道尔吉手里抢来的“乌拉特乌胡纳宝日”走马，加入了西部地区军队。敖特恒宝日被誉为一有胆有识的聪明青年，后来任命他当了队长。

旗军里有了敖特恒宝日这批有战斗经验，又非常熟悉土匪活动规律的青年，对消灭“独立匪徒”如同猛虎添翼。匪徒很快就被消灭，并且武装、壮大了旗军。

旗武装军队的第三项主要活动是保护过往商队的安全。一九二四年，火车通到了包头。这对内蒙地区和山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联系、通商起了很大的作用，呼和浩特和包头成了运输和商业的集结地。西北地区的商人把本

地的畜产品和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呼包两地。但是，由于局势混乱，偷盗和匪徒的骚扰、抢劫，给商队造成极大威胁。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一月，甘肃省的六个鸦片商人带着三百驼驮向呼和浩特进发。驮队经过中公旗明安忽日热河畔时，遇到了匪徒，三百驼驮全部被抢，六个商人都被打伤。甘肃省商会会长白辉章连吓带伤，到呼和浩特后就死了。因此，甘肃省商会的三十六家大商号讨论研究聘请军队护送驮运之事。因中公旗军队在剿匪方面颇有名声，所以决定聘请中公旗旗军护送驮运队。他们选派同义隆商店的掌柜徐景亭从呼市到包头接洽。当时乌中公旗在包头设有办事处，由德力格尔仓负责。徐景亭到包头后，协同包头商人吴老洪面见德力格尔仓，拿出聘书，说明护运代价，决定每护送一驮货物给六角钱，护送一驮鸦片给十个银元，半驮子鸦片给六元。德力格尔仓派人向札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汇报，巴布道尔吉和拉喜、古特黑两位都统协商后，觉得一旦出了差错，赔偿不起，因此没有批准。

三十六家大商号觉得雇用其他地区军队护送，很难在中公旗土地上立足，麻烦较多，因而二次派徐到包头商洽，要求中公旗派护送兵。德力格尔仓亲笔致书巴布道尔吉等人，而获得批

准。并决定一旦出了问题，由旗司库赔偿，与旗衙门无关。巴布道尔吉诺颜从乌拉山神枪手中选出了二十名有经验的老兵，全部用新式步枪武装起来，让他们驻守在德日素海子，专管护送驮运。这支军队称为第五队，由额尔贺木巴雅尔任队长，一切开支从护送驮运税中支出。

护送驮运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八日开始。约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绥远省发给中公旗军队五枚印章，把游击队改为治安部队。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甘肃省的鸦片驮运队到达德日素海子时，正遇护运的旗军外出，他们大胆继续东行，到戈壁乌兰胡哨时，碰上了三个匪徒，被抢走了三个骆驼，一个人被绑架，其余人员吓得返回德日素海子。此时，护送驮运队去百灵庙的五名骑兵正好赶回，由三个人继续护送去百灵庙的驮运队，塔扎布，老布生尼玛二人前去追赶被抢去的三个骆驼子。他们追踪到了莫日根，从贡格尔第八队门前经过时，向匪徒开了枪。匪徒听见枪响，留下骆驼和被绑架的那个人，慌忙逃去。这次事件虽未造成什么损失，但说明护送兵人员不足。于是，又从乌拉特南部调来二十名青年兵，护送队伍扩编到四十名。

在这支护送商队的军队中，有个叫昂齐德的

人。此人家住乌拉山哈达门河附近的胡荣河畔，（现包头市郊区好雅日敖包公社乌兰计大队阿嘎如太牧业队夏营地）。他经常在乌拉山里打猎，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举枪就打，百发百中，是有名的神枪手。当时，游窜在哈达门河附近的独立匪徒因分赃不均，反目为仇。一天，正在打猎的昂齐德碰上了一伙匪徒，叫昂齐德带路去打另一股土匪。当这伙匪徒在雅海河畔一户人家，包围了另一股匪徒后，双方接火。昂齐德坐在旁边看他们射击。那个匪徒头子用那样好的枪打了那么久，也未打中一人。昂齐德无意间说：

“拿这么好的枪，离这么近也打不着，你真笨”。土匪头子听到后，站起来说：“你这个吹牛皮的家伙，你打，打不住我就让你脑袋开花”！昂齐德接过枪来，举枪就打，接连打倒了几个匪徒。战斗结束后，土匪头子向他的弟兄夸奖昂齐德的好枪法，并问他的姓名和住址，说：“你帮了我们的忙，认识认识，交个朋友吧”！说完扬长而去。

昂齐德是中公旗南部地区军队成员之一，经常承担呼包商人的护送任务，曾打死打伤匪徒多人，“独立匪徒”对昂齐德既害怕又气愤，一心想把昂齐德杀害。这伙匪徒打听到了昂齐德家的住址，便把他家包围起来。

那天昂齐德正好在家。当匪徒们接近他家时，家里人说：“从套都河来了很多骑马背枪的人”。昂齐德说：“一定是土匪！”他立即拿上火枪，跑进羊圈躲起来。匪徒们闯进家门，问他妻子：“昂齐德到哪里去了？”他妻子回答说：“上山打猎去了”。那些匪徒说：“这家伙的死期还不到，下次再说吧”！

正当匪徒们盘问他的妻子时，昂齐德偷眼一看，正是那次让他引路的那伙匪徒。一时火起，连发十多枪，打死了十多个匪徒。他把缴来的十多支枪交给旗军，武装新兵。他陆续打死了四十多名匪徒。

但是，匪徒们总是思谋着想把他除掉。有一次，昂齐德护送一批包头商人。当行走到包头西门外查干敖包西边时，昂齐德背着枪，骑在马上吸烟。这时，从驮运前方来了两个漂亮的小伙子，手里拿着香烟，要和昂齐德讨火。昂齐德伸手给他们从怀里掏火柴，两个青年突然拔出手枪，命令昂齐德：“把枪交出来”！昂齐德说：“行，行！”边说边拿枪，随即开火，一个青年歹徒应声倒地。另一个看势不妙，扭头想逃，昂齐德举手又是一枪，也结果了他的性命。

那些商人们目睹昂齐德消灭匪徒的情景，十分高兴，当天也不走了，在包头工商委员会设宴

招待，以示庆贺。昂齐德的事迹传遍了包头的大街小巷。

绥远省政府听到昂齐德的事迹后，向中公旗发出邀请书，要中公旗承担护送绥远省北部地区护运任务。可见，当时中公旗在护送商队、打击匪徒方面是成效卓著的。

四、护送贸易商人引起的纠纷

中公旗巴布道尔吉诺颜通过护运收取了大量税款，上层统治者十分眼红，为争抢这个肥差引起了许多矛盾和纠纷。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中公旗衙门从德日素海子护送驮运税中收取了一千元。第二年还要一千元，巴布道尔吉没有给。因此，旗里给盟长去信，告德力格尔仓、额尔贺木巴雅尔二人，随便建立军队，给贸易商增加负担。盟长当即指示，叫额尔贺木巴雅尔带上账目去听训。额尔贺木巴雅尔和韩葆二人去后，盟长要从护运税中抽取一半。额尔贺木巴雅尔只好交了六千五百元。

一九三四年四月，德穆楚克栋鲁普当了蒙古政务会的秘书长。他在陪同班禅到伊克昭时，在中公旗住了几天。当他得知中公旗护商情况后，也觉得是块肥肉。他返回去后，派达尔罕旗阿日斯仁都统带一部电台和四卡车兵到了中公旗，并专

门派了七个税收人员驻在德日素海子。绥远省也派一个局长在德日素海子建立了税收站。

双方对税收款分配达不成协议，绥远来的局长向傅作义汇报了情况，傅作义派一个团的兵力开到德日素海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听到这个情况后，也亲自率领六卡车兵到了宝日汗图河旗衙门。后来，傅作义决定从所得税中分给蒙古政务会百分之八，总算没有造成流血事件。德穆楚克栋鲁普先撤兵后，傅作义撤了一半兵，另外一半兵力在傅作义到陕坝后才撤回。

一九三四年，绥远省先后派刘永峰、陈玉亚两次委任巴布道尔吉为绥靖北部公路司令。巴布道尔吉权衡利弊，终于接受了这个职务。司令部设在包头，委任德力格尔仓为参谋长，韩葆、拉喜管辖为副官，额尔贺木巴雅尔为副官组组长。贾雅平分管军费开支；宾俊分管文书工作；巴拉登翻译分管蒙古语文工作。诸事安排妥当后，准备护送驮运。

当时，在那仁乌布尔住着很多西公旗的牧民。因而西公旗在宝达日嘎纳住着由阿拉坦齐鲁为首的十多名兵，收取水草税。西公旗的斯仁宝也想参予从中公旗到包头的护运，即以撤回阿拉坦齐鲁为名，派一百五十名兵进驻那仁乌布尔。此时，林沁僧格和韩葆在呼和浩特开会，立即派

人探听真伪，当弄清情况属实后，韩葆乘一辆卡车，领上四十个人直接到那仁乌布尔，并给西部地区去信，让从那仁山北面过去，观察斯仁宝部队的动静。

韩葆到那仁乌布尔后，了解到阿拉坦齐鲁不在部队，只有一什长看守。韩葆便指示部队把阿拉坦齐鲁的枪支弹药、饲料和三千斤白面全部运走。

两天后，斯仁宝的三十名兵来到那仁乌布尔，一看情况，把那个什长毒打一顿，圈了起来。那个什长当夜逃跑到了韩葆的部队。次日晨，发现那个什长逃跑了，便报告斯仁宝。斯仁宝的一百二十名兵住在东升庙，也无计可施。临河县也挤赶斯仁宝，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退兵。

然而，护运税收的诱惑力毕竟很大，斯仁宝不肯就此罢休。他同包头的警备司令取得联系，秘密把一连兵调往宁夏，护送二百多驮驮鸦片向包头进发。到达那仁乌布尔时，被中公旗第五队阻挡。他们开上收税单据，斯仁宝的兵拒不交纳。韩葆听了汇报后，领兵到敖兰宝力格拦截。韩葆和从宁夏来的营长协商，那个营长仍然拒不交税。韩葆便把那位营长和包头来的连长的枪缴了，逼迫兵士把枪都放在院子里，才放他们走。

那些商人一看情况不妙，便脱掉伪装的军服，交了三千大洋，这才把枪械归还给他们。

在护送驮运的九年中，矛盾时有发生，但收入可观。共收取税款二十九万元，三分之二交旗司库，三分之一用于军费开支。韩葆用此款还购买了七辆汽车搞运输，得运费八万余元，也全部交给了旗司库。

五、中公旗地方武装组织的最后归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接着，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在短短的九个月内，接连占领了内蒙古各旗，从北京到包头的铁路沿线主要城市，亦被占领。从而，山、甘、宁以及青海、新疆的商人不敢到包头、呼和浩特经商。护送驮运亦随着终止。驻德日素海子的中公旗第五队，仍然回到乌拉山，同那里的驻兵联合。联合后，人员增多，吃粮困难，适遇好林吉伦山要求增加兵力，便选了八十人以朝鲁为首，到好林吉伦山驻防。

一九三八年，驻防在好林吉伦山的部队，被大余太的武驼羔、乔二安部队缴械，没收了全部物资，这支部队即作鸟兽散。

一九三九年，乌兰察布盟在乌拉特中公旗成立了第六大队，巴音贺喜格任队长，驻守在杭盖努齐。这支部队有一百名兵，武器由德穆楚克

栋鲁普供给，全部费用由乌兰察布盟负担。约在同年，呼鲁斯太驻守着一支以那顺贺喜格为首的武装警察部队。在温根特格驻守着西公旗、沙巴嘎等地的一支边境警察部队，均属乌兰察布盟警察厅管辖。

一九四〇年，中公旗的其余部队被傅作义攻打包头的部队打散，只留下斯坦巴的二十余人。

一九四四年六月，德穆楚克栋鲁普把伪乌兰察布盟边境警察改为伪蒙古第六团，林沁僧格为团长。在乌拉特中公旗建立了一个营，由雄努任营长。巴吐毕力格、巴图任副营长（为内蒙古骑兵总司令部所派）。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夜，傅作义的部队突然向杭盖努齐、斯日本朝力亚、川井、乌力吉图、宝日胡哨进攻，把札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一家绑架到陕坝。从此，中公旗的武装部队就名存实亡了。

一九四五年春，乌兰察布盟把伪蒙古骑兵改编为治安部队，驻守在东升庙。委任雄努为中公旗治安部队少将司令，陶布其为中校副官，斯仁巴图为参谋处中校副官。这支部队分为中、西、东三个队，西队队长是孟和图斯日古楞，中队队长是敖日布，东队队长是塔苏斯日古楞。

一九四五年九月，巴布道尔吉，雄努二人又

在昆都仑庙组建了以朝鲁为首的一支部队，有两个连的兵力。第一连连长为布仁巴图，第二连连长为曾格，称为第二大队，逐步夺回了失去的地盘。为了收取租金，支付军队开支，还在台梁建立了雄民乡。

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旗第一大队整编为旗治安部队；第二大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蒙四师。

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

——大盛魁

孔祥毅

“通事”，是古代北方人对翻译人员的称呼。“通事行”，是清代对会说蒙古话，专门从事对蒙古和俄国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行的称呼。在清代，蒙古族以放牧为业，鄙视商业，生活用品和自己生产的畜产品的买进卖出，全赖汉族商人，遂出现一种专门“跑草地”的通事行。大盛魁，就是清代北方最大的一家通事行。极盛时，它的职工有六、七千人，骆驼商队有骆驼一万六千头到二万头，业务重点在内外蒙古，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以及内蒙古各盟旗和新疆乌鲁木齐、库东、伊犁、塔尔巴哈吕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内地则以北京、山西、山东、河北、湖北、湖南、广东等省为主要活动舞台。其资本周转额，仅在外蒙古即达一千万两白银以上。它的全部资产，人们说：“可以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一)从“丹门庆”到垄断商行。

大盛魁的创始人，是清康熙年间的三个穷汉，即山西太谷县武家堡的王相卿和祁县祁城村的张杰，史大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他们因生活无着，随着康熙征剿噶尔丹的部队进入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前营），科布多（后营）做生意。当时仅是肩挑小贩，蒙古人称为“丹门庆”（货郎）。征服噶尔丹以后，清兵移驻大青山后的武川，而部队供应仍大部依靠该部原驻防地山西右玉杀虎口。三人后来就在杀虎口开了一个名叫吉盛堂的商号。到康熙末年（亦即雍正初年），吉盛堂改为大盛魁，设总号于外蒙古科布多，以后又设总号于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大盛魁的股本很特殊，一般商号仅有银股（资本股）和身股（人力股）两种，它则有财神股，银股，身股和狗股四种。传说，最初三人经营的小通事行，经营了数年，营业极坏，甚至连食用也赚不回来。一年除夕，伙计三人熬了一锅小米粥过年。刚端起碗，来了一个身穿蒙古袍的人拉着头骆驼要投宿，三人殷勤接待。来人放下行囊，即说出去找朋友，一走不返。以后长期查访亦无下落，打开驮子，尽是白银。三人商议将这笔钱当作贷款使用，按本计息，另帐待还，但数十年以后仍无人认领。他们临终时吩咐子孙说：

这是财神送来的钱，记入“万金帐”，算作财神股。此股所分红利，专项存储，作为护本。那位身着蒙古袍的人究竟是外出后身遭不幸，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今不可考，然而财神股则延续下来，到民国年间，仍参加分红。这是财神股的来历。至于狗股，传说不一。一说某年库伦遭灾，物价上涨，让狗送信归化，大盛魁及时得到商情，囤货北运，获利丰厚，狗立了大功；一说一次经理单人行走，途中病倒在草地上，是狗报了信，救了主人；一说草原无路，易迷失方向，狗可以领路，且能在途中起保护作用。所以，大盛魁的狗地位很高，凡养狗者，均顶狗股，每条狗可顶一，二厘，参与分红。大盛魁经常养狗八百到一千多条，每当养狗到一千条时，就要给狗演一台戏。

（二）组织机构和经营对象

大盛魁的组织机构精干，灵活机动，指挥如意，办事效率较高。总号经理掌握人事安排、公积金运用、货物进出以及财务会计、营业管理等大权。下属机构，按不同性质分两部分：一种是直属机构。在外蒙古只有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个分号，不设过多的中间环节。总号对直属机构直接发号施令，各营业单位在总号的直接指挥下，由归化城载货外出销售。收购回来的牲畜，

皮毛和药材等土特产品，也交总号统一经销。整个蒙古地区东西六千多华里，南北二千余华里，基本是依靠总号和两个分庄组织贸易活动，并垄断着蒙区贸易。这里就有着大盛魁组织管理的独特之处：它销售商品主要不是靠开设铺面在柜台上做生意，而是利用骆驼队在草原上流动贸易。当时人们称骆驼队为“货房子”，每顶货房子包括帐篷一顶和三个押货人（由三头骆驼运载），一匹找水用的马，七至十条狗，下有骆驼十四把，每把十四头，一把骆驼连成一串，由一名驼工拉牵，每顶货房子共有骆驼和马二百头，职员和驼工二十多人。每顶货房子就是一个销货单位，由归化城总号运货到外蒙后，每顶货房子就暂时分把分别进入指定的盟旗进行贸易。到旗之后，将货物成批赊销，不做零星买卖。这就是大盛魁的批发部分。另外再组织一部分骆驼队，专做串蒙古包的零售业务。驼队大小，视商品情况，有分有合，灵活变换，有时是一顶房子的驮队，载着帐篷货物；有时只用三、五头或一二头骆驼，驮着少量货物，住在蒙古人的毡房里做买卖。这种骆驼商队有大有小，有来有去，串东走西，由归化城总号和科布多、 乌里雅苏台分庄直接调度。

另一种是“小号”。它与驼队的毡房贸易不

同，是由总号投资独立经营的单位，进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总号是“小号”的财东。“小号”进货和销货均由自己直接组织。最初，大盛魁运往蒙区的百货，仅在归化城购进，随着业务的发展，资本的扩大，为了保证货源和商品的质量，扩张业务，便自己投资，逐渐开设了许多经营各类业务的“小号”。这些“小号”的购销活动，多以总号的目标为目标，必须服从总号的全局利益。这些“小号”按业务大体可以分作普通商品经营业务和货币经营业两大类。经营普通商品的“小号”，大多设在内地，主要任务是购进内地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前述直属骆驼队货房子采办商品和推销畜产品，在不违背总号宗旨下，当然也可以经营当地业务。这类“小号”有专营茶叶的“三玉川茶庄”，“长盛川茶庄”，有专营绸缎布匹的“天顺泰绸布庄”，有专营牲畜的“德盛魁羊马店”，有专营经纪业的货栈“东升店”，以及药材、粮店、饭馆等商店，可以说应有尽有。货币经营业有“大盛川票号”、“裕盛厚银号”、“宏盛银号”以及其他钱庄、当铺等等。它的茶庄，既是商业，又是手工业，设庄于湖北，湖南产茶地区，就地收购鲜茶，按照华北人喜欢花茶，蒙古和新疆人喜欢砖茶、俄罗斯和欧洲人喜欢红茶的不同习惯和要求，加工成不

同种类的茶，并按不同品种的不同销量，分别包装，北运销售。蒙古牧民只要看到砖茶上印有“三玉川”、“长盛川”的字样，便争相购买。茶庄分号在北方则设在茶叶转销堆栈地张家口、归化、包头、宁夏等地。天顺泰绸布庄经常派人往返于京、津、苏、杭等地采办纺织品。专营马匹的小号南设汉口，专营羊的小号则设北京。如此庞大的南北物资交流，需要巨额的资金运转，大盛魁只通过自己的银号、票号、钱庄借贷、存放、汇兑、融通资金，就可以从全国各地进货。通过归化城、库伦、科布多、恰克图、行销于蒙古草原、新疆、西藏与俄罗斯。又从那里运回北方和欧洲特产，转销内地。南来北去的物资有茶叶、烟丝、绸缎、布匹、铁器、银器、白酒、食糖、炒米、糕点、木桶、木碗、药包、蒙靴、马毡、马鞍等等。北来南往的物资主要有牛、马、骆驼、羊、皮张、绒毛、药材，还有俄国的哈喇、毕图绒、毕吼、羽翎绸、羽毛纱、毛呢等。大盛魁财雄塞北，垄断一方，每逢秋冬过标时，各地骆驼队先后返回归化，带来大量商品，顿时归化城热闹非常，戏园饭馆也都活跃起来。那些拉骆驼的人从茂司嘎哇（莫斯科）回来，坐在茶馆里，津津有味地给人们讲述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三) 进货原则和销货方式

大盛魁购进商品，有几条原则：第一，按照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要求组织货源。比如砖茶消食，蒙民以肉食为主，喜用砖茶，它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砖茶”，保证质量。牧民喜欢用斜纹布做衣服，结实耐穿，朴素大方，它便大量购进。年购进斜纹布约占布匹购进总量的五分之四。第二，凡大宗进货，全部现款交易，不还价，以示厚道，并拉关系，建立“相与”。遇到价高货次者，便永不往来，以保持大盛魁货真价实，恪守信用的声誉。第三，从手工业匠铺进货，以质量第一，选定以后，世代交往，永不变换。这些小手工业铺户发生资金困难，大盛魁给与借垫。小手工业者难得这样大的包卖主，自然保证质量，按时交货。第四，蒙民和喇嘛需要的专用商品，一般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如蒙靴、马毡、木桶、木碗和喝奶茶使用的爨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订制。这不仅保证了商品齐全，质量过硬，而且都是蒙民欢迎的畅销货，所以能做到勤进快销，没有积压。一般购买者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只要是大盛魁的商品，就不怀疑其质量。

大盛魁的销货方式更为特殊。他们了解到蒙古人手中未必有大量现银，于是采取赊销办法，

到期亦不收取现金，而以牧民的畜产品折价偿还；然后再将这些畜产品运转内地销售，获得双重商品利益。既是赊销，自然要计算利息，以商品赊销金额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皮张若干，到期用实物还本付息，于是又获取了一重高利贷的利息收入。这个办法尽管剥削很重，但是由于保证了蒙民日常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也解决了蒙民土特产品的适时销售，所以颇受牧民欢迎。对于王公贵族奢侈生活的特殊需要和每年进京值班的物资供应和资金借贷，大盛魁则全部包了下来，满足供应，从而又获得蒙古贵族的欢心。至于赊销债务是否能够全部按时收回，大盛魁并非全部凭个人信用，而是使用一种“印票”。凡欲赊购商品者，须持有地方官吏负责担保的约据，上盖地方政府印章，俗称“印票”，交给大盛魁。印票上写着这样的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就没有放债收不回来的事了。

（四）经营思想和服务态度

作为封建商人资本的大盛魁的经营活动以利润为目标。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一是利用蒙古人远处草地，不了解市场价格行情的情况，进行不等价交换；二是千方百计扩大营业额尽量多做生意。

由于大盛魁的业务以印票销售为主，称为放印票帐，故大盛魁亦称“大盛魁印票庄”。不仅放帐时日用百货作价高，偿还时牲畜皮张作价低，且高利计息。有时还将收购的牛马羊等牲畜暂不赶走，交给牧民代为喂养，待膘肥肉圆时再赶走，并不付牧民报酬。

为了多做买卖，他们精心研究蒙人生活要求，尽力迎合消费者的心理。鉴于牧民不长于算帐，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人有大人的尺寸，小孩有小孩的尺寸，任蒙人选购。蒙医治病用的药，习惯用药包，分七十二味，四十八味，三十六味，二十四味四种，大盛魁就将中药按此分包，药包上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甚至每年冬至以后，用白面和羊肉加工大量的饺子，自然冷冻，运往蒙古包销售，作为春节的应时商品。不论什么商品，只要蒙人需要，他们就经营，应有尽有。有时遇到不了解大盛魁经营作风的新顾客，售货人若发现对方怀疑商品质量，例如怀疑布鞋鞋底内用的是布还是草纸，他就当着众人的面，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借以宣传，扩大影响，从而增加营业额。至今，蒙古人提起大盛魁，除对其不等价交换表示痛恨外，对它的服务态度，却是很赞赏的。

(五) 劳动管理和盈利

大盛魁职工众多，业务活动远及亚、欧，自称“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路上有骆驼”。那么它在劳动管理上有什么特殊办法呢？首先，重视对职工进行传统教育。二百多年，不论业务扩展多大，也不忘创始人的艰苦创业，为教育职工发扬艰苦创业的传统，将一条扁担，两只水箱等标志艰苦创业的纪念物品永久陈列在财神庙内。和其它商号一样，每年除夕都要大摆宴席，但在山珍海味之后，总要有一道小米粥。其次，重视职工的语言和业务训练。新职工的补充，一般由山西祁县亲朋引进，但只有精明强干，相貌端正的十五、六岁的男青年才能入选。新来的伙计称为学生意的学徒，由祁县北抵归化城后，大多数都要骑骆驼到外蒙科布多接受专门训练。由教师教授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俄语，然后再分配到各地分支机构跟着老职工学习业务。第三，有严格的号规。其号规与其他山西商人的号规大体相仿，此处不再赘述。唯大盛魁远营蒙，俄贸易，新入号的学徒，要先干十五年以后才能第一次回家（一般商号是二年或三年），休假二年到三年再去上班，以后就是三年一次探亲。第四，注意职工的福利，使其卖力为号办事。号内从掌柜到学徒，等级森严，但是对于最低层工人，如

拉骆驼的驼工和放羊的羊工，生活待遇都比较好。据内蒙民间传说，大盛魁的羊工吃的都是白面馍馍，比一般小商号职员待遇都高。所以在祁县，姑娘只要能嫁给住大盛魁的人，不论是喂猪还是做饭的，都很受人羡慕。

由于大盛魁机构层次简单，商品周转环节少，商品质量可靠，融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于一体，职工卖力，所以垄断了蒙汉贸易和北方对俄贸易，营业旺盛，利润极高。它每三年为一个帐期，结算分红一次。每次帐期，都把公积金的积累和运用放在首位，以公积金的增长数量，作为衡量三年内经营成果的主要标志，然后才是每股红利。最盛时，每股一次可以分到一万两白银。每遇帐期总结时，都要评定人员功过，检查三年的成绩和问题，整顿号规，调整人事，确定后三年即下一个帐期的营业方针。这些措施，都是大盛魁历经二百多年而不败的重要因素。

（六）交结蒙古王公贵族

大盛魁的总经理和分号掌柜，多数在清代捐官制度下，用白银买有各种官衔。归化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经理无不花翎顶戴，最高者有候补道员，加捐二品顶戴的。所以大盛魁的债务，不仅一般牧民不敢抗拒，就是蒙古贵族到期不还也不行。经理常常衣冠整齐，顶翎辉煌地去见执掌地

方政权的王爷，要求替他催债。这些王公贵族也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自然得依其行政权力，为大盛魁催帐。大盛魁不仅利用捐纳官衔，通过印票，垄断蒙古地区贸易和信用，充当蒙古王公和阿拉布特（庶民）的债权人，而且与清廷代表，蒙古王公三方面组成议定蒙古物价的“朝勒格个”，决定市场物价，形成大盛魁的垄断价格体系。辛亥革命以后，绥远地方当局筹设平市官钱局，由大盛魁出资，以后又开设绥远面粉厂，亦因资金不足由大盛魁出资。大盛魁实际上成了支撑蒙古地方政权的财政支柱。其归化城总号的上层人物，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并未甘心退出外蒙市场，仍然积极参与旧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协助收编土匪，训练军队，筹措饷款。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能按照封建商业资本家的意愿进行，它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倒闭了。大盛魁停业以后，总经理段敬斋（祁县南社村人）因其熟习外蒙和俄国情况，充任了外交部参事，以后又任财政部咨议，一直是政治经济界的活跃人物。

（七）大盛魁的倒闭

大盛魁自清康熙年间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倒闭，历经二百三十余年，其倒闭的根本原因，和其他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一样，首先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晚清时期，随着沙俄在我国

蒙古、新疆和东北侵略活动的不断扩大，沙俄商人深入我蒙古、新疆等地进行活动，且享有许多特权，使大盛魁的市场日益缩小，业务一天天衰落下来。一九一一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订立库伦通商协定，俄国人取得了在外蒙古无税自由贸易的特权。大盛魁在蒙古的市场进一步缩小，内地小号也都一天天不景气了。大盛魁倒闭的直接原因，是一九二一年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在苏联帮助下，一九二四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公有制，大盛魁在外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其在俄国境内的商业资本，已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被没收。至此，其通事舞台，只剩下内蒙古和新疆，从而使总号资产负债难以平衡，不得不向外借债，积欠平市官钱局十万银元，不得已将其独资经营的绥远电灯公司作价偿还债务，独资经营的裕盛厚银号折价转让平市官钱局。其它“小号”，亦先后如此处理。在其收帐歇业清算之中，号中要人玩弄手腕，装入私囊者，不知凡几。大盛魁祁县财东，不仅家资赔尽，还落了个沿街乞讨。赫赫有名的大盛魁就如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本文资料来源：

一，笔者先后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员，呼和浩特市政协委员刘映元，中国人民解放

军雁北军分区前政委范世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呼和浩特市支行卫月望，人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办公室主任乔晓金，内蒙古自治区供销社冯炳俊等老人。

二、参阅资料有：《绥远通志稿》卷三八，四九；《祁县志》上册（初稿）；荣庚麟，荣祥：《土默特沿革》；王勤培：《蒙古问题》；张印堂：《蒙古问题》；张栻如：《旧管见闻》，卜昭文：《旅蒙商史话》等

转自《山西文史资料》第三十四辑

旅蒙商公集成

张晋仁

公集成原名兴隆茂，它的前身是兴隆增，早年在内蒙古乌兰巴托做蒙古生意。民国九年（1920年），外蒙古独立后，生意受到扼制，营业日渐萧条。迨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才由经理人郭姓茂收拾残局回到包头，重振旧业，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来五原开设兴隆茂字号。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废兴隆茂新改组成立公集成。解放后，一九五六年参加公私合营。公集成创始来历早。在五原来说，为典型的旧商业组织形式，有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经营生财之道。他们在漫长的年代里，历经社会风云之变幻，而能续未竟之绪，延续不衰者，是与其东伙之间义重情深，随势应变分不开的。

创业之始

公集成财东孙翹，山西代县南口村人。初在今锡林郭勒盟贝子庙、金盆等地经营小本生意。

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889年）去的乌兰巴托（今外蒙古首都）。从内地雇用手艺精湛的制做铜器工人，初开设兴隆永铜铺作坊，专门制做蒙民用的铜器家俱。因制做精湛，声誉遐迩，生意兴隆，日积月累，就已有了一定的资财。时有蒙地吉兰升苏木（相当于乡）眼观庙，塑造全身佛像。兴隆永财东孙翘承揽了镀饰金身佛像的这椿工艺。佛像高三丈六尺，全身用黄金镀成。这个庙的主持活佛已双眼失明。金身镀成后，孙翘落了不少金子，从此大发其财。他除经营铜铺外，又开设兴隆魁中草药店，并为扩大经营打下了基础。

兴隆增的建立

公集成财东孙翘为了进一步扩大经营，于民国初年，以资本白银三千两，成立兴隆增字号。请的掌柜的是山西忻县人菅喜年，定襄人郭牲茂。菅喜年不识字，渐而由郭牲茂掌握了实权。郭有文化，办事深沉老练，理财有方，经他手经营日渐兴旺。兴隆增设总号一个和三个门市部。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他们除经营商业外，还在“河劳兔”地方雇工种地十余顷，种植小麦、谷豆。收成后，加工

成米、面出售，此外还饲养牛、马百余头。

经营情况

兴隆增主要做蒙古生意。除在乌兰巴托设有三个门市部，还不定期的派人驮运货物到各个苏木和蒙民做生意，买回牲畜皮毛。货物来源：主要在张家口，那里常年驻有专人负责，从京、津、山西等地采购回货物，而后经张家口万泉坝、张北县、德化雇用骆驼和汽车运去外蒙。回来的皮毛也集中在张家口出售。兴隆增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为营业鼎盛时期，这时全部资产已达白银十余万两，人伙四十余人，每股生意开过白银三千三百两。

民国九年（1920年）外蒙独立后，民国十七年（1928年），奉军张学良把持了中东铁路，而俄国人在外蒙边境又设立了关卡，从此商路断绝。加之外蒙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负担沉重，无法经营。时在外蒙的内地商人多是山西人，知名的旅蒙商如绥远之大盛魁、张家口之裕盛和都是在清朝初年做外蒙古生意的。经过二百余年之经营积累，资财何止亿万，均在外蒙政府的严格控制下，无法向内地转移。除小本经营和小手工业者，还可勉强存在外，而大部分工商业均已纷纷倒闭，从业人员也被迫迁返内地。民国十七年

(1928年)，俄国人在乌兰巴托设有远东银行，还可通汇。个人允许汇往张家口银币一百元。还有德商开设的德华洋行，也可办理汇兑。收汇办法：六、七扣，即交汇百元，到张家口收汇六、七十元。兴隆增财东孙翘通过德华洋行曾汇回张家口八千元，以后就不好办了。

据郭能富老人说，他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去的外蒙，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来的，而财东孙翘等人也先后回来了。这时兴隆增还有资财约值外蒙币十余万元。经理郭姓茂负责收拾残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郭也从外蒙回到包头。及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兴隆增的铺产已归公，其他资财只收回七千元，从此生意全部结束。

又据郭能富老人说，和蒙人做生意，蒙人不懂汉语。他时在年青，除学习蒙语还学习蒙文，初步掌握了书写蒙文知识。他是有条件留在外蒙的。因受柜上约束，又且年青想家，故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回来丰镇县，在那里成了家，和人合伙开了一片煤炭店。兴隆增的人员都回来了，只有伙友孙培荣和王来智没有回来。张在那里开了个饭馆发了财。私人还买了三辆汽车。解放后中蒙友好，张曾回来山西老家，把家眷都迁到外蒙去了。

重振旧业开设兴隆茂

兴隆增财东孙翘回来后，所有外蒙的铺产均依靠郭姓茂负责清理。孙念郭的好处，从清理回来的七千元款中，提出三千元交给郭姓茂，让郭重振旧业。郭时在包头，已“胸有成竹”，早知河套是个“米粮川”，很有发展前途。故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召集原伙胡光华等人来五原新城隆兴长（今城关镇），租赁旧西街路北一个小铺面，开设兴隆茂字号，经营日用百货、绸布、烟、茶。

兴隆茂是有东有伙的买卖，东家不上门，一切人、财权都由掌柜的执掌。柜上设有“万金帐”（记载财、人股的专设帐簿）。资本三千元作财股二股，人力股是：经理郭姓茂一个，正股郭姓林七厘、贺增寿五厘、胡光华三厘五，郭能富三厘，共人力股二股九厘五。“万金帐”关系盈利的分配，平时严密封管，如遇股份有变更或增减时才可公开，除此是不能随意打动的。人力股商人惯称“顶生意”的，一般店员只能赚工资。如到帐期生意好，可按工作年限和个人表现，分别多寡给予馈赠。

兴隆茂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开张营业，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前夕，在这个

时期，山西阎锡山屯垦河套，肃清匪患，社会安定，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金融亦较稳定，兴隆茂生意确是兴隆茂盛了。这年第一个账期，每股生意开过银币一千元的身子，获利已超过资本的数倍。

兴隆茂经营范围很广，货物多是从京、津、山西等地经包头中转运来。那时就已有山西太同公司和私人经营的汽车承揽运输，但多数还是靠驼运。经理郭姓茂常驻包头，商业信息灵通，往来信用好。那时包头商业往来惯例有四镖八常骡之说，即正、二月骡三月镖（春镖），四、五月骡六月镖（夏镖），七、八月骡九月镖（秋镖），十、十一月骡十二月镖（冬镖）。所谓镖骡之说，也即商业往来清理债权债务的期限。如山西帮烟、茶庄，多是厂商，推销的生烟、砖茶，多是半年或一年期才结算，兴隆茂信用好，生意做的活，货源常年“川流不息”。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前，河套地区只设五原、临河、安北三县。而五原辖地辽阔，经营范围可及伊盟和山后各个盟、旗一带。兴隆茂是多年做蒙古生意的，职工多会蒙语，他们除和农民打交道外，做蒙民生意也不少。为了兜揽生意，还派出干练的伙计，分赴四门，招来顾客。

经营方式：他们和农民打交道，多是用放土

账的办法，来往的多是农村地富和中农。春天拿走货，折成粮食，到秋收后收粮，现钱交易的少。对蒙牧民交易也类似和农民交易的办法。蒙民习惯是认话不认人，所以兴隆茂做蒙民生意是独树一帜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十月绥、包相继沦陷，大军云集五原。以安北县（今乌拉特前旗）西山咀为敌我分界。河套一时处于偏安的局面。自敌人占领包头后，敌机不断骚扰，白天防空，夜宵营业，货源来路中断。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包头敌伪蒙疆政府成立了大蒙公司，敌我双方可以半公开的交易。时绥远省政府设有物资管理处，凡商人送往包头的土特产品，事先必须开许可证，回来时必须买回布匹来。这时太平洋战争还未发生，天津还有外国租界地，五原设有中国银行办事处，还可通汇天津。兴隆茂一次从中行汇天津一万元，经中行转到美商花旗银行，从该行提出现款，再由津汇包头蒙疆银行，从包头买回白市布一百七十匹。

民国二十九年冬（1940年2月），日寇大举进犯，五原反复二次失守。敌人烧杀抢掠，商人损失惨重。日寇占据五原时，兴隆茂在防空洞里藏的驼毛，全部被敌人拉走，到了包头按公价收

买，还有暗室藏的一部份份货物没有丢失。五原战役胜利后，迁到西街路南营业。这时经理郭姓茂常住包头，五原由郭能富负责。

为了到敌区做生意，专雇用山西代县人朱世俊跑外。从五原买上黑瓜籽、羊羔皮、甘草运到安北县渡过黄河，再转运到包头，买货物回来。那时，通用的是法币，到了包头一元法币只当蒙币二角，如运去羔皮等，一元可换值蒙币六、七角。兴隆茂虽受战祸的损失，而生意还是比较好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开过一帐，以法币换算成蒙币，每一股生意开过2000元的股子。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商品价格成倍下跌。商人不负债的则可，而负债的造成破产的不少。时隔不久，价格日渐回升，私营工业才渐复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军费浩繁，通货膨胀日长一日。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纸钞已成废纸一堆，市面停止流通，均以银币和实物计值，加之抓丁、要粮、苛捐杂税，致使农村破产，民不聊生。而私营工商业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兴隆茂为了安定人心，经东伙商量，于一九四八年将兴隆茂改组成立公集成，由原股东生意改为合资经营。资本白市布一百匹，入股者五

人，职工三人，经理郭能富，副经理胡光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私营工商业有了新的生机。在党和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扶植发展的政策感召下，人民银行给予贷款扶持，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以及三五反运动的教育。充分调动了私营工商业的爱国热忱。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积极经营、深购远销，沟通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城乡经济，是有一定贡献的。

一九五二年工商界开展“三五反”运动，公集成被定为重点违法户。经理郭能富曾被审查拘留，交出黄金二两，银元宝一个。三五反运动结束定案，只补交税款，受到政府宽大处理。一九五六年参加公私合营，全部投资一万五千余元，人员全体直接过渡到国营华纱布公司。经理郭能富、胡光华均被政府任命为门市部主任。其他人都得到适当的工作安排。

公集成东伙当年涉足外蒙，辗转沧桑，而能续未竟之绪者，诚属不易。时光流逝，现健在者只有郭能富老人，而已年近八十高龄，年老塞听，多经老人回忆口述，记录整理，欠妥之处，望知者匡正。

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情况

王廷英

一、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活动

边客是旅蒙商在蒙旗进行贸易活动不可缺少的伙伴，旅蒙商深入蒙区，四处行动，饮食起居由边客做向导；蒙汉人民谈话时，由边客做翻译；交易时由边客充当双方的经济人与公证人。所以，边客声誉的好坏，条件的高低，对交易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好的边客必须了解蒙区地方情况，对王公贵族、喇嘛、兵营驻地熟记如流，昼夜行走，也畅通无阻；通悉蒙民的风俗习惯，喇嘛教的礼节和蒙旗对商贩的一切规定；精通蒙区交易业务和社会关系；会说流利的蒙古话，能随机应变，吻合王公贵族喇嘛的爱好。如此，方能立足于蒙旗，顺利地进行交易。基于此，蒙汉双方对待边客都是优礼相待的。边客除获取双方应付的佣金外，还依仗人地熟悉，直接经营商品，换取蒙民的牲畜、皮毛、土特产品，捞取利润，真是八方进财，财源茂盛。有的

边客在榨取和剥削广大牧民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富有，上升为资本家。其中部份边客因收入极易致骄奢堕落，生活腐化，为所欲为，染上了吃、喝、嫖、赌、抽大烟等恶习。常驻善丹庙一带的边客冯进财，就是这个结局，过着似人似鬼的生活。

二、边客旅蒙商在蒙旗的兴起

蒙汉人民之间的私市交易，最早出现在双方毗邻的地方，是一种自发的不定期的交易。为适应蒙古地区面广人稀，交通不便，和蒙民长期守牧，不易外出的特殊情况，出现了边客和旅蒙商。他们是轻装驼运商品，直接深入蒙旗，由边客伴随流动交易，送货上门。最初经营范围局限在王公、寺庙、兵营等驻地，供应上层人物的急需。旅蒙商因有利可图，经营者逐渐增加，且频繁往来，贩运美观大方、包装整齐、品种多样的商品。但在上层人物中，已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因此，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广大牧民之中，直接影响到有些蒙民也改营商贩，毅然随同旅蒙商，携带自己的牲畜皮毛到内地销售，返回时贩运蒙民喜爱的急需商品。因互相往来增添了蒙汉人民的联系。特别是寺庙纪念佛祖、定期庙会或集市之期，边客旅蒙商及蒙商牧民，从远近数百里赶来，熙熙攘攘，人山人海，形成闹市。蒙汉

人民生活在一起，争先恐后进行交易，热闹异常。这时终日逸乐无事可做的王公贵族，头戴红宝石顶子，耀眼夺目，身穿黄缎锦绣马褂，配带金珠，乘坐轿车，卫士跟随，威风凛凛，也来此助兴。蒙民相见，如接天神，纷纷屈膝下跪，叩头行礼，加以蒙人能歌善舞，他（她）们兴高彩烈，情不自尽地打锣鼓，弹马头琴，鸣笛笙，吹胡笳，引吭高歌，翩翩起舞，给集市活跃增添了异彩，此起彼伏的呼喊赞美声震耳，蒙汉人民喜气洋洋，拍手称快。就是通过这种交流，逐步沟通蒙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

三、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情况

旅蒙商在蒙旗的剥削方式是多种的，由于蒙旗交通不便，货币不统一，蒙民极少持有纸币，不愿拿出现存的白银与硬币买商品，因而以物易物，成为主要的交换形式。据常驻善丹庙的边客冯进财说：抗日战争前的交换情况是白酒一斤可换驼毛一斤或羊毛二斤；白酒二斤可换大山羊皮一张；三斤可换大绵羊皮一张；两石炒米计六百斤可换三岁成牛一条；九百斤可换三岁马一匹或三岁驼一峰。若以白面交换，数量折半。又炒米五十斤可换山羊一只，七十斤换绵羊一只，这属于现场交易。

其次是预付交易，以质论价，双方先议定等

同物品，由旅蒙商在春季先付商品，秋冬收回蒙民的畜产品，加利30%，如今冬付出，次年秋冬收回时，加利60%。无论粮酒商品或畜产品的交换，都是在不等价的基础上进行的，高出内地市场的利润二至三倍，若紧俏急需的商品利润更大。如勾心庙（现四支乡蒙汉大队）的边客王财，1943年冬，从陕坝云生祥皮房，以驼毛二十斤，换针两筒计二百包，到蒙旗转手换到驼毛一百斤，利润高达四倍。有时到期应收回的牲畜，因不适时机，便给蒙民以微薄的待遇，代放整年或一季，等待牲畜体壮膘肥，收回销出，可得高额利润。

再次，旅蒙商的剥削是以高利贷的方式进行的。如义泰魁（现属东升大队）由于资本厚，土地广，粮食多，且自己开设加工坊，直接生产白面、炒米、粉条、白酒，再从市场配搭一些商品，定期运到蒙旗，对王公贵族、喇嘛馈赠厚礼，除伸手向牧民进行现货交换外，并以大量商品，通过协议手续，将王公的土地、牧主的畜群作抵押，贷给王公及蒙牧民定期收利。其利率剥削是十分严重的，对年高达60至70%，若到期偿还不清，再利上加利。因此，蒙牧民债台高累，就是延期多年，也偿还不清。所以义泰魁放出的帐，直至1937年还没收清。抗战开始后，由于兵

荒马乱，土匪溃兵四起，社会秩序混乱，杀人抢劫屡见不鲜。义泰魁的老板，得了半身不遂病，遂致卧床不起，停止了向蒙旗的交易，这笔帐也就不了了之。绥包沦陷后，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奸商特别多，他们勾结敌伪及国民党官吏，合股经商，乘日寇向我方封锁之际，利用权势偷运货物，深入伊盟达拉特旗，用一尺二寸见方的土布，换取驼毛一斤，一尺斜纹布换驼毛二斤；三块四两重的砖茶，换一只重三十斤的羊。利润均达百分之百以上。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将沦陷区的大烟，运至蒙旗，换取蒙民的名贵药材、土特产品，获得高额暴利，毒害了蒙汉人民，一经染上烟瘾，就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男盗女娼，社会动乱不宁。

边客旅蒙商与蒙牧民，由于长期往来，彼此了解与信任，蒙牧民的牲畜皮毛等也赊给旅蒙商。如抗战时期，驻陕坝国防部二厅电台的副官刘凤山（系中统特务），其合法身份是旅蒙商，在善丹庙以北一带，利用贸易，侦探外蒙的动静。此人诡计多端，善于投机钻营，经常赊回蒙牧民的牲畜皮毛转手渔利，过着阔气排场花天酒地的生活。尤可甚者如丰盛堂（在现三道桥乡），经常到库伦（现乌兰巴托）一带做旅蒙商。1923年正赶上乔巴山在列宁的旗帜下进行革

命，秩序比较混乱，牧民不相信政策，人心惶惶，牧主怕没收牧群，惊慌失措。而丰盛堂却乘人之危，用花言巧语赎回蒙牧民牛、马五百余匹。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正式成立，取缔一切剥削，杜绝非法商人入境。自此两地隔绝，而丰盛堂却大发了横财，成为后来米仓县挂上号的地主老财。

两个班第喇嘛与旅蒙商的斗争

巴图乌力吉 撰写

达瓦桑布 整理

(一)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春末夏初之际，呼包一带的旅蒙商，开始深入到乌拉特草原。

他们利用经营的烟、酒、糖、茶、食盐和多种日用百货商品，在偏僻分散居住的牧区串包走户，向牧民作买卖。

为了推销货物，在交易中他们采取先供货、后算帐的办法，即：先把物品赊销给牧民和庙宇的喇嘛们，等牧区绒毛下来，一次算账收款。

为了拉关系，有些旅蒙商还在牧民中散布说：“我们彼此之间都是朋友，亲如兄弟，这些东西都是小意思，你们把所需的物资先拿去用吧，什么时候有了钱什么时候还。”为此有不少牧民和喇嘛们，连年向旅蒙商赊账，这样，天长日久等到算账时候，有的牧民把所有的牲畜给了旅

蒙商也抵不清历年赊下的账。这时那些自称“都是朋友兄弟”的旅蒙商，顿时翻脸不认人，索款逼债，寸步不让。甚至还与当地衙门的大小官员们相互勾结，采用各种手段向牧民和喇嘛讨要债务。以致造成许多牧民为了抵债，弄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个别牧民为了避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讨吃度日。旅蒙商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草原上广大牧民的强烈不满，逐渐形成了广大牧民、喇嘛同旅蒙商之间严重的对立和斗争。

(二)

巴音山岱庙座落在乌拉特草原西部的戈壁地区。在这里，有很多包放庙仓苏鲁克的牧民和喇嘛，由于遭受旅蒙商的剥削和压榨，不能继续放牧，无法维持生活。如：在巴音山岱庙充当管家喇嘛的大鼻子云登，虽然有经营小买卖的本领，但却在同包头、呼和浩特的“同心齐”、“泰济全”等大商号的交易中上当受骗。那些旅蒙商利用他喝酒的嗜好，经常给他赊销烟、酒、茶、盐等货物，及至最后算账，使他大吃一惊。原来欠债的数目即使把庙仓和包放苏鲁克牧民的财产加在一起，也无法还清旅蒙商的账。

在这种情况下，云登喇嘛无奈向本庙主持喇嘛报告：“我们向旅蒙商赊账甚多，无法偿还。

现在的经济情况，已维持不了庙宇的正常佛事和包放苏鲁克牧民们的生活，请设法解决。”寺庙主持者对此也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只得向苏木汇报，苏木又报告给旗衙门。旗衙门的官员，不替牧民、喇嘛们说话，反而站在旅蒙商一边责令他们破产还债。强调：“有债必还、不能拖延”。

由于巴音山岱庙仓及牧民们赊欠的债，绝大部分是经过大鼻子云登管家喇嘛的手，所以这项债务，直接牵连到他本人和他的亲属。旅蒙商逼债日紧，无力偿还，迫使大鼻子云登喇嘛竟到了“喝茶”的地步。

解放前，在牧区有请众人“喝茶”的作法。所谓的请人“喝茶”，并不意味着牧民们有什么喜庆往来，而是有的牧民由于各种原因负债累累，无法生活下去，为了偿还债务，逐级向苏木、旗衙门请求破产还债。旗或苏木派人到申请者家中来主持裁决，这种表现的形式，就是“喝茶”。具体的做法是：首先确定“喝茶”的日期，然后通知所有的债主商人和户家按时到来“喝茶”。

“喝茶”这一天，欠债户把家里的牲畜头数、财产种类、数额等一项一项地报给旗或苏木来的人登记造册，这时他们全家人都穿上最破烂的衣服，并且还要熬好一锅热茶，给主持裁决者和

债主们一一敬茶。当人们喝完茶时，户主便把钥匙交给裁决者，在交完钥匙后，就表明这一家的一切产业已交给大家，财产的所有权已经转变。然后，由担任裁决的人，根据册子里的牲畜和财产，作价分给各债主。这就是破产还债，从此欠债人再也不承担任何债务责任。这就叫“喝茶”。

(三)

就在老牧民和喇嘛们负债累累的那些年代里，巴音山岱庙东庙仓（该庙分有东西两个庙仓）的骆驼群和巴音（大牧主）伦布恩管辖的一批骆驼，突然被从喀尔喀进来的盗贼乌固日旦宝和乌固吐都旦宝偷赶到外蒙古。此事被巴音山岱庙东庙仓主事喇嘛韩葆和伦布恩管家发现。经韩葆和伦布恩二人协商，为了找回失去的骆驼，决定派大鼻子云登赴大库伦（现乌兰巴托），向外蒙古的有关当局告发盗情，力图把被偷走的骆驼要回。大鼻子云登在接受任务后喜笑颜开，立即答应去喀尔喀打官司。大鼻子云登愿意到喀尔喀打官司的原因是，他负债很多无力偿还，正在想逃跑而没有办法的时候，恰好遇上外出，这一下正好瞌睡给了个枕头。他立即带上路费、交通工具奔往喀尔喀。

(四)

大鼻子云登为找骆驼，离开家乡去喀尔喀后，有一年多的功夫，没有音讯。这样一来可急坏了一些旅蒙商人，因为他们是云登的债主。这些债主以包头、呼和浩特“同心齐”、“泰济全”等大商号的名义，又向云登的哥哥大鼻子苏布依梅林和巴音山岱庙逼债。他们拿出欠债的账单，在巴音山岱庙和云登的哥哥不知真假的情况下逼迫替云登还债。对此，巴音山岱庙和苏布依梅林商量，决定向政府报告这些情况。但得到旗政府的答复是：“欠债必还”。此事被那些逼债的旅蒙商听到后，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逼债，最后逼的巴音山岱庙主事喇嘛和大鼻子云登的哥哥苏布依梅林，也不敢在家里住了。

(五)

旅蒙商的野蛮逼债作法，激起了巴音山岱庙班第喇嘛根顿旦巴和桑布二人及附近贫苦牧民的极大愤怒。尤其是遭到根顿旦巴和大鼻子苏布依梅林的二儿子(原是阿鲁科尔沁人)的反对。当时在伊克昭盟各旗范围内已经兴起反压迫、反剥削

的“独贵龙”活动，这个消息在乌拉特草原上也广泛流传着。人们都知道“独贵龙”运动，是反对蒙旗王公的封建暴政，繁重的苛捐摊派，兵差徭役和贪赃枉法，并且在伊盟“独贵龙”运动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于是，根顿旦巴想：何不也在当地搞起“独贵龙”运动，给旅蒙商，土豪劣绅，衙门官员一个狠狠打击！不然我们也难于生活下去。他这种想法和桑布（是顿都瑞老人的独生子，外号叫“三颗胡须”）的想法一致，于是他们两人秘密地组成了一个“独贵龙”。

桑布原是个封建迷信很深的人，经常掷骰子以卜吉凶。对此事他掷骰子卜算后说：“我们的事业，在刚开始时，可能遇到阻碍；如果能消除这一阻力，就一帆风顺了”。于是他们就研究布置了工作。

一、关于组织工作：

- 1、必须发动贫苦牧民，参加“独贵龙”活动，是他们依靠的主要力量；
- 2、在组织“独贵龙”之前，应先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并做好发动工作。

二、一些具体工作：

- 1、由根顿旦巴去中公旗西南部的哈达布其以北，查干高勒等地，向当地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牧民和奴隶们说明组织“独贵龙”的意义和目

的，并大力发动他们加入“独贵龙”活动。

2、决定本年四月××日在巴嘎那特格集会，成立“独贵龙”。发动牧民群众必须准时参加，不得有误。

3、向本巴吐庙的青年喇嘛们说明成立“独贵龙”的事情，告诉他们，务必按时到巴嘎那特格集会。

4、桑布负责在巴音山岱附近宣传、发动贫苦牧民积极参加“独贵龙”活动。

5、请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大鼻子苏布依梅林，那木斯来及时到成立“独贵龙”的地方去。

三，关于参加成立“独贵龙”人员的伙食、骑乘问题：

1、因“独贵龙”刚成立，一穷二白，没有资金，要求自愿参加“独贵龙”的人，自带干粮和骑乘。

2、任何人不得借机向人民群众摊派捐税，用为集会伙食和骑乘。

3、关于成立“独贵龙”之事，不能让汉族商人和巴音山岱庙的主事喇嘛以及同他们有关系的方面官员们知道。

四，关于成立“独贵龙”的地点，在巴音山岱庙西沙漠的巴嘎那特格。

巴嘎那特格这个地名，是个吉利名字，它象

征着我们的事业，一帆风顺。

两人在决定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之后，根顿旦巴于当年三月末，从巴音山岱庙秘密出发，到了本巴吐庙附近的乌固日巴图家。乌固日巴图很支持根顿旦巴的行动，他挑选了两峰好骆驼，让根顿旦巴骑上，按计划到了哈达布其，查干高勒等地方，向人民群众宣讲成立“独贵龙”之事。他的这一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支持。

在群众的鼓舞下，根顿旦巴的情绪高昂，他边走边给群众宣传，一直到了本巴吐庙。此庙共有十六名喇嘛，他向喇嘛们说明了成立“独贵龙”的意义和目的。当夜就住在此庙，此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因成立“独贵龙”的日期越来越近，而且工作开展的很顺利，为此他兴奋的一夜没合上眼。

第二天早晨，根顿旦巴还在朦胧之中时，本巴图庙上的十六名喇嘛突然闯进他居住的房间，二话不说，竟把根顿旦巴五花大绑起来。当天就送到巴音山岱庙。

因为事先无人知道根顿旦巴被抓的消息，所以一部分人已经按时到了成立“独贵龙”的地点。后来因主要人员没有到会，以致去的人也各自回了家。这时根顿旦巴和桑布俩人都被送回巴音山岱庙。该庙主事喇嘛超肯兑，让根顿旦巴、

桑布两人面对面地谈了谈成立“独贵龙”的目的之后，经巴音山岱庙的朝克岑格布黑，古利尔旦金等主事喇嘛们商量，认为根顿旦巴、桑布二人的所作所为，是违犯庙规的，于是决定罚根顿旦巴和桑布二人在喇嘛们念经时磕了几天头，然后打了几棍作为儆戒，便把此事了结，让这两个班第喇嘛继续留在庙内念经。

(六)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情况，不久就流传到人民群众当中来。那些旅蒙商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感到事关重大，一时放松了逼债。其中，两家大商号的掌柜向乌拉特中旗札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说了这件事。他们说：“你们旗里发生了如此大事，你也不过问，却被巴音山岱庙的主事喇嘛们敷衍搪塞过去，这还了得！”还说：“如果你不处理这件事，对你的前途不利，我们要向绥远省政府告状”。由于旅蒙商对巴布道吉尔采取了一方面拉拢，另一方面威胁的办法。使得中公旗札萨克诺颜又是怕又是急，不得不严肃处理此事。为此旗衙门下达了逮捕组织“独贵龙”运动的带头人根顿旦巴、桑布两人的命令。

(七)

中公旗衙门坚决执行巴布道尔吉诺颜的指示。于当年农历五月初，派去了旗衙门以巴策仁嘎日布管辖为首，达木林斯仁为协助的两位官员，领上二十名兵到了巴音山岱庙。

这些人到庙后，准备把庙上的主事喇嘛和预谋搞“独贵龙”运动的两个班第喇嘛，以及附近的知名人士，大鼻子苏布依梅林、那木斯来梅林和准备参加活动的台吉、奴隶、老百姓、喇嘛们全部抓回去。

巴策仁嘎日布是巴布道尔吉诺颜的忠实官员，他到了巴音山岱庙几天以后，从巴音山岱庙主事喇嘛们的嘴里了解到事情的经过。首先逮捕了准备成立“独贵龙”运动的带头人根顿旦巴和桑布二人。在审问他们的口供中，摸清了参与活动的有关人员。此后巴策仁嘎日布分兵几路，派他们将有关的人全部叫到巴音山岱庙。人到齐后，在一天的下午，他把巴音山岱庙法轮院的喇嘛、奴隶、老百姓以及从其他地方叫来的人全部集中到庙前，巴策仁嘎日布管辖亲自下令，让喇嘛与老百姓分别站队。接着，他大声喊叫：巴音山岱庙有职务的喇嘛全部站到前边来。随着他的喊声，有二十来名喇嘛走了出来。当即被士兵脱掉袈裟，

全部绑了起来。然后又抓起参与“独贵龙”活动的老百姓，共计四十来人。在喇嘛当中，只有巴音山岱庙的朝格岑格布黑，古利尔旦金二人没有被绑。因为他们患有重病。但这两个人也没有幸免，被士兵把他们驮在骆驼身上带走了。

在他们走到德勒山（现杭盖戈壁苏木）和巴音前达门苏木交界时，巴音山岱庙的朝格岑格布黑，古利尔旦金因病重死亡。巴策仁嘎日布管辖，把其余的人带到塔本套勒盖（现在川井苏木沙巴嘎队）后，架起了很多蒙古包，然后把被抓来的喇嘛、老百姓分为几部分，派出看守，严加看管。

当时被抓来的人中大部分都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处理。其中只有准备成立“独贵龙”运动的两个班第喇嘛之一的桑布毫不胆怯。他同站岗放哨的士兵及被抓来的同伴说东道西或者观察了解地形和人的动态。他又站在迷信的立场上，观察山峰，推测命运。他说：塔本套勒盖五个山头是个名副其实的美丽又广阔的地方。只是这五个山峰都呈黑色，从它的山峰的现象，可以预测到这次事件的结果。塔本套勒盖的两个山峰比其它三个高一点儿。根据这种现象推断在我们当中要有两个被判死刑，那三个山峰比较平坦，象征着有三个人要被判罪，其余的人就无事了，等一些不

三不四的话。其它人不让他胡说乱道，他也不听。

(八)

次日开始审讯罪犯，审讯的方法是：采取自供和逼供相结合的办法。在各种刑具一起上的情况下，审讯进行整整一个星期。这时巴布道尔吉诺颜的弟弟朱日梅德道尔吉武警官，领上他的随从人员洪兴成梅林到了他哥哥家。当从他哥哥嘴里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后，朱日梅德道尔吉对他哥说：“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喇嘛、老百姓抓到这里进行审讯逼供呢？旗里有衙门，你们不用，偏在草原上审判罪犯，这是为什么？”他哥说：

“这是一次小型的审判。旗里的这些不知抬举的奴隶、老百姓，随便搞阴谋，成立“独贵龙”，反对汉族商人。所以我想乘此机会，压压他们的威风，让他们知道一下我的厉害！在草原上搞审判，为的是缩小事件的影响，不然那些旅蒙商，如果把这种事向绥远省政府控告的话，事情就闹大了。对于这些事，你是不懂的。”朱日梅德道尔吉武警官听了他哥的话非常生气，劝他哥哥说：“你身为全旗的札萨克诺颜，不但不为全旗人民群众的利益说话，反而听信呼包旅蒙商的胡

言乱语，把自己的老百姓、奴隶抓来拷打，逼供，这是对的吗？难道你不知道那些奸商的鬼把戏吗？他们经常借牧区死人之际，乘机敲诈勒索，向死者亲人朋友们胡说什么：‘死者从我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应该还账’的假话，借以骗取钱财。难道这样受骗上当的事情还少吗？我们全旗‘喝茶’的户数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以上，好多户已经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过着流浪生活。现在，你应该向绥远省政府如实反映情况，采取措施解救人民，不能听信呼、包商人的话，把自己的人民抓来搞逼供、体罚，这样做根本不是加强、巩固旗里的法制，而是胡作非为。

“你作为我的哥也好，作为札萨克诺颜也好，你的这种不为人民群众作主，不为人民利益说话，充当人民和奴隶们的阎王爷的作法我坚决反对！”朱日梅德道尔吉说了以上话后，气愤愤地就回了家。

在他们兄弟二人吵架的事情发生后，审讯和严刑拷打比较松了些。但对两个班第喇嘛例外，每天仍在继续进行审讯逼供。有一天巴策仁嘎日布管辖亲自去见了巴布道尔吉诺颜。他们两人经过讨论研究后，决定对那些被抓来的人，根据罪行轻重分别作了处理，处理意见如下：

第一，罚担任巴音山岱庙主事职务的喇嘛们

每人一匹马，打一百鞭后释放。但对其中原来任职的仁钦道尔吉老喇嘛除予责罚外，并令赶出寺庙。那位老喇嘛因无家可回，最后流浪到阿拉善旗死去。

第二，撤消根顿旦巴父亲大鼻子苏布依梅林的职务，罚一匹马，鞭打一百。

第三，对于牵连此事的其他台吉、官员，老百姓各罚一匹马，各打八十鞭后释放回家。

第四，对去巴嘎那特格参加“独贵龙”活动的三人，和给根顿旦巴骑驼的乌固日巴图等三人，分别判处徒刑一年，并令他们带手铐脚链走户串包游乡，到期后释放。

在这些人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受到处分：一个是巴音山岱庙的司供神佛的德瓦仁巴拉吉尔喇嘛。此人曾因为两个班第喇嘛念祝福经而被牵连进去的。审讯人员问他：“你为什么给他们念祝福经？”，他回答说：“我念经不是祝福他们，而是念的凡有邪念的人，都应被天诛地灭的经”。所以没有给他判罪。

另一个是那木斯来。他原在旗衙门任笔帖式（文书）职务。审讯人员问他：“你是本地区的开明人士，在你所在的地方发生如此重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管，不向上报告呢？”那木斯来理直气壮地向巴策仁嘎日布说：“你们这样做是

不对的，中公旗有执行法律的衙门，你们为什么不在旗衙门进行审理，而在塔本套勒盖搭起蒙古包另立衙门？这符合法律吗？这是偷偷摸摸地搞审判！我是政府官员，不是黄教（指喇嘛）。”此事巴布道尔吉诺颜认为是个普通小事，所以也就过去了。因此那木斯来没有受到处分。

那些被罚，被打的人们灰心丧气地离开“塔本套勒盖这个地狱”，各自回了家。

奇怪的是，在判决中，对于这次事件的主要罪犯，即两个班第喇嘛没有作出什么惩罚。仍将他俩同一个看守人员留在原地。看守人员叫温都尔图门。次日下午巴策仁嘎日布对温都尔图门说：“今晚你同两个班第喇嘛骑骆驼一起回家。走时，你们先沿着坡西沟边步行，不久就会有人给你送骆驼去，然后你们骑回去吧。”到时温都尔图门按照指示带领两个班第喇嘛往前走了不远，后边达木林斯仁领了几名兵赶上来，把两个班第喇嘛从骆驼上拖下来，命令温都尔图门脱掉他们两人的衣服，让他们站在沟边上，然后向他们说：“你们两人搞黑心眼，触犯了旗规，因此奉命依法处决”！根顿旦巴当时没有说什么。桑布却说：“我们对旗札萨克诺颜没有抱什么黑心，而是对旅蒙商确实有过黑心眼，告诉你，我们的行动不会到此结束，今后还会继续出现”。说罢就

听连续响了两枪，两个班第喇嘛应声相继倒地。

两个班第喇嘛被枪毙后，那几个士兵，拿上他们脱掉的衣服，把骆驼交给温都尔图们说：

“你把这两峰骆驼骑回去交给它们的主人”。说话间，被打倒的桑布突然站起来了，看着另一个班第喇嘛发愣，当时达木林斯仁拿过枪来，重新给桑布补了一枪，他才死去。

乌拉特草原上的两个班第喇嘛与旅蒙商的斗争被封建王公贵族和官吏残酷镇压下去了。

三公旗小学

宋布尔巴图

(一)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通电各盟旗派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从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彻底被摧毁，民主主义即将实现，对这场空前未有的革命胜利，全国人民包括蒙古族王公、庶民在内，都受到了影响。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乌盟盟长兼乌拉特中旗札萨克巴布多尔吉，带领乌拉特前旗梅令章京桑介扎布（汉名贺级三）及衙门师爷恩和巴雅尔等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议前后，他们三人游览了京、津等地区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同时观察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新形势、新气象。使一向偏居在盟旗的三位领导人，开阔了眼界，增进了知识，不仅对革命有了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改变盟旗经济文化落后方面，有了适应形势，奋发向前，创建学

校，培养人才的强烈愿望。

在这个时期，东北蒙旗师范教师郭道甫的学生及白云梯等人，随同冯玉祥部队进入绥远五原一带，贺级三以旗长身份带兵镇守包头，在园子巷设置了乌拉特前旗驻包办事处。这时他的助手“红党”恩和巴雅尔与蒙古人民革命党人有了联系，接受了乌兰巴托传来的革命理论及支援来的八九十支步枪。于是在乌拉特前旗梅力更庙一带，发展党员，组成党小组，招兵买马，建立“红党”武装，发放宣传革命材料，高唱革命歌曲。

与此同时，贺级三等三人，为了培养蒙族人才改变蒙区落后面貌，发起创办学校的建议。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得到乌盟盟长巴布道尔吉的同意，决定由三公旗联合办学校，成立筹备小组，由贺级三负责主持，由乌拉特中公旗章京巴扎尔、梅林德力格尔桑及乌拉特东公旗协理松布尔巴图等人参加。三个旗共拨出若干顷土地作为学田地，以其收入作为办学经费，学校名为“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三公旗公立两级小学校”。事后又经过一番努力，由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指定在千里庙前的同义隆为学田拨地，成立学田局，负责管理垦种和筹措学校费用等事宜。乌拉特中旗和后旗，曾也答应给学校拨地，但始终没有兑现。

三公旗小学，就是在当时国内革命势力由南向北发展；蒙古革命思潮由北向南传播，再加积极分子的努力倡导下，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建立、发展、完善起来的。

(二)

负责筹建学校人贺级三，原籍乌拉特前旗贺日恼德苏木人，他家住包头西兰柜窑子。他的小名又叫刘保子，人们尊称为刘保官府。他从青年时期即出入旗衙门，曾任旗的梅林章京，管辖六个苏木，是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的有力助手。办垦务时，经常代表贺喜格德力格尔处理具体事务，广交垦务局及地方绅士。一九二四年之后，经常代表旗衙门和贺喜格德力格尔本人出席各地举行的会议。冯玉祥进入绥西时，他以旗长身份镇守包头，在包头南圪洞建造了砖木结构，较为豪华的三套院，巷名叫贺家巷。

后来贺级三在办理放垦期间，不但自做主张和任意扩大报垦面积，引起广大牧民的反对，而且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也为他的独断专行非常气愤，将贺级三带上镣铐下狱。由于贺本人联系面广，个人名声高，再加兵权在手，贺喜格德力格尔对他无可奈何，只解除了梅林章京职务后释放。贺级三仍然带兵在包头周围的大树湾，五大

树一带驻扎，还依靠国民革命的势力镇守包头城，所以割去章京一职，并不降低他的威信权势，再加他还有一位得力助手“红党”恩和巴雅尔，所以他筹办一所小学，易如反掌。

一九二五年，贺级三在包头园子巷乌拉特前旗办事处门口，挂起了校牌，请王升为总务主任，雇用管帐先生和事务员开始筹备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改造了有三间大的教室二座，四五间学生宿舍，还建立了大小厨房、传达室、师生厕所，另外给学生做了一百多套书桌凳子，五六张教师办公桌子，以及大小黑板和讲台等等。

在修建教室、配备教学用具的同时，积极聘请教师。由于包头师资缺乏，便由山西大同、浑源、五台等地请来汉文教师李文诚，薛××，孟××，等三人，由“红党”恩和巴雅尔任蒙文教师，由李文诚任教务主任，同时责由李文诚备文报盟长及绥远都统府（省府）教育厅备案。与此同时请求上级拨发经费资助，呼吁各有关方面支持。因贺级三是当时的垦务局、水利局委员，镇守包头的旅长，所以地方豪绅纷纷捧场大力支持。在学田地还没有收入之前，即完成了筹备工作。

种学田地是经费的主要来源，而且油水极大，所以贺级三于一九二四年即命其子贺守基任

学田局局长。其子上任之后，先聘请了大小管家、帐房先生、长工头、大师傅，此外雇了二三十名长工。在千里庙前同义隆修建了许多间正房、库房、伙房、长工住房。贺守基统率其手下人马各执其事，除耕种几十顷土地之外，还放牧着牛羊。经过一年以后，真可谓：“牛羊满圈粮满仓”，供给三公旗小学师生职工一切工资和衣服、伙食等费用绰绰有余，当时蒙民中议论说：“从后套拉走的金子有碌碡那么大，到了包头磨成鸡蛋那么小”意思是说在学田地收入不少，其中漏洞很大，真正用到学校确不多。

开垦学田地，有了收入之后，起了很大的纠纷。原因是千里庙的主持管家，认为学田地原来是庙上的膳召地，所以学田地的收入应由庙上支配，再者开垦学田地，破坏了草场，影响了放牧，所以要求收回学田地。石拉布多尔济任札萨克后认为学田地的收入应上缴王府一部分。至于贺守基更是理直气壮地认为他是执行老札萨克贺喜格德力格尔的命令，名正言顺，要全权支配学田地的一切收支。三方面各持已见，闹得不可开交，矛盾日益激化。尽管如此，经过积极努力之后，学校有了场地，有了教师、职工、有了充足的办学经费，其筹备工作基本结束。

(三)

一九二五年，贺级三任第一任校长，当时有汉教师三人，蒙教师一人，校医一人，学生仅有七八人，上课一两个月就放假了。学生冬夏季衣服穿戴、理发、洗澡、医疗，以及学习文具，用具等全部由学田经费拨款供给。沙尔沁、土默特蒙民子弟中与贺级三校长、贺守基学田局长有亲属关系的如全崇德、全崇富、全新华、云文斋等都享受了不同的公费待遇。

当时教师工资相当高，最低的每月支现大洋四十多元，教师家属由校方安排住处。一九二六年，“红党”恩和巴雅尔同贺级三的内弟喇嘛扎布前往乌兰巴托后，于一九三一年从科尔沁旗请来吴亚挥老先生（大胡子，以后赴北京蒙藏学校任教）教蒙文，他月支现大洋八十元还嫌少，从而可知校长、主任等人的工资更为可观。直到一九二六年，蒙民对送子弟入学学习的道理还不理解，尽管入学后完全享受公费，但仍没人自愿入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衙门采用了强迫性的指名入学措施，如仍不去入学者，即派人抓学生，结果只抓了十多名学生。其年小者十二三岁，大者二十一二岁。抓来年龄大的学生，住上几天，换上新衣服就跑掉。比较安心学习者，要算贺家

子弟，因为他们住在包头五大村一带，大部分是贺家的亲人，如贺守先、贺守忠、贺淑清、贺守业、贺守信、贺立基、贺立业、贺永级、贺级富等。

一九二八年间学生增到一百多人，教室不够用，宿舍也不够用，于是租用了财神庙街长城巷内一个大院，修了四个大教室和学生宿舍。随着学生的增多，教师也相应增多了，如薛韩正、史境武、巴拉吉尼玛、图门巴雅尔、恩和巴雅尔、呼尔沁毕力格、李振江、王恩荫（原巴盟副盟长）侯燕之、孟宇等都是新增教师。当时由教务主任李文诚代行校长职权。此外增设了事务主任、训育主任、事务员、会计员等共达十四五人之多。实行“四二”制教学，教学科目有算术、语文（包括蒙文）、地理、历史、美术、武术、唱歌，后来还增设了英文、满文、藏文等课。此外为了办好学校，成立了董事会，聘请社会名人任董事，商讨有关重大事宜。

一九二九年，学校董事会认为在包头办学校，学生入学率不高，有必要迁回乌拉特前旗教学。根据这一决定，便在乌拉特前旗梅力更庙借用章很大院，修缮了许多房间，把学校由包头迁到这里办了一个学期，学生人数有所增加。但学生们非常淘气，经常到庙里折腾，还和小喇嘛打

架，再加汉教师不习惯在山沟里生活，喇嘛们也反对在庙上办学，于是汉教师纷纷要求把学校搬回包头，校址仍设在包头园子巷前旗办事处院内，并将札萨克来包时住的正房外间改为教室。（札萨克来包时住里间）。

一九二九年贺级三校长逝世，由其子贺守基代理校长。不久校长由代理札萨克额尔贺多尔济担任。

（四）

额尔贺多尔济，汉名额宝斋，任乌拉特西公旗札萨克，他原是贺喜格德力格尔的东协理，贺公逝世后，由于继任札萨克的人选一时决定不下来，在石拉布多尔济和巴图巴雅尔互争札萨克职位之际，盟长指定额宝斋代行札萨克职权。他掌握了全旗军政大权以后，便自动兼任了三公旗小学校长。

额校长上任以后，除汉文教师个别变动外，大部分仍用旧人。蒙文教师辞退了吴亚辉老先生，从绥东福生庄请来巴拉吉尼玛任蒙文教师，另外还聘请了乌拉特西公旗的阿尤尔布尼亚和乌拉特东公旗原任协理松布尔巴图等二人任教。这个时期职工七人，教务主任一人，总务主任一人，记帐员一人，事务员一人，工友一人，炊事员二人。

这个时期有蒙汉学生近百名，除有土默特旗学生七、八名外，其余都是乌拉特西公旗人。一九二九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五人，一九三〇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人，一九三一年初级班毕业了十二人，高级班毕业了七人。

额校长在任时期，石拉布多尔济在衙门里争权夺利占了上风，于是后套千里庙、同义隆学田局停办，所有学田局的土地财产一律归由石拉布多尔济处理。学校经费来源，改由中滩，五大村垦务岁租收入中支付，其收租事宜责由包头办事处办理。

这时学校董事会，由额宝斋兼董事长，由王升、王三不浪任副董事长，下设工作人员四五人，主要办理收款记帐等事宜。这时垦务岁收不亚于学田局时期的收入，满可以支付教职工的工资以及各项开支所需。

这个时期事务主任史境武，对供应管理学生的衣、食、住等方面非常认真。设备也增加了不少，如各种乐器、大小军鼓、军号等深受学生喜爱。学生在参加运动会、游行时，齐穿一色新校服，队伍整齐化一，十分壮观，在包头城内所有学校中，堪列首位。

后来由山西五台山请来张××担任学校的武术教练，教学生学武术。各项美术作品都在成绩

展览室里展出。每次参加运动会时，均创可喜的成绩。

一九三二年秋，额宝斋校长和新上任的札萨克石拉布多尔济之间矛盾重重，于是额宝斋逃往百灵庙，投奔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遗缺自然由石拉布多尔济担任。

(五)

一九三三年石拉布多尔济自任校长，辞去原教务主任李文诚，另聘请严肃（实际是绥远省教育厅派遣来的）担任教务主任，同时代行校长职权。严肃本人出身行伍，他在学校根本不管校务，每日忙于窥探石拉布多尔济的动向，调查了解社会的动态，他实际上是绥远省驻乌拉特西公旗的坐探。

与此同时，一位叫王汉民的教师也来到了三公旗小学。王是吉林省人，日本留学生，他精通日语，略懂汉文，行动诡秘，与日本人有何等关系不得而知，但从日寇占了包头以后，他一跃而升为包头市政府总务科长来看，可知此人是个日本特务。

三公旗学校出现了严肃、王汉民以后，他们不务正业，学校各个方面停滞不前，蒙生减少，大量招来汉生入学顶充人数。这些汉生大部

份是西公旗富人子弟，他们虽不享受公费，但也不交纳学费，而且还给课本文具等等。汉生大部分年幼系跑校生，蒙生年岁大均住校，蒙汉生经常有打架现象，训育主任概不过问。

这个时期，学校里成立了童子军，每人都发放了童子军服和一些用品。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教育非常松弛，以致学生违纪行为非常严重。有些大点的学生经常与警察闹事，到戏园子捣乱，到下流地方胡混，甚至为伙食标准下降而找衙门仕官闹事、罢课。更奇怪的是教师聚众赌博，被学生抓住后，教师向学生行贿。教师引导学生仿效桃园三结义拜把子认兄弟，从而趁机大吃大喝，把个好端端的学校竟被一二个来历不明的人搅得乌七八糟，笑话百出，使学校走向下坡路。

一九三六年秋，石拉布多尔济逝世，其夫人奇俊峰（蒙古名色布勒玛）出任三公旗小学校长之职。

（六）

奇俊峰是石拉布多尔济的三太太，虽稍懂汉文，但并不懂办学之道。她上任后，把表现好且有学识的教师大部分辞退，委派她的亲信图门巴雅尔任蒙文教师，请来两三名买卖人任汉文教师。奇俊峰与教务主任严肃关系较好，严成了奇俊峰

的私人秘书。此时学生只有三十余人，学校经费挪做王府衙门使用，学生享受公费无从保证，经常请愿，罢课。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奇俊峰去后套，教务主任严肃去向不明，只留下总务主任王升。他趁机独吞学校财产，三公旗小学校到此时混乱不堪，濒临垮台边沿。

(七)

一九三八年，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额宝斋由绥东重返西公旗，仍住在包头园子巷办事处，成立了乌拉特西公旗政府，代行札萨克职务。从此以后就不再提三公旗学校了。

一九三九年初，旗政府迁到东大高勒沟口时，把三公旗小学剩下的部份桌凳也搬到乌日图沟口的小庙子（今白彦花苏木），借用活佛的大庭院和喇嘛们房舍作为校舍，校名改为乌拉特前旗小学校，由阿命达瓦主持校务。在阿命达瓦调升到旗政府工作以后，由额尔登毕力格负责学校工作。他从本地聘请了特古斯毕力格担任蒙语教师，后来因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包头、五原等地交战，局势不稳，学校停办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六年，学校又搬到官牛惧，校名改为西公旗国立中心小学。学校的一切费用由旗政府支

付，学校的负责人为杜锦华。

一九四九年校址由官牛棋迁至根子场，继续办学，暂由教务主任华吉日戈负责学校工作。一九五〇年把学校又迁到小庙子，这时由初小发展到完小，一九五三年学校迁到哈业胡同，修建了新校舍，添置了学生桌凳和办公用具，华吉日戈任代理校长职务。一九五六年学校从哈业胡同迁到哈拉汗，校名改为乌拉特前旗白彦花蒙古族完小，华吉日戈任校长。同年上级给学校分配了五六名师范毕业生任教。随着时日的推移，该校的面貌日新月异，学生连年增加，教学质量大为提高，深受群众欢迎。

(八)

从三公旗小学改名为西公旗国立中心小学而发展成为今天的乌拉特前旗蒙古族第一中学，尽管为期不太久长，然却相当曲折。

由于当时教师本身水平较高，加上要求严格，所以学生的成绩出色，培养出许多有用之材。

据统计了解，三公旗小学毕业生中鄂秉礼、鄂志诚二人保送到黄埔军官学校学习，郝体礼、德振国保送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贺守先、贺守

忠、贺守业、郝振华、鄂枢中、云文齐（土旗人）等六人考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学习。

从三公旗学校毕业后到外地深造毕业者有：伊锦文由民国大学毕业、贺守业由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焦连璧由日本法政大学肄业，又在东京医大毕业、云文齐由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贺守忠和郝永忠由日本北海道大学毕业。

原三公旗小学学生，经过深造担任了不同职务者计有：贺立基从蒙古留学回国后担任伪蒙军副团长；金志强从伪王爷庙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蒙古军团长。另外从三公旗小学出来的师生，经过学习、锻炼从而在旧社会任职者有：三十五军某团团长吕景瑞，某军团长军统特务郑凤鸣（已镇压），国立伊盟中学教师、乌拉特中旗国民党党部书记贺守忠，伪国大代表、国立乌拉特前旗小学校长贺守业，茂明安旗三青团书记员郝振华，马王庙蒙古中学校长、土旗包头小学校长，国立伊盟中学教员，乌拉特西公旗西协理鄂枢中（宋布尔巴图），伊盟中学代校长伊锦文，西公旗保安司令郝游龙等。

三公旗小学出来的师生，在新社会参加革命工作比较出名的有：内蒙古卫生厅厅长胡尔钦必力格，畜牧厅畜牧处处长云文齐，内蒙古蒙文专

科学校总务主任贺守业，内蒙古大学图书馆长伊锦文，乌拉特前旗旗长阿盟教育局局长恩和巴雅尔，乌拉特前旗副旗长拉麻扎布，乌盟、巴盟文教处副处长宋布尔巴图等等。

从上述事实来看，早期的乌盟六旗都没有设立学校，三公旗小学成立以后，绝大部分学生是乌拉特前旗的学生，因而从乌拉特三公旗小学毕业的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较早。无论新旧社会从事各项工作者也较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等等方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刘笃仁与私立河套中学

李俊

一、河套中学成立的时代背景

私立河套中学于一九三二年八、九月间正式成立，校址设在河套地区的五原县城隆兴长镇（即现在的五原县城关镇）。这个学校的诞生主观上固然与刘笃仁的积极努力有关，但是客观上也因广大人民深受“教育救国”这一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青年人有强烈的求知愿望，从而促使这个学校的建立。

（一）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辽宁、吉林、黑龙江东北三省，并节节向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进犯。这时全国人民莫不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各地抗日救亡、收复失地、誓雪国耻的各种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河套地区和全国，全省的情况一样，抵御外侮，奋发图强已成为各族各界人民的共同愿望，一致要求。特别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更是热血沸腾，报国心切。这时有一些知识分子按捺不住

心头的怒火，毅然弃文就武，投笔从戎。河套地区五原县私立育德小学校的校长刘笑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久，他和其他的一些教职员就写下了血书，立下了誓言，告别了妻儿老小，只身奔向了战火纷飞的前方，以求尽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这一天职。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因受当时“教育救国”，“读书救国”的这种思潮的影响较深，所以他们则将全部精神倾注于兴办教育事业，用于培育人才方面之上，像当时五原县女子小学校的校长刘笃仁就是这些人之中的一个。由于他们出于挽救国家与民族危亡的一片热忱，也由于他们有感于当时的教育不符合外患当头的国情，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能适应客观形势急剧变化的需要，所以酝酿创办一所他们自认为是理想的学校，就成为这一部分人在这一个时期的中心议题，也就成为以后私立河套中学在河套地区异军突起的动力。

（二）东北三省沦陷后，原在辽宁省沈阳市设立的私立冯庸大学亦因此而停办。该校校长冯庸因处于家庭破产，学校被毁的境遇，有感于东北已无立身创业的机会，遂带领一部分随员漫游西北一带，考查并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在道经五原时，曾对这里的各界人士作过一次讲话。讲话的内容大致有三点：一是他把日本军侵占东北的经

过作了详细介绍。在谈到日本军和东北军（即张作霖的旧部）从装备上、训练上、士气上对比的这一点时，他的结论是敌强我弱（指东北军），东北军在各方面都比较落后，虽有抗日之心，而无杀敌之力。二是他简要介绍了冯庸大学对学生培养教育的方法、内容以及培养的目标和要求等。他说：冯庸大学是培养能文能武的学生，既学专业知识，也学军事技能。进而他还谈到冯庸大学的学生在“九、一八”事变时对日作战中所起的重大的作用。三是他谈到开发河套这个问题时，他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一起上，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教育是基础。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要从普及教育着手，河套地区不仅要办小学，也应办中学，办职业学校，办大学，这是开发河套的关键，也是强国富民的关键。为此，他还强调说：没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国民，是不会建设起一等强国。冯庸的这一番讲话，给当时五原县教育界人士、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对积极筹建私立河套中学也起了一定鼓舞和促进作用。

（三）河套地区当时的行政区划有五原县、临河县和安北设治局（即现在的乌拉特前旗）二县一局，地处绥远省的最西部。从文化教育事业说，是十分落后的。这三个县、局除有几所完全小学外，再无别的学校，而且这几所完小每年

毕业的学生升学率也是很低的，能够到外地升中学的不过百分之五、六。其所以如此：一是交通不便，行动有很大困难。当时这里小学毕业的学生如果要到中学或中专继续升学的话，最大的可能一是到包头市（当时包头市只有初级中学一所），二是到绥远省会归绥市（即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归绥市距离河套的三县、局均较远，包头市的距离虽说较近，但离河套东边的安北设治局尚有二百四、五十里，离西边的临河县则将近五百里，离中部的五原县也有三百五、六十里。其时由临、五、安三县，局到包头市仅有一条坎坷不平、道路崎岖的土公路。客运汽车均系私人经营的，还不每天运行，而且运行一趟就以五原县城到包头市说，在正常情况下也得两个整天，如遇到下雨下雪的时候，需要的时间就更长。这就使不少学生不得不打消到外地求学的这一念头。二是由于经济所限，无力到外深造。河套地区是个纯农业区，求学的学生多系农家子女。这里虽然久有“天下黄河富一套”的美誉，但是在旧社会，由于水利失修，耕作手段和耕作方法落后，农产品的产量是极低的。农民每年的收入除过交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所剩无几，再加当时各行各业普遍都存在着那样那样的问题，在农业上是“谷贱伤农”；工商业上

是“产品滞销，买卖萧条”，绝大多数群众基本上是过着饥寒贫困的生活。基于这种情况，因而许多家庭的子女对升学一事，虽然有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却无实现的力量。三是少数家庭对自己的子女到外地升学还存在种种顾虑，特别是对女孩子不放心，这也是造成有些学生不能外出求学的原因之一。根据以上所述，所以河套地区的小学，年年毕业一批学生，年年失学一批，而且失学人数年年有增加。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既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关注，也成为许多热心于教育事业人士，苦心研究与寻求解决的问题。无疑，这也是导致河套中学能以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河套中学筹建的经过

刘笃仁于一九三二年春初，开始筹建私立河套中学。

刘笃仁又名静山，山西祁县人。系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他在河套期间，历任过五原县教育局的督学、局长、女子小学校的校长等职，前两职任期很短，后一职任期较长。如前所说“九、一八”事变后，刘笃仁在抗日救亡，共同对敌，收复大好河山的声浪高涨下，在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悲惨遭遇下，在河套地区失学青年年年有增加，殷切希望升学深造的情况下，面对

这些现实问题，他和其它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怀着的一颗火热的心，立下了雄心壮志，挺身而出，把创办河套中学作为己任，作为自己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一九三三年初，刘笃仁首先和五原县各界人士，交换了筹办私立河套中学的具体计划和意见，说明了举办这所学校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地方士绅们的责任。经征得同意后，接着他又到临河、安北两地和那里的各界人士作了商讨、研究，这两个地区的各界人士同样也表示愿意在各方面给予支持。这时适有绥远省政府实察员（后改为视察员）齐寿康到河套一带视察政务、财经、文化、教育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刘齐两人交谊较深，齐对刘一向推崇备至，他得悉刘有创办中学之举后，也认为这是河套地区的当务之急，愿大力协助，期使早日实现，并表示回省后把这件事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去讨论，请省里有关部门能够批准承认。在上下左右均无异议，同声赞同的情况下，刘笃仁遂下定决心，辞去了五原县女子小学校长的职务，把全部精力投到了筹备建设河套中学这件事上。

为了做好准备工作，刘笃仁经与当时五原县隆兴长镇一家较大商号日盛盐店联系，妥借用了该店西临义和渠畔的四间土房，一间作为筹备的

办公室,另三间作为教室,并挂起了“私立河套中学筹备处”的牌子。接着又开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录取了学生三十名。这些学生都是家在五原县城内居住,过去的高小毕业生。对远处的学生一方面因办班时间比较仓促,未能及时通知。另一方面因房舍条件所限,来后也无法解决其食宿等问题,故未进行招收。筹备处和附设补习班只设有两个专职人员,一个是刘笃仁,他负责行政领导和教务、事务等全盘工作,另一个是工勤人员。教师全部是聘请兼任,不给任何报酬。筹备处和补习班的经费完全依靠学生每人交纳的三元学费来维持,除此再无别的来源。

一九三二年暑假期间,刘笃仁以私立河套中学筹备处的名义,邀请五、临、安三县局的部分地方人士,在五原商讨了成立河套中学校董会及其它有关事宜。经研究推选出的校董会员,五原县占了绝大多数,这是因校址设在五原县,为了工作方便,遇到问题便于随时研究解决之故。五原县计有:王乐愚、田权贵、唐兆铭、白子文、刘文、康三元、刘人俊、刘笃仁等人;临河县计有:李干臣、刘敬仁等人(其他人不详);安北设治局计有:赵炽昌、武俊峰(又名武驼羔)王时英、王文杰等人。校董会的董事长公推由王乐愚担任。

在这次校董会上决定的事项:

(一) 宣布私立河套中学校正式成立，启用公章，通知五、临、安三县、局知照，并立即办理备案手续。

(二) 决定由刘笃仁担任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

(三) 校址设在五原县城隆兴长镇，校舍临时借用县水利局的旧房，待有经费后再兴建新校舍。

(四) 将原筹备处附设的补习班学生经考试合格者转入初中一年级，又从临河、安北两县、局补招部分学生。以后每年招收初中新生一班。

(五) 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向五、临、安三县、局募捐，其次向学生收学费。

根据校董会的决议，刘笃仁在暑假期间开学之前，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 积极维修和改建了县水利局的旧土房十四、五间，初步对学生的教室、寝室、厨房、教师宿舍、办公室、库房、厕所等作了安排，装备了必要的用具和用品。当然这些设备都是极其简陋的，是本着少花钱或不花钱的原则筹办的。

(二) 在临河、安北两地招收了部分学生，补充了原有学生（即补习班的学生）名额的不足。这对这两个地区的失学青年鼓舞很大，使他（她）们的家长得到了莫大安慰。

(三)向五、临、安三县、局的各界人士、殷实大户募捐了学校的基金。但是这次募捐的结果：认捐粮食的户较多，认捐现金的户却很少。

(四)聘请了五名专任教师和部分兼课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师资质量还是较高的。

(五)将学校筹备的详细情况，备文上报了绥远省教育厅，请尽早批示，准予备案。

在上述各项准备工作初告就绪后，河套中学于九月间即行开学。这一期学生，在入学之初共有五十名，后有个别学生，因各种原因退学和休学了几人。

一九三三年暑假期间，该校又招收了一班初中一年级学生四十名，在校生到达八十五名。学校的各种设备虽说简陋、条件较差，可是学生的学习情绪却是很高的。大家都感到能有这么一次进入中学学习的机会是来之不易的，大家都珍惜能有这么一个学习的地方。

三、河套中学办学的指导思想及其特色

刘笃仁在河套中学第一班学生开学典礼时就把该校办学的指导思想作了阐明。他说：河套中学要办成一所教学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学与用知

与行相结合，言与行相一致的学校。对学生提出的要求是“立志做大事，不图名和利；在校要做好学生，出校要做好公民；平时能从文，战时能搞武。在他的这种思想影响下，所以各种教育内容和教学活动中无不贯彻着这一精神。

私立河套中学在办学的形式、教育的方法和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上，与其它普通中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它在某些方面是具有一定特色的一所学校。现择其要者列举几点如下：

（一）勤工俭学，自食其力。为了培养学生爱学习、爱劳动、爱学校如家的思想，也为了使学校能以节约开支，使学生减轻经济上的负担，学校对学生订有一种劳动制度。劳动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是炊事方面的劳动，学校的师生食堂是一个灶，设专职炊事员一人，总管食堂的全面工作，具体工作如做饭、洗锅、采购等等均由学生轮流担任；一种是勤杂方面的劳动。学校无工勤人员的设置，凡担水、扫院、清扫教室、寝室、清除垃圾和厕所的粪便等事，也都由值日生去完成；一种是建校方面的劳动。利用假日发动全体学生修补校舍、粉刷房屋、美化环境等；还有一种是农业方面的劳动。在农业大忙季节，学校停课五至七天，全体师生出动到农村协助农民去做播种、锄地、浇地、收割、打场等农活。对于劳

动好学习上也取得了较好成绩的学生，学校在学期终了时，要进行一次评奖，有的在大会上给予口头表扬，有的发给奖品、奖状，有的减免其学费。

（二）学用结合讲求实效。河套中学的教学计划内容，总的说是按照全国普通中学通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开设的，但是讲授时，则在许多课程中，增加了不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应具有的知识。例如数学课，不仅讲授课本内的各章、节课文，要求学生按讲授的进度，能够很好地理解原理，完成作业，笔算出规定的习题，而且加授一定时数的珠算，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珠算的加、减、乘、除以及地亩和斤秤的计算方法。此外还让学生学习一点会计、统计方面的知识。语文课，除讲授教材的各课文外，增加部分应用文的讲授，如互相交往方面的书信、贺信、请贴，公文方面的布告、通知、公函、呈文、指示、命令的各种文稿的写法。同时还让学生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去学习书法。结合动、植物课的讲授，要求学生绘画所学课文的图谱，对绘画较好的图案，则裱糊成挂图，以供学校教学使用。另外为使学生对动、植物的分类，机体的组织、结构、性能以及生长发育等方面的情况加深认识和记忆，利用节日或假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

带领学生上山下乡进行现场教学，采集标本，这样既巩固了学生的学习成果，也为学校增添补充了教学设备。

（三）实行军事训练，培养尚武精神。河套中学的学生每天早晨有一小时，每周另有四小时的军事训练。训练的科目，在学科方面择要讲授《步兵操典》、《射击规范》等。术科方面主要学习各种步法和枪法。步法如：立正、稍息、齐步、正步、跑步等；枪法如：持枪、背枪、立射、跑射、卧射等；除此还学习一点防空、防毒和救护知识。在其它方面基本上也按军营中的风纪去要求，衣服要整齐清洁，一律穿短服不准穿袍子、大衣，女生也是如此。吃饭时，先吹哨集合，然后排队进入食堂，各自在各自的座位进餐；寝室内被褥折叠的要有棱有角，整齐划一，洗脸盆、毛巾、漱口缸、肥皂盒都须放在固定地方；个人的衣帽不穿戴时，要挂到自己所睡炕位上方的墙钉上，不得乱抛乱扔。另外男生一律推光头，不留胡子、不准吸烟。女生不能留披肩长发。诸如这些，均已形成制度。

私立河套中学，对学生之所以把军事教育作为一项重要课程，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具有尚武精神。要使学生养成严肃、紧张、遵纪守法的习惯，也就是为使学生在必要的时候，在非常时期，

能够拿起武器当一名战斗员去使用，能够捍卫祖国，抵御外侮。

（四）开创文艺园地，培养学生写作能力。河套中学对学生的写作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锻炼学生写作能力，提高学生写作水平，除规定每周有四小时的一次作文时间，每日必须写一篇日记外，于一九三二年冬由国文教员韩梅圃倡导，组织了部分爱好文学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烛幽文艺社。”这个社先是每半月出“烛幽文艺”墙报一次，后又不定期增出油印的“烛幽文艺”刊物一种，每期页数有十几张。刻写、印刷、寄发等均由学生自理。墙报和油印的刊物其稿件来源系由学生撰写，择优选登。文体为：诗、词、歌、赋、散文、杂文、小说、纪游、民间谚语、山歌、神话、轶闻以及时事评论等均有。每期还有插图、漫画，可称图文并茂。这个墙报和油印刊创刊后，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写作兴趣，也提高了一些学生的写作水平。如署名幻光所写的《河套纪行》（连载），《河套民歌选》（连载），以及许多散文、诗词，署名毓民所写的《河套轶闻录》（连载），还有署名延光所写的一些小品文，均曾不断发表于当时绥远省各大报纸的文艺副刊之上。这些学生一时间成为许多爱好文艺读者所熟知的作者。

四、河套中学的停办及其善后

私立河套中学于一九三三年放寒假时，校长刘笃仁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挥泪宣布了奉上峰指示，让该校停办的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在教师中是早有所闻的，是有思想准备的。可是在学生中间闻讯后，却象晴天霹雳一般，这时师生之间无不声泪俱下。这一指示公诸群众后，许多学生虽然明知学校已不能再行存在，已无挽救的余地，但因他们和这个学校已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和这里的老师、以及同学之间结下了诚挚的情谊，所以甘愿久久的、凄楚的住在冰冻的寝室内不忍离去。私立河套中学的停办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归纳起来不外是：

（一）备案未准，被迫停办。河套中学于一九三二年秋正式宣告成立后，即将学校的筹备经过，当前的情况，今后的计划，备文上报了绥远省教育厅，请予审核批示。以后为了备案一事，该校曾多次写过报告，刘笃仁也多次赴省作过请示，但教育厅的态度是时有不同：起初是让积极加强学校的各项建设，要请地方人士多给予支持、资助，对于备案一事不必有所顾虑，只要地方同意，省里对学校也不会作难。当再请示时，教育厅又表示：河套中学距省垣较远，各方面的

情况均不了解，关于备案一事，待派员了解后，再研究决定。这样左推右推，一直拖到学校成立一年以后的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教育厅始派人莅校进行了视察。这一次视察的结果，也就决定了该校停办的命运。在接近放寒假的时候，有一天教育厅突然对该校下达了一项通知，其大意是：查该校一无校舍，二无资金，三无设备，四无足够的专任教师，据此情况，所请备案一事碍难照准。与此同时教育厅对该校还作了“应立即停办”的指示。

（二）经费拮据，难以维持。河套中学的经费如前所说，原来的指望一是靠募捐；二是靠向学生收学费。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并非原来所想的那样。从募捐说，总的情况是认捐的户越来越少，认捐的数额越来越小，不论粮或钱都是如此。刘笃仁为了给学校募捐经费的事虽然在五、临、安三县局跑了多次，跑的精疲力竭，到头来募捐到的东西远不能满足学校的需要。他也曾不断向校董会的各董事呼吁设法解决，可是听到的回音多是有精神上的鼓励，而却很少能见到实惠。再从学生的学费看，住这个学校的学生，其家庭情况一般说都是不富裕的，虽然规定了每个学生每学期的学费为五元，可是不少学生因种种困难，未能按时交纳，同时还有一部分学生属于勤工

俭学较好，减免学费的对象，这样一来所收到的学费实际是寥寥无几，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经费既然开源无术，节流又属有限，学校有许多问题自然也就很难得到解决。就以教职工的工资说，兼课教师一直是白尽义务无任何报酬这且不谈。就是专任教职工（包括校长在内）也是长期以来，每月只酌情发给一点生活费，而无固定工资。长此下去，谁能安心于在这个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谁又能把这个学校继续办理下去？何况省方又有停办的指示。

经费无着和备案不批是交织在一起的。因备案迟迟得不到批准，使许多人就产生了观望态度，也就削弱了人们认捐经费的积极性，给募捐工作带来了困难。由于学校经费极端困难，在各项建设工作上无从着手，对各个问题无力解决，这就成为不予备案并令停办的借口。

（三）孤军作战，陷于绝境。刘笃仁在绥远地区，在河套地区是个外来户，上无靠山支柱，在地方势力的派系中，也无他的三亲六故。在他创办河套中学之初，河套地区的许多上层人士虽然是同声赞同，好话说尽，可是在学校成立之后，当困难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人（也包括一部分校董在内）就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态度：有一些人只有口头上的声援而无实际行

动；另有一些人则是抱着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态度。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人则是心怀种种猜忌：一怕他以办学为名，谋取私利。二怕他培植个人势力，形成霸据一方的局面。这些人实际上是起着拆台破坏作用。这是河套中学在河套地区，当时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至于省里的情况更是极其复杂的。当时绥远省教育厅是绥远地方人的势力范围，地方人内部之间的争权夺利，派系斗争虽然也是剧烈的，但对外来户（即外省人）却是一致的，无所不用其极地施以打击排挤的手段。刘笃仁既然是个外来户，是个异乡客人，在这种局势下如何能让他在教育界出头冒尖？这是一清二楚的。河套中学的备案其所以不予批准并令停办，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河套中学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的烽火燃烧着四方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它却又成了地方派系明争暗斗、硝烟弥漫这一局势下的牺牲品，历史的事实就是如此。

一九三三年底，河套中学决定停办后，一个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就是对这八、九十名学生的善后安置问题。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在了刘笃仁肩上，需要他去完成；这个问题自然又必须他付出最大的努力去解决。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刘笃仁在寒假期间征求了每个学生的意见，也走访了许多

学生的家长，经了解大家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不外是以下三种：一部分学生强烈要求转入到别的中学继续学习；一部分学生愿意在城里找个地方，找个就业的地方；还有一部分学生因种种困难、种种原因，家里不愿再让自己的子女远离身边。对于愿意留在家里不计划转学或找别的工作的这部分学生是比较好办的，用不着学校再去考虑他（她）们的去向。对于愿意找工作就业的这部分学生，当时适有山西省学兵团在绥远各地招收学员，同时五原县林业试验场也要一些从事林业方面的工作人员，所以有不少学生就决定参加了这两种工作。还有为数不多的几名学生，自己找到了或经商或学工的地方，这一部分学生基本也都有了归宿，得到了安置。而问题最大、最不易解决的是要求转学的这一部分学生。

刘笃仁在摸清要求转学的人数和他（她）们所希望转入学校的情况后，他冒着冰天雪地的严寒，不辞劳苦，立即奔赴包头市的省立二中（当时包头市只有这么一所省办的中学），归绥市的省立一中，省立师范、女师、农科、工科职校等中学和中专为他（她）们联系转学事宜。他花了不少精力，费了不少唇舌、用了不少时间，最后总算得到了各学校的同意，并把到各学校的人数、人头也均作了一一落实。这一年的春节他都

忙的未回去家里和家人一起欢度。

一九三四年春在开学之前，刘笃仁带领着这批转学学生、分别送到包头、归绥两市的各个中学、中专之中，使这些有志于学习的学生终于得到了继续求学的机会。由此可知刘笃仁对河套中学停办的善后工作也尽到了责任，做到了善终。

五、几点认识和说明

(一) 河套中学从一九三二年春开始筹备和办补习班，到一九三三年底停办，一九三四年春搞完善后工作，虽然历时仅有两年时间，但它是河套地区首创的一所中学，它对河套地区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开发智力、促进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以后河套地区的学生，或到归绥、包头，或到平、津一带升学的人数，其所以年有增加，是与受到河套中学的影响有一定关系的。

(二) 河套中学在办学上是既学文又学武，既学书本上的知识又学适用于生产生活上的本领，勤工俭学，学用结合，这在当时绥远地区的中学中还少有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当该校停办后，其学生不论走向何种岗位，从事何种职业，均能克勤克俭，吃苦耐劳，这种朴素的作风是与在该校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

(三) 河套中学停办后，距今已有五十个年

头了，原在该校求过学的学生，现在健在的还不少，他们之中有些人，在不同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在勤奋的劳动着，有些人还做出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因有感于此，特愿将该校的始末略予追述。

（转自《五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忆河套私塾概况

康兴恒

我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五岁时，从包头随家迁来河套。我父亲曾考中过清末秀才。他大半生致力于“设馆”教私塾。我因有这个便利条件，七岁时便开始念上了“赵钱孙李”，一直读过十多年的孔孟之道。仅就我童年亲身经历过的私塾概况，忆述于下。事隔六十年之久，出入之处，在所难免，切盼知者指正。

当我初到河套时期，套内只有五原、临河两个简陋小城镇，也设有一两个“洋学堂”，农村仅有的私塾实在寥寥无几。就我初落脚点——扒子补隆（前旗新安镇）一带来说，周围近百里地区，除扒子补隆设有一所以灌输基督教义为主的教会学校外（是美籍牧师费安河创办），再就是我父亲任教的那所私塾，在当时数得上是远近驰名的一所唯一的庠序了。

私塾的筹建，多半是以有财富的大人家为主，因这些门弟子孙辈较多，一般是没有送子女

入洋学的，专请一位“先生”（对老师的称呼）来教读；兼收些他人的子弟。私塾既设在荒凉的农村中，只能是选择一所较宽敞的土房为校址，教室、师生宿舍、厨房都是它，一无学生上课用的桌凳，二没有“先生”授课的讲台，师生同坐在土炕上。学生各备有一张小书桌（象一般小方炕桌，只是多加一个抽屉，供放置书籍、文具等所需），各据一桌，盘膝而坐；先生占前炕的一侧或写或读，终日不离“书馆”。

先生的报酬，就是学生每学期所交纳的“束修”——即学费，每个学生每学期约交三银元上下（视学生所读的课程繁简而定，繁者多点，简者少些）。学生人数多达二十人以上，少到十人左右。此项“束修”，绝大多数能主动交清，偶有“赖皮户”，多是权势之家，甚有拖到不了了之的。先生终年所得，除“束修”之外，再就是四大节（春节、端阳、中秋、冬至）学生们的馈礼（不外是食品、肉类、糕点等物），但不同于“束修”，送不送都行。还有新生入学时所备的“拜师礼”（也是馒头、麻花、食品等类）。入学时须跪拜“孔像”和先生。

教学内容：以孔孟之道的书籍为主，入学后初读者称“蒙学生”，读以《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名贤

集》等书，以及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杂字书籍，如《四字杂字》、《五言杂字》、《六言杂字》、《七言杂字》、《五言孝经》、《坐铺杂字》、《劝民十教》等。对学生来说，杂字书通俗易懂，读起来押韵顺口，甚感兴趣。因而在当时发行“杂字”类的书多达一、二十种，这里限于篇幅不便繁举。逐步读完《小学韵语》一书，便开始读《四书》、《五经》，就算“大学生”了。这阶段加学些诗词歌赋类的书籍，如：《五言神童诗》、《五七言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释义》、《古文观止》、《幼学琼林》等。也兼读些历史书，如：《七字监略》。其他课程：一门是珠算，包括加减乘除法。另一门是写毛笔字，由“照仿影”、“写对对”到“临帖”。为了帮助学生多识些字，有“考字本”（用白麻纸装订成本，先生把生字写在本上，让“大学生”读音和讲意）和“字片”（用白麻纸裱成格襟，裁做小方块，先生把生字写入方块，让“蒙学生”认读）。这种读生字的方法收效很快。练习写文章的极为个别，常常是整个学期没有一个“大学生”练习写作。以致读过四、五年书的学生，连封语句通顺的信也写不出来。字典：有《五方元音》、《考正字汇》、《康熙字典》等，这些字典虽供“大学生”和“蒙学生”通用，查

到一个生字，注解全是文言，注音是用“反切”加“阳平、阴中、上、去、入”五声，才能拼出准确音，弄得学生昏头转向，一无所得。上述教学内容和课程进度，各私塾大同小异。

教学方法：“蒙学生”和“大学生”混读在一个书房里，形成了复不胜数教学式。对学生读书的总要求是温故而知新，不管是读哪类书，都要熟读、背诵如流。“蒙学生”只是死读死背，囫圇吞枣也不予讲解；大学生给开讲。先生既要一字一句地教，又要给“大学生”讲课（课程也不一致），还要判仿，教珠算、考学字等，教学工作量之重，是不言而喻的。

私塾没有一定的塾规，随先生的好恶而定。总之，不外乎遵循着一个“道”字，提倡的是：仁、义、礼、智、信，“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除以“道”的这个封建理教，从精神上来束缚学生外，体罚也很厉害。连入厕大小便也有一定的约束，“出恭”（就是入厕）时持有木制的“出恭牌”，这样就限制学生不能有两个同时入厕。“戒尺”是一种日不可缺的教学用具，学生完不成作业或偶犯塾规，责以手戒三到五个，就是错写大仿字一个，也得给“手戒”三下；最厉害的体罚要算打尺板，（就是把犯有大错误的学生按倒在炕上，裸开臀部，用戒

尺重打，这种体罚无异于当时刑讯罪犯，只是比较轻些）。记得有一次，有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因结盟拜把的事，严重地犯了塾规，一律以尺板相待，其中有个已经是做父亲的“大学生”，也没有被循情而幸免，打的臀部青肿，不能坐炕。这大概是由于他们触犯了“君子而不党”的孔教，所招来的横祸吧！这种体罚尚能博得绝大多数东家（家长的称呼）的好评，有这样几句顺口溜：“先生板头硬，学生有出劲，先生不动板，学生死木懒”（死木懒，方言是没出息的意思）。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板头硬的先生，可是并未见到教出一个有出劲的学生。先生不仅使学生畏而敬之，而且也受到社会上一般人的“尊敬”，放到“天、地、君、亲、师”名列第五的“尊位”（这种尊敬我在后面要说到）。

提起当时河套的文化水平真是落后的可怜，尤其是偏僻农村更甚，往往写幅春联（这是家家过春节必不可少的东西），或写封书信，需走很远甚或几十里以外访求个“夫子”代书，当时有这样一一个流传：“有些偏僻村落户家，因没人会写春联，用碗陀螺（方言，饭碗的底圈）蘸上墨汁，印些圆圈以代文字。可见当时河套的文化竟落后到何种境地。

私塾师生一味与时间苦斗，先生既严以律

生，学生更不能半点偷闲。就以天寒日短的冬季来说，鸡鸣而起，守着葫油小灯早读，直读到太阳初升，要“背生书”。就是学生将课本双手面呈先生，然后抱拳深揖，背身恭立，滔滔不绝地朗声背诵头一天所学的课文，先生置戒尺于身边，稍有停顿板头就落到两肩。背书每日二次，早背生书，晚背温旧。住宿生和老师的三餐都需利用三次放学的空隙时间，师生共同动手来炊煮。寒夜苦读到三星将坠始能安息。每学期除仅有几个节日放假一两天外，别无星期假日，更没有任何课外活动。古语：“十年苦读寒窗”，说来真够得上“苦寒”二字了。

节日活动有“祭孔”、“祭丁”、“祭冬”几个节日。“祭孔”是在农历的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诞辰）。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曾将公历八月二十七日定为“教师节”，是日由县府教育科邀请全县教师聚食一顿，以示庆祝。“祭丁”分春秋两季，时间大约是在春分、秋分前后的各一个“丁”日，分别举行祭奠先圣先师。

“祭冬”是每年的冬至节举行（这不知是什么含义）。这几个节日，过得很有些热闹气氛，届时由师生共备些肉食、酒、菜等类，以及祭神所用的黄表、黄香、线炮等祭品（当然是先生拿的少，学生拿的多），师生向孔子遗像前焚香跪拜

毕，共聚一堂同食共饮，歌诗诵赋，尽情欢娱，深更始散，这算得上师生之间最融洽的日子。另外，还有一个“先贤死葬日”（我忘了时间）这天倒没有什么活动，只是向孔像焚香跪拜，师生禁止歌唱娱乐以示悼念。

从当时河套私塾的教学成效来说，据我所历所闻，实在是微乎其微，没有造就出任何人才来。只要读得多，字写的棒，珠算拨的娴熟，就算得上“登峰造极”了，对其他方面的东西一无所知，就连最起码的社会常识也一窍不通，更谈不到科学知识。当时有些私塾学生。流传几句感叹语：“读了一年又一年，转眼一晃十余年，年年吃尽寒窗苦，到底立世在哪年？”说到先生确也够苦，虽享有“天地君亲师”的尊号，实乃徒有其名。因终年所得束修无几，仅可聊以卒岁，遇到荒年恶月，生活毫无保障。记得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河套闹饥荒很严重，父亲向东家们四处求助，但求到的恩赐只能是杯水车薪，聊济燃眉之急，在不得已下，唯赖大量苦菜来充肠。有次他端起一碗米少（几乎少的没米）菜多的清汤，凄怆地哼出四句咕：“撮米煮就一碗粥，先生熬进粥里头，（有两种寓意，一是清汤内照进先生的影子，二是先生的生命寄托在这碗菜粥内），眼前一片西湖景（苦菜叶满碗漂浮象

西湖水面上的莲叶)鼻风吹波愁更愁”。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套私塾师生的共同命运。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年)冬，因当时河套盗匪猖獗，农村不堪其扰，难以设馆。我随父亲迁到五原新城(隆兴长镇)，父亲仍操旧业，那时新城内已有三、四所初、高级小学校。我依稀记得有一校(在五原旧城，也叫旧城小学，是完小)，二校(在新城正街屯垦办事处南，也是完小)，三校(在新城西门内，是初小)，还有一所女子小学校。由于是时县教育局对私塾采取“取缔”方针，父亲的私塾已成为名符其实的“私”塾了。当时城内郝头圪堵还有一所，城外郝头圪堵也有一所，都是同样的命运。这个时期上学的子女日渐增多，但仍有不少的家长宁愿送儿辈读“私”学，不愿让读“公”学，他们的封建守旧思想有以下几种：一是认为私塾先生抓得紧，夜以继日地教读，学校管理学生不及私塾严，识字慢。二是对“洋学堂”的认识不足，更为甚者的是把自然科学拒之于脑外。当时社会上有这样几句批评洋学生的顺口溜：“响雷是电气，下雨是蒸汽，神佛是泥器，老人(指父母)是造人的机器”。这种封建迷信所宣传的“敬天地”、“孝父母”、“万事由天定”的唯心主义观点，当然是和潮流水火不相容的。三是一般家

长，尤其是有财产的“土老财”，只希望子孙能做个知书达理、创业守基的“孝子贤孙”就如愿以偿了，别无他求。

到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私塾在国民党教育部门的严格取缔下和人民觉悟程度的不断提高，才彻底的不存在了。我于一九三六年十六岁的下半年，才开始在五原二校读初小三年级，初入学对自然科学仍有莫大的怀疑，听到老师讲“日月蚀的形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等课，总是不相信，不独是我，其他一些“私”改“公”的学生也都如此。封建教育对学生影响之深，于此可见一般。

仅就上述个人所历见闻的片断，回忆写成这个不足以称资料的东西，必会引起读过私塾的老学究们的哂笑，但我所希望的是能够有助于青少年一代的同学们，略知旧社会求学的苦寒和功半事倍的教学方式，或许对他们的努力求学，刻苦钻研，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力量这方面会稍有裨益。

普爱中学始末

宋培让

普爱中学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一九四六年九月），成立于陕坝（今杭锦后旗旗府所在地）的。她是天主教会私立的一所完全中学。她不仅为我盟培养了一批人才，而且在我盟教育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原在河套的国立绥中已迁往呼市，陕坝仅有奋斗中学、省立师范；三道桥有个农业中学，大顺城有私立唯实中学。

一九四六年九月，王守礼（比利时人）出任天主教宁夏教区主教以后，就在陕坝着手筹建普爱中学。当时在绥东天主教办的中学有：呼市的恒清中学，包头的培英中学，集宁的平澜中学。教会建立这些学校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扩大其社会影响。但是，从客观上看，对发展绥远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无疑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普爱中学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建立，并招收第一班学生五十名。开学时，因校舍未建，只得借

用陕坝天主堂私立普爱小学南院房舍暂作教室。创建时王守礼主教任命孙仲贤（神甫）为普爱中学校长。孙是罗马传信大学的毕业生。学校起初的教师一半由神甫担任，记得有：傅亭维、武慕庵、陈宽民（以上均为神甫），另外有张国良、纪有兴、宋海潮等人。在课程的设置上有：语文、数学、英语、理化、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卫生学，还有《童子军》课，由傅作义的部将宋海潮兼任教师。她与普通中学所不同的是，这所学校还设有宗教课，各班每周一次，由天主教神甫陈宽民讲授。

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这两年学校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在此期间也曾向设立在磴口县的三盛公明正中学（即修道院）输送过几个学生，准备培养神甫。

一九四八年在陕坝天主堂普爱小学的北面建立了新校舍。其房舍有：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还有平坦的运动场。教室东面有宽广、幽静的校园，每到风和日丽之时，杨柳吐绿，芳草含新，百花飘香，鸟语蜂忙，景色秀丽，心旷神怡，真是一个学习的良好场所。是年秋开学，就迁入新校舍上课。

在新校舍建成以后，学校逐年又新建了图书室、化验室，而文体方面的乐器、运动器械也应

有尽有。这时学校的设备基本上就完善了。

普爱中学从建校到停办的五年中，各年招收的班级和人数如下：

一九四六年招收一个班，一九四七年招收一个班，一九四八年招收两个班，一九四九年招收两个班，一九五〇年招收三个班，前后共招九个班，学生人数最多达四百至四百五十人，女学生占四分之一，信教学生占三分之一。

学校教师，除由资历高的神甫如：庞世宏、李成志、孙仲贤（校长）、德隆教（荷兰籍）、池瑞章、侯允希、王甫田、武慕庵、陈宽民、常非、杨华、邓作光、傅亭维等担任外，尚有从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招聘来的徐有明、赵凤鸣、杨成名、李继祖等教师。在当地聘请的教师有：张国良、徐宝善、孙玉、邢怀义、李贵珍、冯国祯、赵国兴等。师资质量是比较高的，教学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校董事会。董事长由王守礼主教担任，其他董事由校长和社会士绅来担任，如陕坝商务会会长王乐天等人。重大问题都由董事会来决定。学校设校长一人，下设教导处、训育处、总务处。各处分别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学校校长一直由孙仲贤担任。教导主任先后由武慕庵、庞世宏担任。训育主任先后由

王甫田和侯允希担任。总务主任由傅××担任。

一九四八年秋，学校谱写了校歌，校歌的词曲作者分别为庞世宏、杨华。歌词如下：

阴山苍苍，河水茫茫，昔日胡马嘶风，铁衣寒光；今日宇榭亭阁，明窗几净柳荫堂。诵声朗，轻歌扬，教育着活泼的少年郎，慧光如帚，扫除了西北的多少文盲。慈祥温良，慰暖了青年的心房。它如海滨的灯塔，驱走了暗魑魔障。它有基督的精神，情爱的心肠，抵击了人间的残暴，消除了世界的凄凉，建设起温情的吾灵地堂。它正在为国家培植英才栋梁。这便是我们的普爱——塞上曙光。我们要永远爱它，永远爱它。我们的品性该如惠兰那么清芳，我们的学识许似黄河那么深长。喜桃林清书，莫慕紫薇郎，若涛涛春江，日日应自强，让母校爱的光芒普照无疆。

学校在一九四八年侯允希担任训育主任时，由陕坝镇和平街小学聘来一位姓梁的老师。其人擅长书法、乐器和戏剧表演，在教导处任教务员。他组织同学们排练晋剧，记得曾演过《三岔口》、《走雪山》、《打官门》等晋剧。石平云、石靖国等同学当时是名角。每逢节日还搭台演出，博得校内外的的好评。在解放初的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间，也曾排演过《刘胡兰》、

《害人的一贯道》等大型歌剧及《兄妹开荒》、《红布条》等小型秧歌剧，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和反霸减租运动。

在体育方面，学校除器械体操享有盛誉外，在蓝、排、足球运动上，也很有名气，像任永昌、杨家瑞、李振英、李慧卿、尚建学等同学都是陕坝镇名震一时的球队队员。据说任永昌、杨家瑞等都是解放军代表队的队员，也曾担任过国家队篮球裁判和教练。

普爱中学在建校期间，曾发生过许多大事，值得记叙者有三：

一、罢课学潮：

普爱中学的全校罢课学潮事件，是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发生的。这次学潮的导火线是因反对校方无理开除高一班刘启云同学而引起的。后来又喊出：“王甫田（训育主任）滚出普中去！”的口号，结果以学生胜利，校方失败而告终。全校罢课长达一星期，学校形成乱糟糟的局面。迫使校方收回开除刘启云的成命，把训育主任王甫田（神甫）真的赶出普中去了。

这场风波的经过是这样的：在一九四九年九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同学们进行自由自习时，在高一班教室里，刘启云和另一个男同学无意中说了一句脏话，其中有“圪泡”两字，正在此时，

训育主任王甫田走进教室，听见了那句话。马上他走到刘启云跟前训斥起来，说：“你这个学生在寝室里也捣乱，在教室里也捣乱！”刘启云本来是一名守纪律的学生，就据理与王辩解。王甫田就怒了，说：“你还敢强，我开除你！”第二天果然贴出了开除刘启云的布告，但被高一班同学撕掉了。第二天上午高一班全班同学联名并派代表向校方请愿，要求收回开除刘启云成命，否则要罢课。学校方面不允，仍维持开除的决定。结果在星期一的下午又贴出了开除的布告，当时布告又被高一班同学给扯了，并立即全校罢课，以示反抗。罢课进行到第五天头上，校方一因当时的陕坝《奋斗日报》上报导了这则闹学潮的新闻，社会影响很坏；二因在陕坝的各中学也纷纷声援，怕事态继续扩大；三因，时值绥远省和平起义的前夕，民主的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思想正在高涨，怕引起社会公愤。因此学校才派出教导主任庞世宏和赵国兴老师（当时陕坝中级法院的律师、普中高中班兼课教师）与学生代表谈判。学生代表坚持校方改变无理开除刘启云的错误决定，同时对学校其他一些错误规定也进行了抨击，并提出王甫田滚出普中去的的要求。校方迫于形势，只好接受这些条件。学生代表则答应在下星期一复课，这场学潮风波才算平静下来。

二、抗美援朝参军：

一九五〇年冬，美帝国主义挑起朝鲜战争，并且用飞机轰炸我东北人民和城镇，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报名参军，那时河套地委、团委的同志们在学校中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全校四百多同学，除了少数年幼者外，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都报了名，最后团委只批准了任永昌和刘耀岭两位同学参了军。通过这次抗美援朝参军报名的运动，全校同学都普遍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思想觉悟普遍有所提高。

三、报考工作队：

一九五〇年以后，河套地委为了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开展反霸减租和土地改革运动，是年冬各种训练班在陕坝招收了学员，普中学生报考财干校、军干校的很多，以后在财贸战线上工作的学生很多。所以普中为新中国也输送了不少干部。

普爱中学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由人民政府接管并与私立奋斗中学合并，后逐渐演变成奋斗中学。此时普爱中学亦告终结。

笔者系普爱中学第一班学生，记述很不全面，又因事隔多年，情节之误差，在所难免，希知情者给予补遗纠正，以便资料更加完善。

一九四二年河套 地区发生的鼠疫

王龙胜

一九四二年初，河套地区人间鼠疫流行，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笔者在工作中有幸接触到有关档案资料，现予以披露，以飨读者。

一

绥西这次鼠疫，发展迅速，惨烈异常。其最早的疫源来自河西沙圪堵，现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安北县警察局的报告：一月十五晚（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居民边九金家病故四人，本村某姓家病故七人，均吐血不足半小时死亡。续自卫军中一个叫段四的排长，在旧历腊月初八由河西来到平成乡吴锡张大圪旦，同行的有李板头、任二小及另外两人。腊月初十，段四、李板头突然病死，任二小也在梅林湾病死。同行的另外两个人掩埋了尸体急忙离开不明去向。在段四生病期间，请了神官曹有子治疗，正在焚香念咒之际段

四即吐血而死。曹神官匆匆返回高曹圪旦即死亡。参加掩埋段四尸体的西公旗骑兵二团三连乔班长，也于三日后病死。疫情由此而扩散，人心更加惶恐。如沙圪堵病死十余人，全村居民逃散净尽。大树湾王麻子病死，其妻及儿子逃到女婿家，不几日后觉得身体不适，急返自家中即死，其亲属想拉尸掩埋，不料也当场身死。当日其女儿女婿相继病死。在疫区，凡到死者家中看望哭泣掩埋者，大都被传染病故，因此出现了病死的人无人敢埋葬。如梅林湾在二十一日续死四人，尸体放置，无人烧埋，公德成郭二旦家除小儿子外全部病死。由于害怕传染，无人敢收留这个小孩，时值严冬，结果活活冻死。由于宣传不够，军队民众畏疫如虎，暂四军野战补充团团团长沈砚书的电文就反映了这点：“鼠疫蔓延甚于洪水猛兽，如不迅速扑灭，贻害人类至深且巨。今鼠疫既已波及职团防地，日夜危虑，惶恐已极……藉以早日肃清而安人心，临电神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在烧埋队未到之前，对死尸派兵看守，等防疫队到达后，再行掩埋掘出焚烧之，职团医务所又无消毒器具与材料，故绝对不敢动手，而民众更不敢担此项工作。”就是烧埋队员也乘机潜逃。如二月二十八日，烧埋二队队员刘恩亮、赵二顺、马桂生、李拾金、翟四小五人在永和乡河

银圪旦乘烧埋病亡尸体后消毒之际，乘机潜逃。

魏粉房居民较多，村子也较大，又离疫区较远，因为防疫队来回往返疫区，居民就自发组织起来，不允许进驻。

还有的转移病人，二月二十二日（旧历正月初八）郁传义报告：“有某姓男子偕其妻，乘马由山根方向到杨三圪旦，到其地其妻即病故，当地保长不准在当地葬埋，勒令其夫驮回原处。其夫走出二里许，即弃尸而逃。”诸如此种逃疫避疫者不在少数。人们出于求生的目的逃疫避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意中导致了疫情的蔓延。反过来说，与其坐以待毙，莫如死里求生，这也是对当局单纯封锁的反抗。封锁越严，逃避者越多，所谓物极必反，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更有甚者，想借此发财。临河县平和乡第四保，因磴口第五乡二保赵家湾发现人间鼠疫，即组成防疫队封锁疫区，居民贺马锁几次想越过封锁线，去疫区都被阻止，当夜就偷入疫区，次日清晨，身背衣服被褥等物返回，防疫队阻止无效，即开枪将贺当场击毙。二月二十日（旧历正月初六），有个叫魏厚三的在夜间潜入苏太庙疫区，盗取疫死者物品，当即被防疫队扣押隔离，后来乘看守疏忽之际逃出，当即被防疫队以扩大传染，破坏疫政处决。违反当局禁令处以极刑，似乎也顺理成章，

但凡染疾者一律烧埋和随便枪杀无辜，实为草菅人命。临河县的刘庭秀就是这一类事件的典型例子，刘庭秀本太成乡小学校长，三月二日（旧历正月十六日）离家去县城领工资，经县城东关外封锁线时，被驻军新三十二师工兵连排长万夫雄和二名士兵，不问皂白即开枪射击。刘当场被打死。事后其父虽多次上诉，甚至闹到傅作义面前，但也不了了之，仅给肇事的排长万夫雄以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二

疫情发展后，引起了当时绥远省政府的极大重视。元月初由省政府召集党、政、军、机关、团体、学校等三十三个单位，组设省防疫委员会，委苗玉田为主任，二月一日开始办公。各县设分会，临河县防疫会主任袁庆荣，副主任王映荣，五原县防疫会主任孙兰峰，副主任田竹生，各会分设总务、医务、封锁、调查、宣传组等。

二月二日，傅作义一面飞电何应钦，报告疫情，求援药品，一面下令，对省会所在地陕坝实行全面封锁。方法是设立内外两道封锁线，内封锁线有十个检查站。分别为：南大桥、东南城角、冯三院后大路、毛织厂大路、东北大桥、魏粉房大路，西沙壕北口大路，十二电台门口大路、通郭

牛牛圪旦大路、通高油房大路；外封锁线设七个检查站，张维世圪旦、园子渠口由三十五军通信营郭奠原部负责封锁，高油房、白奇圪旦、奋斗日报社西南桥，由副长官部特务营刘福星部负责封锁，白柜由炮兵二十五团负责封锁，干召庙由十七师驻军封锁。各检查站设站长，规定任何人通过检查站时必须问明来历，疫区来者，一律令留住，听候处理检查，无事七日后放行。非疫区来者（除传令邮政外），仍令返回原地。陕坝市外出车辆，必须执有防疫委员会发放的执照才能放行，所有公文尽量用电话传达。禁止在市区集结人伙，诸如说鼓词、放风筝、街头小孩玩钱等，一律禁止。

二月五日，规定黄河右岸惠德成（在内）以东，归五原防疫会负责，惠德成以西归临河防疫会负责。

二月十三、十四日，鉴于疫情的严重，傅作义接连发布三道命令，对全省实行全面封锁。主要道路由部队封锁，动员民众凡村就封锁、凡路即阻绝。对防疫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

一、划分防疫区

以丰济渠为界线，划分二大区，丰济区以东地区，责成暂三军军长孙兰峰全权负责指挥，可随时指派部队封锁新疫区，并将实情迅报省政府、战

区副长官部。其中沙圪堵以东地区由游击军司令李作栋负责。孙派一组防疫队去归李指挥，督导由八战区副长官部高参李英夫担任。

丰济渠以西地区由八战区副长官部直接指挥。其中临河第一区，由新三十一师师长袁庆荣负责，第二区由骑兵七师军械处长薛天祐负责督导，第三区由暂四军军长董其武负责督导，第四区由暂十七师师长王雷震督导，苏太庙疫区由暂十七师二团团长许书庭带兵一营封锁，由副长官部派员督导。

丰济渠以东河岸由孙兰峰指挥封锁。

丰济渠以西河岸由袁庆荣指挥封锁。

并规定在防疫期间，各村居民、各地驻军不准自行活动，有特殊情况，必须执通行证，自行封锁驻地，盘问行人，隔离远来者。

二、组织防疫队

防疫队由各地区指挥官，指派军官一人，医务人员二人，动员委员会人员二人，烧埋队十人组成。

三、组织督导人员

各县长、区长必须亲到疫区督导工作；地区高级指挥官，指定高级军官亲驻疫区督导；督导不严者，一经查出军法从事。对封锁疫村的指挥官，如发现封锁不严，疫情扩散，唯其是问。

四、对疫村的处理

派军队严密封锁，绝对不准居民外出，详查户口，早午晚由保甲长召集村民在相隔五米处点名三次，外出者必须问清去处，通知对方严加隔离。详查户口时应搞清邻村是否是疫村，对已烧埋的坟墓时时检查，防止因掘埋太浅被狗拉出的情况。对新疫死者多加柴或煤油焚烧之，埋入深一丈的坑中并标志之。死者住房及室内什物一概焚烧，疫村鸡狗一律击毙烧埋。

疫村未染疫的居民，不得与病人及其房屋接近，各自隔离封锁，不准出村。被封锁的村庄粮食，由防疫队运到适当地点，让居民自己取用。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三

河套这次人间鼠疫，从最早见于记载的元月十五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算起，到疫情基本上得以控制的三月十九日（旧历二月初三），短短两月之间，疫区由河西迅速发展是整个绥西，“几成燎原之势”，重点疫区在临河县境有：梅令湾、苏太庙、张家庙、张会长、卫家圪旦、贺银圪旦、干召庙、温家圪旦、边家圪旦。五原县境有：中元乡疫区、义臣圪堵疫区、和合源、后圪

卜疫区等。安北县境有：东槐木、黑泥池、乌鲁素淖疫区等。河西地区有沙圪堵、十三河头、南惠德成疫区等，还有当时属宁夏省磴口县的赵家湾、补隆淖等二十处。见于记载的死亡人数达五百八十六人。其中东胜县死八十一人，临河县死三百一十八人，五原县死七十人，安北县死三人，包头县死八十四人，磴口县死三十人。因省政府命令将“疫死者尸体及其什物病房一律焚毁”，“鸡犬概行打死焚埋”，仅苏太庙疫区打死鸡三百四十八只，猪一百四十一口，狗一百六十五条。温家圪旦疫区折房二十三间，打死鸡一百九十六只，狗四十七只，猫二十四只，其余财产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疫死者饮恨九泉，幸存者也分外悲惨。东胜县第一区仁盛乡，刘外信全家六口全部病死，高招财全家十三口，仅存十三岁的小儿子，仁丰乡的李毛人全家七口，只剩下十岁的次子李五小和二岁的三子李六小；二区的信义乡李大太全家死亡，在他家帮工的唐有青及住户苗西柱三口也都病死，其弟李二太全家七口全部疫死，住房什物全被焚烧。五原县正心乡后圪卜疫区，“凡遭疫菌传染之户多已全家覆没，所遗者仅有现年十岁之樊珠子四子四毛眼一人。”“正风乡和合源疫区，因该村此次遭疫残害之民众，咸系贫无立锥之

地、饔飧不得鼓腹之人，所以遗族甚为可怜。”劫后余生者，非小孩即鳏寡老人，富裕者财产被焚一空，穷困者处境就更为可怜，疫情渐刹时值春耕，这些人不仅衣食无着，且无劳动能力和生产资料。为此，当局拟定抚恤三原则：（1）疫死之人所遗老弱妇孺无生活能力者，政府设法救济之。（2）遗有财产，而直系亲属无独立生活能力者，依法指定保护人。（3）全家死绝，又无合法继承人，其所遗产，由公家代管，酌情处理。当局采取一定的抚救措施，固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如此规模的疫情，“抚恤子遗，安辑逃亡”，恐怕只能是杯水车薪。幸存者“……孤身漂泊或偕老携幼颠沛流离、劫后凄凉、疮痍满目，横遭敌毒、情属可怜。”由此可见抚救的效果了。

四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是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烈性传染病，对患者治疗必须保持高度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鼠疫患者治疗非同一般传染病患者，从治疗病人到处理疫区是一整套连续性的工作。因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准备，否则必将出现极度的混乱和顾此失彼的现象，助长疫情的猖獗。

绥远省当局事先对这次人间鼠疫毫无思想上的准备，直到疫情已蔓延扩散才仓促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也仅限于单纯的“是村就封锁，凡路即阻隔，”造成了整个绥西地区路断人稀的局面，真是“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封锁部队一旦发现病人，左邻右舍完全驱逐于封锁区，派哨兵四面包围长期封锁，如此行事，致使一人染疫，全村倒霉。甚至胡乱划分疫区，太成乡张刘柱圪堵村，从二月十五日（旧历正月初一）起，被十七师二团三营七连划为疫区后，居民“自防疫封锁本村以来，柴火食水均感困难，由于所有牲畜不许出村放牧，刻下已有因饿而将倒毙之势，此等惨状，实笔不能书……而本村实无疫情。”三月十五日，绥远省政府发布通令，以“防疫不力，致鼠疫蔓延，未能早日扑灭”为由，给予临河县县长王映荣以记大过处分。三月十六日，省府不得不下令，将少数仍有疫情顾虑的村庄，改为小点封锁，其余在十天以上没有继续发现疫情的疫区及非疫区一律提前开放。对于疫情蔓延及波及区域，责成动委会划分地区，发动工作人员担任调查，每天必须督促保甲长将每个村庄检查一次，并将结果逐日报告防疫委员会。

其次，防疫队药品单一，仅以注射鼠疫苗为预防，器具缺乏，每队拥有一具喷雾器，用以喷

洒石灰，作为消毒手段，医官医术低劣，自身难保，傅部九十四团医官高延明就是在派出调查疫情中传染致死的。烧埋队“全体队员均为各部队官兵犯法送入劳动营者，此次绥西疫病利用充任，”这些人毫无卫生常识又心存畏惧，工作是可想而知的。对患者也没有什么治疗护理措施，而是采取单纯的烧埋，致使患者不死于疫也死于烧埋，几无生存机会。

其三，河西河套地区辽阔，人烟稀少，居民星散，村庄均为三五户的小自然村，大者也不过二、三十户。乡镇编组保甲也极为困难，政令传达尤为不易。疫情发生时值隆冬，黄河冰冻易过，居民由于条件限制，不讲卫生，加上宣传不力，惧疫潜逃、匿报者，不在少数，致使疫情蔓延。如温家圪旦的疫源就来自一外来乞丐。温家圪旦时属临河永康乡五保，旧历正月初四，乞丐来到聚赌的冯狗换家，初五，乞丐死亡。随着聚赌的李发、白润才等人发病而死，疫得以蔓延，短短一月间，疫区死亡四十五人。旧历二月初十，烧埋五队才在队长王鸿滨的带领下到达，只不过进行了些补救工作，如将死者房屋推倒焚烧，坟上加土五至七尺，给生者注射药品和消毒而已。当局对于逃疫现象十分惊慌，严令驻军封锁，明令疫区居民外出者立刻射杀，但总感防不胜防。加上

气候干燥，一冬无雪，更使疫情猖獗。

卫生条件差，是造成重大灾情的又一原因。在绥西二个半县约十二万人口中，仅有蒙古卫生院、乌盟卫生所及第六防疫大队第一中队人不满十。不但人数少，而且毫无药品预防治疗，均束手无策。绥西鼠疫发生后，国民政府大员，包括蒋介石在内迭电询问疫情，以示关怀，但均属纸上谈兵，傅作义虽连电求援，也于事无补。直到四月十一日，疫情已根本控制时，仓促成立办理绥远、宁夏两省鼠疫防治事宜的绥宁临时防疫处，才抵达陕坝，其人员不过三十余，疫苗不过五千瓶。作为此次疫源的河西地区，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由西北防疫队的孙副处长率队前往防治。客观上讲时值抗战时期，物品维艰；主观上是旧社会对人民的生命极端不负责任，社会制度决定其很难组织有效的防治。联想到解放初，绥远省某地发生的鼠疫，人民政府全力以赴，组织动员各方面进行科学的救助，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大大减轻了损失，这是旧社会万万不能办到的。

五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在各战场对我抗日军民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残酷的扫荡，并

灭绝人性的投入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使我军民遭受极其严重的损失。年初，在正面战场上，日军分别向闽浙湘空投鼠疫杆菌；在敌后战场，日军在进攻太行山区时，使用了大量毒气。日军这种罪恶行径，为我各省各战区化验证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就此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令各地严加防范。可以说，利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作战是一九四二年日军在华作战的特点。

在绥远，一九三七年春，傅作义率部由山西河曲进驻河套五原，就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此举引起了日军极大注意，加紧了对河套的进犯。同年十二月，日军侵入河套占据五原，部队分别驻于县城及周围的新公中、梅令庙、郝镜桥、邹家地、南牛旗、蛮可素等地。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傅部进行了绥西、包头、五原三次战役，成功地将日军逐出后套地区，此举使绥西处于暂时的稳定时期，奠定了河套的偏安局面。但战争却以另一种方式悄悄进行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七日，日军两次各出动汽车二百余辆，向驻防河西展旦召、营盘召及柴磴以西、丁红湾以东地区向我骑七师进犯，到处烧杀抢掠。敌军撤退后，我军即发现敌在水井中、草滩上投了毒。傅部师长朱钜林特就此事电告傅

作义。河套的这次鼠疫就发生于“敌犯柴磴后未及旬日，”疫情就首见于河西沙圪堵、十三河南、惠德成南岸。次见于五原一区中元乡，二区正风乡。后从五原沿黄河波及临河四区一带，并逐渐扩展到绥远省临时省会陕坝市的外围。二月二十六日，绥远省政府致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寝电称：……且每个疫区之发现，究根均由河西辗转移染。敌寇怙恶无道，现散疫菌于常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湖南常德发生鼠疫，经多方研究调查，证实由敌机散播鼠疫杆菌引起），复施狠毒于绥西。据去年八月之报告，敌在包萨等县大肆搜捕鼠类，限民间每户捕缴家鼠一只或野鼠三只，最近数日复接同样之报告，敌之处心积虑，殊堪愤慨。”对此“瞻念前途，隐忧正深。”三月一日，傅作义给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卫立煌、朱绍良的去电中称：“顷接反正部队报称，包敌于两月前曾密派细菌队四十余人，化装到我方洒放各种最毒病菌。此次后套及伊盟发现之鼠疫，即为敌人所播。”日军经包头、绥西、五原三次战役，损失是很沉重的，只是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才无力对傅部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但其报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也不能排除其利用其它手段来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根据疫情发生的时间（一九四二年初），地点疫源

(不久前和敌人激战的河西地区)，走向(由前方走向后方)规模(几乎遍及地处抗战前线的绥西)。如果傅作义得到的情报可靠的话，那么“此次绥西鼠疫，确系敌施放细菌攻势，毒我战线。”是日本法西斯分子在全国各战场进行的化学战和生物战的组成部分。所谓无独有偶，绝非巧合。幸“赖我军政全体全力以赴，始于最短期间扑灭疫患，粉碎敌寇施放毒菌阴谋。”

总而言之，河套这次人间鼠疫，教训是深刻的，损失是严重的，可谓天灾人祸俱全。由于笔者条件限制，掌握材料不可谓全，观点也不免有局限性，在政通人和的今天有必要搞清这一历史，尚望知情者，予以修订补充。

附：(1)绥西鼠疫蔓延简图

(2)绥西各部队检查疫情地区要图

担任封锁部队番号：

补R/35A：35军补训团

补R/C4A：暂4军补训团

KR/35A：35军骑兵团

C4A：暂4军

炮25R：炮兵25团

N32D：新32师

N31D：新31师

101D：101师

C11D: 暂11师
N3KD: 新骑3师
独203R: 独203旅
7KD: 骑七师

阎锡山在河套军垦

苏希贤

河套军垦，兴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时，衰于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终于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其存在时间近二十年。

在民国二十（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我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又向华北、内蒙进行扩张侵略，形势非常严重。

在豺狼入室，国难当头，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晋绥公署主任阎锡山，一方面对于日寇的侵略野心感到无比愤慨，另一方面又看到全国人民的高昂激情，于是遂倡导“屯垦西北，造产救国”，的口号，目的是为抗日储备力量，并试图给解决国内土地矛盾找出新方法。

为此，他决定在河套地区，用“办屯垦，建新村”的办法，实地试行其“建设新农村组织”的方案，以期改革农村土地的私有制为“土地村有制”，并在经济上实行平均发展的“均田制”，

使之达到“耕者有其田”的要求。

经与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陆军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七十二师师长李舒民等人多次研究讨论后，共同商定成立“绥远省垦务委员会”，并着手编订在绥远省河套地区举办屯垦的计划纲要，其长远打算在于创办屯垦，寓兵于农，积蓄力量，防患未然，以应付未来的事变。

屯垦建立之初，生气勃勃，对河套的农业生产，经济贸易，水利交通，文教卫生各方面，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芦沟桥事变之后，屯垦人员变了质，他们变成了河套地区的发国难财，喝人民血的一个武装封建大集团。这种状况，迄至绥远的和平解放后，才宣告结束。

一、屯垦队的组建与分布

(一) 三个师垦队首批开进河套

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春天，由绥远省政府各机关，单位抽调有关人员，在包头组成“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由石华岩任处长。办事处下设有机要、组织、垦殖、经济、水利等五个组，在处长的领导下，进行屯垦事宜的准备工作。

尔后不久，就由陆军七十师（师长王靖国）七十二师（师长李舒民）七十三师（师长傅作

义)，各拨出一个连的兵力，先行组织起师垦队。每队由一百零九人组成。其中：队长一人，分队长四人，小队长八人，垦兵九十六人。各队队长，在就任队长之前，都被派往农村熟习农业生产情况一个月。

同年五月十二日，三个师垦队，在各自的队长率领下，带原薪饷及应携带的枪械服装，开到临河县的冯家圪旦、同元成和祥泰魁（现新华地区）三处。原设在包头的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也从包头移到临河县的祥泰魁办公。

祥泰魁本为在河套的山东移民地，创办于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由王鸿一经手办理。这个移民地，原计划的铺排很大，由政府给予土地和一大笔资金，准备建立“鲁仁村”等八个新村。其后，因管理不善，欠债很多，不能再继续办下去了，遂由公家将一部分土地收回，另放与师垦队耕种。

当时划拨给师垦队的土地为五百余顷。土地以刚目渠为界，渠西归师垦队耕种，渠东仍归山东移民所有。师垦队到达祥泰魁后，首先修筑城堡，建立了新村。全体官兵为了纪念阎锡山举办屯垦的“德政”，在新村建起后，遂以阎锡山的别号“百川”为名，改祥泰魁为“百川堡”，以示对阎锡山的尊敬。

（二）三个军官垦殖队相继来套

在三个师垦队进驻百川堡垦区之后，同年，又从太原组织起军官垦殖队相继来套。军官垦殖队的成员是由太原军官教导团招集适合参加屯垦年龄的军官组成的。这些人都是随军多年，因编余，请假离职，作战被俘等原因，失去职业的军官。他们都是傅作义、王靖国、李生达的部下。

军官垦殖队先后来河套报到的为三百多人，共编成三个大队，三十个组，每组十二人。给他们划拨垦地两处：一处是在临河县的祥泰裕（现狼山地区，后更名为永安堡），是一大队和二大队的垦地；一处是在五原县东边的董国隆圪旦，后来建立新村，叫威远乡（今和胜公社），是第三大队的垦地。

被批准入垦的军官，每人由公家授地百亩，他们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各自经营管理自己的土地。所需的农事费用，头三年由政府贷给，第一年贷给百元，第二年贷给六十元，第三年贷给四十元。从第五年开始，分期偿还贷款。至于应纳给国家的粮赋捐税，则规定从垦殖受益之年始，豁免二年，到第三年则与普通民户一样负担，不再享受优待。

（三）屯垦督办公署和五临屯垦办事处的建

立

在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移驻百川堡后，为了加强屯垦工作的领导，有必要成立高一级的屯垦管理机构，以促进屯垦事业的顺利进展。为此，于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由晋绥绥靖公署，绥远省政府、绥远省垦务局三方联合派出人员，在包头成立了“绥区屯垦督办公署”。督办由阎锡山兼任，傅作义、王靖国、张桐轩任会办，石华岩任坐办。其中主要负责者，是阎锡山的亲信人物王靖国，石华岩则是他的得力助手。

督办公署下设两处一室。两处是总务处，垦务处；一室是办公室。总务处内设庶务、经理两科；垦务处内设工程、农作两科。至于办公室则设文书，技术两科。各处、室、科，都有专人司职。

督办公署的主要任务是：（1）关于垦区内，荒地、二荒地的规划开辟；（2）关于水渠、道路的兴修开挖；（3）关于新村和园林的建设；（4）关于农具，肥料、农事、副产的计划 and 筹备；（5）绥西地形的测量。

屯垦督办公署成立后，又于同年九月五日，在五原县设立“屯垦驻五办事处”，置正副处长各一人。首任处长周剑吾，继任处长郭维蕃，副

处长吴象山。办事处内设工程、农作、水利、测量、经理、庶务、文书、军事、交际等九个股，另外，还设立了一个测量队。办事处地址设在今五原银行附近。同年，接着又在临河县也设立了“屯垦驻临办事处”，组织机构与五原一样。办事处的职员，都是由五原办事处派去的。

在五原屯垦办事处的职员中，很多都是国内外的大学毕业生，有的还是佼佼有名的人物。如技正张立范（化名），留学法国，专攻农业，有卓识，有才干。解放后，曾任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农业厅长。吴象山系山西大同人，毕业于北洋大学；李纪系山西徐沟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李子文系山西临汾人，毕业于北平大学。这些人，学识丰富，多才多艺，都为河套的屯垦事业作出过贡献。

（四）四个团的屯垦连队陆续进驻垦区

就在屯垦督办公署成立的同时，又有四个团的屯垦连队驻进了垦区。他们是由王靖国所属的二〇五旅（旅长徐子珍）的四〇九团、四一〇团、四〇七团和七十三师所属的四一九团中抽调出来的兵力，组成二十七个屯垦连队（基本上是原建制），于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陆续来到了河套。

当时，屯垦督办公署划分河套为四个垦区，

并选定十九个村落为屯垦连队的驻扎点。第一、二垦区为五原，安北两县，驻十三个屯垦连队；第三垦区为临河县，驻十一个屯垦连队；第四垦区在包头南，达拉特旗境内的东大社和同兴东（后改名为新民堡）一带，驻三个屯垦连队。

屯垦连队在进入屯垦点后，都建立了屯垦乡，并以营，连长的名号冠在乡公所的前面。

驻在五原垦区的为四〇九团，团部驻在五原县新城桥东，团长是侯振清。该团第一营驻在五原县西四十里外的新公中，营长邓负暄，因此，名新公中为负暄乡。第二营驻在五原县正北三十里处的刘蛇圪堵，营长樊折桂，因此，名刘蛇圪堵为折桂乡。第三营驻在五原县正南三十里的南牛犊，营长刘觉民，因此，名南牛犊为觉民乡。还有以连长名字命名的屯垦乡有：在同兴堂屯垦的称为占无乡，在白头圪堵屯垦的称为道五乡，在三柜圪旦屯垦的称为子厚乡，在仁宝圪旦屯垦的称为敬生乡，在红柳圪旦屯垦的称为乐善乡。

驻在临河垦区的为四一〇团，团长石焕然。该团第一营跨县驻在五原县西七十里的葫乐素图。营长刘良忱，因此，名葫乐素图为良忱乡。第二营驻在八岱滩，营长白贵元，因此，名八岱滩为贵元乡。第三营驻在陕坝园子渠口，营长孔宪智，因此，名园子渠口为宪智乡。以连长名字

命名的屯垦乡有：在苏台庙屯垦的称为寿轩乡，在那直亥屯垦的称为贵生乡，在公产地屯垦的称为通三乡，在崇发公屯垦的称为可言乡。

此外，还有威远乡，是五原县董国隆圪旦的军官三队。有靖远，勤远两个乡，分布在五原，临河两县境内，是军官队一、二两队的屯垦区。

当时在套内共有十九个屯垦乡。这些乡公所与绥远省行政系统在基层设立的乡公所，同存并立，形成了双重衙门，多头政治，互相扯皮，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严重地损害了地方乡公所的行政职能。

临河县祥泰裕自驻进屯垦队以后，建立了新村，筑起了城堡。屯垦军官为纪念王靖国创办屯垦的“功劳”，拟照“百川堡”的前例，改祥泰裕为“治安堡”（治安是王靖国的别号）。但王靖国奸滑，表示不敢与阎锡山分庭抗礼，遂改祥泰裕为永安堡。

驻在包头南达拉特旗东大社和同兴东一带的为四〇七团，团长梁九洲。该团一面以驻防卫戍为责，一面又派第二营营长李汉章，率领全营官兵，在防区内选地进行屯垦。

至于四一九团的连队，分驻在板旦、呼沙尔庙和大树圪卜等地，具体情况不详。

随着河套地区屯垦事业的发展，一些相应的

组织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了。这对于促进屯垦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很大的作用。计有：

（一）农事试验场和农业训练所的成立

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五原屯垦办事处成立不久，就着手在五原建成了农事试验场。该场位于五原县新城东门外，占用原国民军旧营盘的地址。前任场长南灵虚，他工作一年后，调往他处。继任场长是张立范。

农事试验场职员中有技士五人、工人十余人。他们从山西运来大批树种苗木，其中有：洋槐、中槐、松、柏、杏、臭椿等树木，在试验场内进行栽培。接着，又引进了各种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先在场内试种后，再向全垦区推广。计有：德国的狼豆，苏联的大玉豌豆和莜麦，日本的黑砂糖豆玉米，山西的无芒小麦和高粮，河北的牛尾谷子，高粮和大豆。还从国外引进了英国种马，荷兰乳牛，巴克夏猪，美利奴羊，西班牙的米格红小鸡，和法国的家兔等，进行繁殖改良。此外，还送来一批山西制造的双柄步犁，中耕机，园盘耙、单马锄、钉齿耙、人力水车、畜力水车等新式农具，进行示范推广。

在农事试验场的影响下，不仅提高了垦区内的农牧林业生产，同时，也使河套的农民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对当地农民种地务农的知

识都有启发，也给改进农业生产，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为了加强对各垦区农牧林业的指导，五原屯垦办事处，于一九三三年，又在农事试验场内附设了一所农事训练所。所长由张立范兼任。训练所的学员都是由垦区连队选派来的士兵，凡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入所学习。学期二年。每期招收学员五十人。学制为半耕半读。训练所的课程有国语、数学、作物概论、土壤、肥料、化学、水利、植物、园艺、林业等。学员毕业后，其程度相当于当时绥远省农科职业学校毕业学生的水平。

学员的生活是军事管理，每人每月津贴费法币六元三角，相当于连队上等兵的待遇。学员毕业后，仍回原垦区，担任垦区内农牧林业的指导工作。

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五年的时间内，共举办过两期训练班，培养出一百多名懂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人才。这些人在回到垦区后，对各种苗木的栽培，农作物良种的推广试验，家畜的繁殖改良，新农具的应用推广，农业新技术的示范应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二）成立了屯垦合作社

由于屯垦事业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夏，屯垦

会办王靖国，在五原县南门里，成立了绥西屯垦合作社，委其女婿（一说是其外甥女婿）张圣舆负责经办。屯垦合作社当时标榜的性质是：“促进生产与消费的流通，避免中间商人的剥削。”意本至善，但却有名无实。因为张圣舆主办的这个合作社，实际上是一个官营商号的官买卖，对人民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合作社有销有购。在销售方面，主要经营各种棉毛丝麻等纺织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日用百货，无所不有。社员与非社员都能购买。在收购方面，主要收购粮食、油料、药材、皮毛、烟土等土特产品。买卖兴隆，越作越大。当时五原和临河两县的商号以及小商小贩，也都来绥西屯垦合作社批发货物。

由于合作社经营范围庞大，为了不使资金周转发生问题，该社还发行了“合作社流通券”。流通券票面额一元，作为纸币，流通在河套地区的市面，它与绥远省平市官钱局发行的“塞北关”纸币的价值相等。当时，在五原、临河两县，流通券成为市面上流通的唯一货币，在市场上只见合作流通券，不见他种货币在流通。

这个合作社的成立，在当时对沟通河套城乡的物质交流，确也给农民的生产、生活上带来过一定方便。但它垄断了河套城乡的经济，形成了与

民争利的局面，农民也吃尽了它的苦头。尤其是该社买卖的物品，偷税、漏税，甚至不纳税的现象非常严重，这一方面影响了绥远省政府当局的税收，另一方面，它货物来的容易，卖的便宜，致使五、临两县商号的正常营业，也大受影响。

不过尽管这个屯垦合作社买卖兴隆，财发万金，是当时赢利最大的买卖。但是，它所得到的大宗利润，并没有真正用到屯垦事业上去，而是饱入了以张圣舆为首的一小撮屯垦官吏的私囊中。

（三）创办了实行小学

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王靖国在五原新城南门里（今机械厂附近），创办了一所完全小学，名曰实行小学，校长由王靖国兼任。同时，在包头也创办了一所同样的实行小学，由刘超一任校长。这两所小学建设的规模和教学设备方面，都为其他小学之冠。所有的教职员，多数来自太原，均属阎锡山派系的人，文化程度高，师资质量好。

在各屯垦区营部所在地的屯垦乡公所，也都设立了初级小学。这些学校的学生，虽然多数是屯垦军官兵的子弟，但当地农民的孩子也可以入学，这对发展河套教育事业，立学校，开民智各方面，不无好处。

（四）创办了安惠医院

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王靖国首先在包头创办了一所安惠医院，由北京医专毕业生康阜岭任院长。接着，在各屯垦团、营所在地的县与乡，也都建立了医院和医务所。

各医院和医务所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屯垦区的官兵及其家属。但在当时河套地区，医疗机构少，医务人员缺，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农村人民患有疾病，也可以前往就医。这对农民看病就医，保健身体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五）设立了仁发公银号

为繁荣绥西经济，并促进屯垦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壮大，屯垦督办公署于民国二十五（一九三六）年，在包头、五原两地分别创办了仁发公银号。该银号的经济实力雄厚，资金充足，在晋、绥两省的金融活动方面，也算得上首屈一指，可称为经济界上的权威。从它的实力方面来讲，并不亚于当时绥远省平市官钱局的经济实力。

仁发公银号从成立之日起，即以大量资金支持绥西屯垦合作社的商业活动，致使该社能够大量地收购农副土特产品，并持其雄厚的资金，垄断了河套地区市场上的经济，获利甚厚。该银号还对五原、临河两县的商号和垦区连队开展信贷

业务。除此以外，他们开辟了通汇业务，凡通往全国各地的汇兑事项，他们都接受办理，这不仅流通了金融，而且也方便了人民。

（六）创办了《实行月刊》

为了报道河套屯垦区内的生产活动情况和屯垦官兵的动态消息，在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阎锡山于太原创办了《实行月刊》。月刊的主要内容是，报道社会新闻，地方风情和晋绥两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新闻，以及阎锡山的讲话、训谕和指示。《实行月刊》不仅是新闻材料，也是一份指导屯垦工作的刊物。

另外，屯垦督办公署每年还刊印一册《屯垦工作汇报》，汇集了屯垦工作的具体计划和生产进度情况。

《实行月刊》和《屯垦工作汇报》，每期都发到屯垦区的各团、营、连部，使垦区内的官兵都能看到月刊和汇报。月刊和汇报都不保密，因此，外界人士也能借阅。这对当时文化落后，新闻窒息的河套农村来说，起到了吸收知识，增长见闻的效用。

二、土地的选配与开展生产情况

屯垦部队在进入屯垦区以后，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是选定与分配土地问题。河套地区原为

蒙旗地方，其土地分别归属于杭锦旗，达拉特旗和乌拉特旗等蒙旗所有。当时在河套土地的使用情况上，分为报垦地与未报垦地两种。所谓报垦地，指的是官方或私人与蒙旗商定允许垦种的土地。垦种者取得永租权，但土地所有权仍归蒙旗所有。所谓未报垦地，指的则是土地权利仍属于蒙旗的土地。垦种时，必须取得蒙旗的同意，并商定租金后，才能丈量放垦种。

当时，屯垦队土地的来源，约为以下几个方面。即（1）由绥远省垦务局丈量已报垦的土地，其长出来的部分，交与屯垦队耕种（因当时官方或地主、商人在向蒙旗报垦土地时，用拉拢、欺骗的手段，以多报少，实际垦种的土地，大大地超过报垦数字）；（2）强行迫使蒙旗放垦的大片土地；（3）利用山东移民弃置不用的土地；（4）用水利灌溉作为交换条件，换拨农民的耕地；（5）没收王英的逆产土地等等。

在授给屯垦连队土地时，所采取的办法是：凡已报垦的土地，由垦务局丈量数目，根据屯垦办事处的决定，按数拨给连队；其未报垦的土地，则由屯垦办事处与垦务局会同蒙旗丈量数目，按数拨给连队。但应纳地租必须交给蒙旗。屯垦办事处为丈量机关，垦务第五分局（驻五原）和垦务第六分局（驻临河），则为发照机

关。

每个屯垦团授与土地以一千二百顷为度，共授与各屯垦连队土地约为四千余顷，大部分是荒地和二荒地。其中有匪首王英在五原新公中、南牛犊、锦秀堂三处的土地一千二百余顷，作为逆产没收，拨给屯垦队垦种。授与屯垦队土地总的原则是：第一，不能与民争地；第二，尽量开种荒地和二荒地。根据上述原则，屯垦连队得到的土地，大部分都是荒地和二荒地。兹将授与各垦区土地的数目，略开于次：

（一）授与三个军官队垦地七百余顷

其中授与驻在临河县祥泰裕（永安堡）的军官一队和二队土地五百四十顷，土地位于永济渠的西边。东界西大渠，西界乐善堂渠。此地原为移民地，后因历年土匪蹂躏，民多迁移，土地荒废，故拨给军官队垦种。授与住在董国隆圪旦的第三军官队土地一百七十五顷，土地全为官荒地，北界义和渠，南临通济渠。

（二）授与三个师垦队土地五百顷

驻地在祥泰魁（百川堡）的陆军七十师，七十二师和七十三师的三个师垦队，被授与土地五百余顷。此地原为山东移民地，由垦务局收回拨给了三个师垦队垦种。土地位于永济渠与刚目渠之间。

(三) 授与四个团二十一个连队土地三千余顷

各团分配土地的具体数字如下：

(1) 垦区在五原、安北的四〇九团，共授与土地一千五百余顷。其中：驻在新公中（负暄乡）的第一营，分到土地五百余顷，其地界东临沙河渠梁地，西连达拉特旗旧灶河地，南界曹柜地。驻在五原县正北刘蛇圪堵（折桂乡）的第二营，被授与土地五百余顷。其地界南临乌加河，北负沙梁，地势平坦，土质有碱。驻在南牛渠，（觉民乡）的第三营，被授与没收王英的逆产土地五百余顷。其地界南靠通济渠，西界义和渠，土地肥沃。

(2) 垦区在临河县的四一〇团，共授地一千二百余顷。其中：驻在葫乐素图（良忱乡）的第一营，被授与土地五百顷。其地界东邻达拉特旗旧灶河地，西界丰济渠，南至察汗脑包，北至拉僧庙和宝圪岱庙。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驻在八岱滩（广胜乡）的第二营，被授与土地三百余顷。土地位于黄土拉亥河西岸，是未曾开垦的最高荒地。驻在苏台庙（寿轩乡），那直亥（贵生乡）、公产地（通三乡）、崇发公（可言乡）等四处的第三营，被授与土地四百余顷。

(3) 垦区在包头南，跨过黄河东大社（属达拉特旗）的四〇七团，共授与土地七百余顷，由该团第二营垦种。其地界东至乌梁素海七分子，西至乌拉沟，南至沙河梁，北至西大社。该团驻防河西，一面守戍，兼事屯垦。

(4) 垦区在五原县同兴堂和安北县乃马岱一带的四一九团，共授与土地约千顷之谱，分别授与各营垦种，具体数字不详。

(四) 开展生产情况

各屯垦队在领得土地以后，首先进行了连队的基本建设工作。如修建围堡、营房、仓库、乡公所、合作社、加工厂、农具室、牲畜棚圈以及营部与连队，连队与连队之间的道路建设，电话架设，等等。

及至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大部分连队都开始了农业生产工作。关于屯垦的费用，在人员开支方面，规定所有办事处，试验场，测量队的工作人员及屯垦官兵（除军官屯垦队）的薪饷，均由太原绥靖公署按月领发。原定三年后停饷，自力更生，但后来没有做到。至于生产费用的投资，是阎锡山从太原给拨来的生产资金，每个连队可分到三万元。此款规定在总收益项下，分三年偿还。耕畜是在本地购买的，每个连队购买耕牛二十至三十条，耕马二十多匹。太原

又给运来一大批新式农具步犁，以支垫垦区的生产。由于生产条件完全俱备，因此，各垦区都全面地开展了生产。

在农作物播种方面，各连队除种植河套地区原有的小麦、糜子、谷子、蒴麻、豆类、大麦外，还引种了农事试验场推广的优良品种。如：法国狼豆，苏联豌豆和燕麦，山西宿麦，河北谷子以及苜蓿等牧草。在一个时期内，为了偿还贷款，也曾大量种植过鸦片。

在发展畜牧业方面，各垦区连队都有集体饲养的牛、马、羊、猪群，除供农业上的役使外，还为连队解决了肉食。

在林业生产方面，各连队都建立了苗圃、林场。在连队之间的公路两旁，都栽上了行道树。屯垦连队所在地的新村，大都营造了成片林，绿化了垦区，美化了环境。

除此之外，各营部所在地都建立了合作社，与垦兵和农民进行交易。合作社除经营百货商品外，还开展了农副产品的加工业务，设立了酿酒、榨油、漏粉，制糖和粮食加工等作坊，以便利群众。如五原县新公中四〇九团第一营的合作社，由于经营得法，信誉卓著，不久，就将周围几十里路以内农民的农副产品，吸引到合作社来进行交易。这种互通有无的作法方便了群众，得

到当地农民的好评。

各连队在开展生产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民国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屯垦工作汇报》资料记载：两年内，在全河套垦区内开垦荒地，二荒地两千余顷，一九三四年总播种面积达一千三百五十八顷。其中：由连队自种的为六百五十顷，租给民户伴种的七百零八顷。

在《屯垦工作汇报》中说：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屯垦军各连队在垦殖事业上做了八件大事。这就是：（1）扩大了垦地，引用了农机，生产的粮食，除自给外，还能向外出售；（2）试验种植了牧草，改良了牲畜的饲养；（3）试种了工艺作物，如烟草、甜菜、亚麻、黄豆等作物，使部分农产品成为工业上的原料；（4）创建了农产贸易合作社，流通了农村经济；（5）育成了杨、柳、榆树苗十万株，绿化了屯垦驻地的村庄；（6）开办农事训练班，增进了垦兵的农业知识和技能；（7）创办了农事试验场和测候所，改进了农业的操作方法，为农产品丰产打下基础；（8）初步疏通了渠道，修建了道路，使河套的面貌初步改观。

三、兴修水利，开发交通

从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屯垦队进入河

套垦区后，有鉴于水利的重要，当即着手进行水利建设工程的规划。到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在四年的时间内，新挖和清淤较大的干支渠三十余道，渠身总长度达四百一十余华里，总投资金额达银洋七万三千七百余元。

计新开挖较大的干支渠十三道。在五原县和安北县境内的有：川惠渠，华惠渠、柯惠渠、威远渠、摇头娃娃渠五道。在临河县境内的有：百川渠、义惠渠、寿轩渠、光惠渠、诗惠渠、清惠渠、润惠渠七道。在包头方面的东大社，则挖了一道安惠渠。这十三道干支渠，长的六、七十华里，短的十余华里。渠名均以军官的名号命名，其下加以‘惠’字者，意为某军官示惠于民之渠。

共清淤较大的干支渠二十三道。分布在五原县和安北县境内的有三合公、鸭子图、巴汉和硕、平官、陈五、赵东旺、贾三仁、王蝉生、威远南渠、杨福来、改兰淖、多罗台、福盛隆、乃马岱、丰济支渠等十五道渠。在临河县境内的有乐善堂渠、杨家河边渠、志谢渠、乐成渠、骆鸿儒渠、大南渠、杨贵渠、西大渠等八道渠。在乌加河北刘蛇圪堵（折桂乡）的乌拉壕、修建了一座一百二十丈长的大坝，提高了乌拉壕水位，便利了灌溉。

此外，还开挖子渠一百余道，修筑干支渠口的较大闸箱二十余座（用芟芑、白茨作原料），建筑大桥十余座。至于小型水利工程，各垦区连队视生产需要，年年都有施工。由于大力兴修了水利工程，从而，改善和提高了河套水利灌溉效益。

兹就各屯垦队单独经营，独力开挖的较大水利工程项目，分别叙述如下：

（一）开挖川惠渠和华惠渠

五原县的义和渠，原为王同春在光绪十八年时所开挖。其后因年久失修，年年淤澄，进水不畅，影响生产。特别是处在上游的土地浇水尤为困难，其中以南牛渠和锦秀堂两地受到影响为最大。驻五原屯垦办事处有鉴于此，遂派出技士王文景测绘新渠线，开挖了川惠渠和华惠渠。两渠均从黄河引水，渠经福泰昌以南的地方，分为东西两条支渠，东支梢至义贞吉海子，西支梢达六份子，渠长八十余华里。开挖时，投入施工人数目达五千余人，两个月竣工，施工费用为银洋一万四千余元。渠成之后，水流畅通，群众称便。

（二）开挖百川渠

在临河县祥泰魁，以阎锡山别号命名的百川渠，是在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由三个师垦队利用祥泰魁旧渠施工改挖的。该渠引永济渠

水。渠身长六十余华里，渠身均宽二丈四尺，均深五尺。开挖后两年竣工，用款白洋一万五千元。另外，还从百川渠引水，开挖了七道支渠以达垦区。支渠总长度为四十余华里，稍通刚目渠。百川渠修成后，灌溉面积可达千顷左右。

（三）乐善堂渠改口工程和开挖西大渠、大南渠。

此渠在临河县的永安堡，从民国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利用郇祥渠重新修挖，次年竣工。渠经二喜渡口。自永济渠引水，向西北流，东归头道壕总长六十余华里。施工费用为银洋三千多元。

（四）开挖义惠渠

此渠在临河县的八岱滩（广胜乡）。由于地处黄土拉亥河西，地势很高，南北界于沙梁，引水不易，于是，在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新开义惠渠，由黄土拉亥引水。接着，又从义惠渠引水，开挖了三道支渠，十八道子渠。义惠渠挖成后，流水至畅，附近土地都能上水，八岱滩上的农民皆大欢喜，无不称道这一善举。

（五）开挖寿轩渠

此渠在临河县的苏台庙（寿轩乡）。从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开挖，由杨家河引水，渠长十余华里。然后，又挖了寿轩支渠，长五里，乔桂支渠和班大渠。因为寿轩渠经过的沙沟

一段，在浇水时节经常发生问题，即：河水小时，灌满沙沟需时半个月，影响及时浇水，河水大时，又易决口。为此，又挖了一道志谢渠，改善了苏台庙一带的水利灌溉。

（六）开挖光惠渠

此渠在临河县的蛮会（现属杭锦旗）。它从黄土拉亥河蛮会坝开口引水，中间一段接五大股渠，全渠长二十三华里。接着又开支渠四道，挖退水渠一道，能灌有排，用永称便。

（七）开挖清惠渠

一九三四年，在杨家河的那直亥修筑草闸一座，利用老许旧渠施工整修，改名为清惠渠。渠成之后，可灌溉两个屯垦连队的土地和少数非垦地。

（八）开挖安惠渠

此渠位于包头南的东大社，原来引沙梁南边的山洪水，灌溉沙梁以北的沙碱地。及至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山洪暴发，东大社的城堡全被冲毁，于是，才在民国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在闯不汗召（新民堡）的哈什拉川内坐坝，开挖安惠干渠，渠长三十七华里。在安惠渠挖成后，又开了五通支渠，总长三十五华里，分布灌溉在西两大社的土地。另外，还建筑一座蓄水坝，以分杀山洪来时的水势；建筑一处天然分洪

水库，以延长河水流期。由于工程较大，全盘工程建成后，需费银洋四万多元。

各垦区所修的灌溉渠道，较小的，由各屯垦队自行管理，至于渠道较少的垦区，另设专人管理。一九三六年，五原屯垦办事处组织了水文测量组，汇集西至乌拉河，东到乌梁素海，北迄乌加河，南达黄河，整个河套地区范围内的各大河渠的水文资料。这项水文资料收集后，当时因事多没来得及整编出来。延至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占了包头，五原屯垦办事处宣布人员留职停薪解散，资料因无人保管，而零散遗失。

在水利建设工程紧张施工的同时，屯垦督办公署于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派四三〇团团团长孙福林，率全团官兵来河套修建五原到陕坝的北公路。这条路由五原起，向西北过乌加河，经陕坝，终点延伸到太阳庙，全长三百余华里。沿途架设大、中、小桥梁三百余座。另外，还将包头至五原的公路加以修铺。计修铺了两段：一段从包头到张油场；一段从扒子铺隆至五原。

对修路的要求是：凡是沙路，在公路两旁必须植树，以挡风沙；凡是下湿路，则垫筑硬土，以提高路基。至于公路的坡度，规定要求筑成八分之一的倾度。

五原至陕坝北公路的建成，大大地便利了河

套人民的交通运输，并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条北公路与早在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由国民军石友三旅所修成的由包头到五原，以迄于临河的南公路，被称为河套地区的两条交通大动脉。

四、建设屯垦村及其组织

阎锡山创办屯垦之用意，不止于开荒辟地，其主要目的在于创建新农村，以改善人民的社会生活。意在以军队为主体，实行集体生产、生活制，以此作为示范，渐次影响居民村落，以期在农村普遍地扩展、推广新农村之建立，并逐渐使农村趋于城市化。

新村建筑的规模较大，主要有官兵宿舍、农场、苗圃、村公所、学校、医院、合作社以及运动场，道路和电话线路等。在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以后的三年中，河套垦区共建成新村十七处。

按原计划规定，一个团要建成十三个新村，即每个连（一百户）建一处新村。其后改变了原来计划，改为以营为单位（每营三连制）建成一处新村。

在计划未改变以前，按原规定以一个独立连为单位已建成的新村有八处。分布在五原县境内

的有：同兴堂的占元乡，白头圪堵的道五乡，红柳圪旦的永善乡，三柜圪旦的字厚乡。在临河县境内的有：苏台庙的寿轩乡，那直亥的贵生乡，公产地的通三乡，崇爨公的可言乡。

计划变更后，按新规定以一个营部另附一个连建成的新村有一处，这就是临河县祥泰裕（永安堡）的完智乡。以一个营部另附两个连建成的新村有两处，这就是五原县仁宝圪旦的敬生乡，临河县八岱滩的广胜乡。以一个营部另附三个连建成的新村有三处，这就是五原县新公中的负晒乡，刘蛇圪堵的折桂乡，南牛旗的觉民乡。以一个营部另附四个连建成的新村有一处，这就是距五原县西七十里外的蒲乐素图的良忱乡。

新村建成后，凡是由一个独立连建成一个新村的，连部即设于村公所内；凡是由营连合建的新村，营部设于村公所内，连部则建于居民区内。新村建筑形式是：以村公所为中心，在其周围分排建筑房舍、仓库、栅栏等。各排房屋前后相距数丈，中间留作道路。并在适中的地方，留出空地来凿井取水。在新村的外围，修筑堡墙，并挖濠沟，置炮台，用以防御敌人的侵袭。

每个新村的面积是：南北长二百八十六丈，东西宽二百一十八丈，占地一十顷三十九市亩。每户拨给房基地一亩六分三厘，一村可容纳居民

三百九十二户。新村内，东西南北四条大马路各宽六丈，南北四条纵路及公用地和南北顶头东西两条横路各宽五丈。各户之间东西相隔三丈，以便于中间行走汽车和两旁植树造林。村公所建房四十五间，学校、医院，各建房四十七间，碾、磨二坊各建房二十间，算下来每个新村的公共建筑，总共有房一百七十九间。

在临河县的祥泰魁（百川堡），除建立和其他各处一样的新村和村公所外，又另建立垦殖联合办事处院落一处，“百川”公园一处。公园位于堡子中心，总面积为一十七亩。公园内的行道，是按“百川”二字设计排成的，以示对阎锡山创办屯垦“德惠”的纪念。在公园旁，附设一所雅致的图书馆，其中藏书很多，有专人管理。

“百川堡”外面，分东西南北四条大马路，路旁开设商场，铺面很多，成为一个有名的小集镇。镇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是当时方圆数十里内繁华贸易中心。后来临河县的第二区公署，就设立在这里。

民国二十四（一九三五）年，在五原县城东门外，建成一处“亞”字形的农事试验场。其地址原为国民军的旧营盘，占地面积为五顷。农场内建有办公室、教室、储藏室、农产品展览室、种子室、农具室等房间。在农场四周，也修起了

围堡。围堡的西隅，修了公房和牛马棚圈，围堡的南门里边，建筑了士兵的宿舍和厨房。这所农场落成后，在当时的五原县来说，还是一座规模相当可观的建筑物。

屯垦新村内部，有其一套完整的管理组织，共分为政治、经济、教育、公益、卫生、公安等六项。现分述于后：

（一）政治组织

在新村内，每五户为一邻，邻设邻长；每五邻为一间，间设间长；四间为一村，村有村长。新村设村民会议，为全村的最高权力组织。村民会议的职权是：选举村长，村副及各委员会的委员，制订新村的法令、公约；研究决定新村的一切应兴应革事宜。

村公所为执行村务的行政机关，执行者为村长、村副。此外还设立了调解委员会，以调解民事纠纷；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新村内公共财产的实施情况及监察各办事机关的工作情况；经济委员会，负责各种公营经济事业的兴办。

（二）经济组织

在新村内，有三条经济原则必须遵循。这就是：第一，为了平均发展经济，在新村内必须实行均产制；第二，在生产、消费和分配等方面，要遵守合理化的原则；第三，兴办合作事业。

关于合作社组织的实施，也有四项规定。即（1）建立信用合作社，主持全村内的金融信贷工作；（2）成立公营贸易所，供应村中的消费品，销售村中的生产品；（3）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社，主持农业计划、种植安排、农具分配、农产品保管等事宜；（4）联合邻村合组农事试验场，以改进农业生产。

（三）教育工作

在新村内，重点推行全民教育，终身教育，互相教育及国防教育等。

（四）公益事业

建筑新村内外道路，开辟渠道，兴修水利，培植树木，设置公园，并举办社仓，抚养孤寡老幼，救济因遭受天灾、疾病需要救济的困难户。

（五）卫生事业

要求个人注重清洁卫生，公共场所和街道要保持清洁，并设立公共医院，经常检查病疫。

（六）公安工作

在公安工作中，其主导思想是，非自卫不能安居。为此规定，村中二十岁至四十岁的壮丁，必须一律接受军事训练，并负责担任清查户口，守望巡逻、剿匪和防御水火灾害等任务。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村公安工作的重点，是在于“防共”。

民国二十二（一九三三）年，在屯垦队建设新村的同时，屯垦办事处的测量队，即对绥西地区进行了测量。第一次测绘了包头、固阳、安北、伊克昭盟地区和整个河套的地图。计绘有：包头、固阳、安北一览图；河套地区的略图和全图；伊克昭盟的一览图等。另外，在伊克昭盟又测量了东起包头，西至银川的宁包铁路线，还测量了从五原到陕坝，终点在太阳庙的河套北公路线等。这些有益于绥西人民的举动和措施，不仅为当时绥远省政府当局填补了空白，其所绘制的地图，也为以后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五、抗日兴起后 屯垦队的作为

（一）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变生产队为战斗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迫使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从而揭开了八年全民抗日战争的序幕。

九月间，日寇侵占了大同。傅作义奉阎锡山之命，忍痛放弃了归绥和包头，率所部三十五军去保卫太原。接着，阎锡山又命王靖国从屯垦部队中，每连抽出一个排，编成补充一团和二团，由四〇九团第一营长邓鱼陞升任补充团长，驻在

包头待命。随后，又调四〇九团团团长侯振清率学兵团开赴太原，四一〇团团团长石焕然也奉调东进，甚至连屯垦办事处的人员，也大部抽调去了山西。

由于屯垦部队的调动，已打乱了原来的屯垦部署，这势必对留下来的屯垦部队进行调整和改编，才能适应新的情况。为此，阎锡山命徐子珍改编河套屯垦部队屯垦军，任徐子珍为屯垦军司令。徐子珍就职后，命留下来的四〇九团和四一〇团官兵，分别卫戍五原和临河两县城防，并维护社会治安。至于屯垦军的一切供应和开支，均由留在垦区的屯垦队筹拨。

自从傅作义离开绥远后，留绥的国民兵（前身为常备队，后改为游击队），一部分由袁庆曾率领，尾随傅作义开往太原；一部分由副司令李大超率领，进驻了五原（因怕去山西被吃掉，故西进五原，以保存实力）。

李大超率部来到五原后，由于军饷没有着落解决，竟用威逼的方法，强行逼迫五原县银行提供现款，发放军饷。李大超的要求遭到五原县银行拒绝后，他蛮不讲理，居然使用武力相逼。在这紧急时刻，幸赖徐子珍调兵保卫了银行，并宣布全城戒严。当时，双方对峙，险些大拼。后来李大超让了步，才算避免了一场战斗。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的游击杂牌部队武驼羔（峻峰）、赵炽昌、邬青云、刘效贤等云集于五原。不久，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和中央军门炳岳的骑六军，也从绥东退到了五原。一个小小的五原县城，大军云集，社会秩序很乱，人心也有些惶惶不安。

门炳岳来到河套后，他趁傅作义去山西不在绥远之机，就自任为绥西警备总司令。由他的部队接替了屯垦军的城防任务，并和屯垦军共同绥靖了河套地区的治安，镇压了煽动人心的汉奸唐照明和唐三元，从而，平息了谣言，安定了民心，使河套的社会秩序，恢复了稳定。

在战争的环境里，屯垦部队不能再安然从事屯垦生产了。为此，徐子珍通过与中央军门炳岳的关系，将屯垦军的番号改编为五临警备旅，所需的军饷供给，完全由国民党中央发给。警备旅由徐子珍担任旅长。旅下编成三个步兵团：一团团长为于霖瑞，二团团长为贾晏如，三团团长为白贵元。从此，屯垦部队完全脱离了垦区，成为一支抗日的战斗部队。

在屯垦部队绝大多数脱离垦区后，各垦区按原来的范围，将三十个屯垦连队改为三十个屯垦队。每个屯垦区留一名连副和上士一人、士兵十人看守门户。他们因为无力垦种土地，因此，把大

部分垦地租给农户伴种，后来，又雇用长短工给垦区种地。这样以来，屯垦队的生产规模大大地缩减了。

（二）屯垦队在五原战役中的功绩

一九四〇年六月，日寇侵入河套，占据了五原县城。同年三月十九日，五临警备旅在傅作义的直接指挥下，协同三十五军攻打了五原县城。

五临警备旅，在团长贾晃如和白贵元的率领下，攻打驻在五原新城屯垦合作社和五原屯垦办事处的日军司令部。白贵元团长亲率一支突击队，越过障碍，从南门冲进城来。由于屯垦队士兵多系本地人，熟悉街道地理，再加上又有五原人民的密切配合，他们穿墙越院，隐蔽前进，终于接近了日军指挥部。在敌人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一举攻下了日军司令部。

敌人在失去指挥中心以后，就象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成一团。此时，我各抗日部队乘胜围歼敌人，使日寇全军覆灭。从城中仓惶逃出来的日本皇族水川中将，也被我游击一支队连长张汉三追赶到安北县东滩子冰滩上击毙。伪蒙军师长李根车被活捉，伪汉奸绥西联军司令王英侥幸逃脱。

这次战役，缴获了许多轻重武器如远射程大炮以及大批军用物资。五原大捷，不仅打击了日寇侵华的野心，同时，也奠定了河套地区的治安

局面。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五原战役中，五临警备旅官兵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团长贾晏如，亲临前线，带兵杀敌，在激烈的巷战中，浴血奋战，不幸壮烈牺牲。由于他们英勇善战，奋勇攻坚，终于奠定了胜利的局面，为五原战役立下了不朽战功。当时，五原县人民歌颂屯垦部队说：“屯垦队真干咧，三十五军帮办咧，三十五师（宁夏马鸿宾部队）吃面咧！”

为了纪念贾晏如团长为国献身，英勇杀敌的壮烈行为，将五原县东街的一条街，命名为晏如路。以后在一九四二年实行新县制时，将五原县西部的二区和三区划分出另行成立了一个县，命名为晏江县。晏，就是纪念五临警备旅团长贾晏如；江，是纪念抗日阵亡的三十五军营长赵寿江。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五原县人民对屯垦部队在五原战役中，给予的高度评价。

早在五原战役的前二年（一九三八年），河套屯垦军就攻打过投降日寇的乌拉特中公旗，给附逆的蒙旗王公以沉重地打击。此后在一九四四年，又围剿了日寇设立在后山诺其的特务机关，并将这所特务机关予以彻底摧毁。

（三）屯垦队由不景气走向变质衰落

五原战役后的屯垦区，由于部队参战抗日，

它简直象一座座的残灯败店一样，成了一个空架子。留守在垦区内的屯垦队连附和少数老弱士兵，在百川堡垦殖联合办事处的领导下，只能负责办理全队土地的出租、收租事宜，再也无力从事垦种了。

渐渐地留守人员变了质。他们各存私心，混水摸鱼，将战前屯垦部队积累下来的牲畜，资财等公共财产，除部队动用者外，剩下来的资产，大都揣进腰包，饱入私囊了。在这种情况下，屯垦队的性质完全变了，它已不是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屯垦集团，而是变成一个由少数人掌握大量土地，用出租、收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地主集团了。

此外，还有少数留守人员，不但个人发了国难财、机会财，而且还借屯垦队的威风，倚仗权势，横行乡里，欺压群众，为害人民。从此，屯垦队的名声一落千丈，屯垦人员已为河套人民所唾弃，所憎恶，不再受到欢迎了。

（四）出租土地，盘剥农民

屯垦队在把大量的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后，留守的官员们，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盘剥人民，以致造成民怨沸腾，叫苦连天！屯垦队租给农民土地的方法，实行的是丈青制。这就是：春天租地，秋天丈地，以绳为准，据以收取租粮。但在丈地过

程中，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拉拢丈青人员，给他们吃点好的，拿点硬的（指银元及物品），便可少丈或不丈。至于贫困农民，无力行贿，丈青人员就来个实丈实，以加重农民的负担。当时，农民对此非常愤恨，曾编出一首顺口溜来，互相传播，以泄胸中之气。顺口溜的内容是：“肥了大户，饿死小户，中差出害中常户，屯垦队的官员吃大肚。”

屯垦队出租土地的办法有三种：一种是，“停半股子停半害”。这就是屯垦队与佃户对半分成，拿税出官粮各负担一半。第二种是，“四六分股不带害”。这就是屯垦队净分四成租粮不缴官粮不纳税。第三种则是，屯垦队概不承担官粮捐税，还要按“停半”或“四六”收取租粮。

屯垦队收取租粮的方法，也因人而异，各有不同。有的在田地里分庄禾捆子，佃户拉一行，屯垦队拉一行；有的则在场面上脱粒分粮食。

居住在河套地区无地可种的农民们，他们为了养家活命，谋生糊口，在当时，既要出高额租粮向屯垦队租种土地，又要负担全部的粮赋捐税。在双重负担的压力下，只弄得他们春天租牛、租地、秋天交租、交税、终岁勤劳，不得温饱。而屯垦队的官员们，则广收贿赂，多方盘剥，贪污自肥，大发横财。这与农民的生活比较起

来，真有天壤之别。

六、屯垦队留给人们的印象

自从一九三二年屯垦队来到河套开垦后，给人们留下来的印象有好、有坏。好坏的分成也只能为三七或二八开。其好处多见之袭来套之初，而坏处多在抗战之后。说到底，坏处多于好处。尤其到了屯垦后期，所有以前的好处，也被坏处给冲淡了，因此，它留给河套人民的印象，总的来说是恶劣的。

在屯垦队入套之初，造福于河套人民的第一件大善事，就是绥靖了地方。使多年为害地方的大小股匪和出没无常的棒槌队绝迹了，甚至连盗窃现象也显著地减少了，人们都不再为“请财神”、“拉票子”担心受怕了。至于屯垦队对河套地区的建设，诸如：兴修水利、举办交通、垦荒生产、改进农业、推广农作物良种，提倡使用新式农具，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以及立学校，建医院等方面，都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这些都是好事。但后来由于屯垦人员的腐化变质，为非作歹，盘剥人民，致使以前留下的好印象，也失去了光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合作流通券的贬值，给人民造成了重

大损失。

自一九三五年屯垦合作社发行流通券以来，使得屯垦队扩大了商业经营，加快了资金周转，赢得了高额利润。但由于发行量过于庞大，造成了通货膨胀，不能兑现。他们名义上说发行额为三十万元，实际发行的货币比名义上的数字多三倍，共发行流通券达一百二十万元以上。

及至一九五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流通券的价值暴跌，每元流通券只能当作五分钱来使用，在当时市场上只够买一碗羊杂碎汤馇的代价。屯垦合作社对流通券的贬值熟视无睹，不给兑现，致使人民大受其害，就连屯垦区的官兵们也叫苦连天，大喊倒霉！在五原、临河两县，有不少的商号铺家，受流通券贬值的影响，有的因亏累潜逃，有的则歇业关门。人民气愤地说：“流通券是馇羊杂碎汤的票子。”“这是向人民劫财！”一时人心浮动，社会不安。

比起流通券来，绥远省平市官钱局所发行的“塞北关”纸币还算好点。“塞北关”纸币尽管因为战争爆发也贬了值，但傅作义领导下的绥远省政府，都给兑了现。为此，人人称善，颇得民心。唯独阎锡山所办的屯垦合作社，对他们发行的流通券不负责任，坑害了河套人民。

（二）霸地霸水，与民争利

屯垦队在五原县开挖川惠渠和华惠渠时，曾占用南牛渠和锦秀堂两地农民的大片土地，没给补偿，致使许多农民无地可种，生活无着。在五原县新公中一带居住的农民，原来都是租种王英土地的佃户。自屯垦队以逆产为罪名，没收了王英的全部土地后，这些农民丧失了土地，也成了无地可种的农民。但一些与屯垦队官员有拉拢的绅商大户以及送过礼物的人们，却仍然保留着名为逆产的王英土地。他们不但自己种，还转租给农民进行剥削。

五原县新灶河渠流经新公中的分水闸，在每年浇青时，屯垦四〇九团第一营就将分水闸门关闭，使水流不下来，浇不成地。必须在屯垦队的青苗浇过两三水后，才开闸放水。平时，每当新灶河渠水量流大了，屯垦队就把闸门放开，使下游庄禾淹个死；若是进水少了，他们就把闸门提起，使下游庄禾旱个死。对此，农民虽然气愤不平，但慑于兵威，也不敢说理。

在五原县西部塔尔湖以西的良忱乡和水道塔拉，驻有屯垦十三队和十四队。这两个队在使用塔尔湖渠水浇地时，私自规定了“先屯垦队，后农民”的不合理浇水办法，并美其名曰：“先公后私”。由于他们霸水不放，“农民们只能在他们浇过青苗，并给荒地泡够伏水之后，才能用水

浇地。

象这样的霸水欺民行为，在五原、临河两县的屯垦队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当时，在水利争执方面，经常发生坐坝、浇青、提水拉闸、防洪打口等事件，也往往发生垦区官兵殴打农民的事情。每当出现水利纠纷时，既使去屯垦乡公所打官司，农民有理也打不赢，终于以吃亏了事。

（三）屯垦队干涉地方行政

屯垦队在各营部所在地都建立了屯垦乡公所，它与绥远省行政系统建立的基层政权乡公所并立。凡是垦区附近的民事纠纷，都由屯垦乡公所处理。至于农民之间的民事纠纷，或农民与垦兵发生的纠葛，也都得去屯垦乡公所评理解决。而行政乡公所，却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不能过问垦区内的任何事情。这不仅严重地侵犯了傅作义基层政权的职能，同时，农民们在双重政权的支配下，恰如“风箱里的耗子”，两头支差，两头受气。

（四）放高利贷，剥削农民

屯垦队的官兵每年都分到红利，因此，人人手中都有积蓄。有的人在本地娶妻安家，并在垦区外购置土地，出租剥削；有的人养殖牲畜，兼作买卖，获利放贷。最为严重的是，屯垦队在垦区内大种特种鸦片，造成烟毒泛滥，害人不浅。屯垦

区外的军官，还与地方上的绅商大户合作，在垦区外也大种鸦片，牟取暴利。

每年烟季，傅作义的地方政府，即向烟户征收烟税。此时，屯垦队官兵出面抵制不交，实在抵制不过时，他们就借故逃避，地方政府也无可如何。

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春季，屯垦队官兵利用农民春耕紧困之际，以高利贷的形式，把大烟土贷给农民，条件是到秋天用粮食归还。有的农民因偿还不起，被迫无奈，只好把自己的闺女许嫁与债主为妻。

（五）屯垦队军官与地方上绅商大户的关系

屯垦队里的军官，上至团长，下至班长，与地方上的绅商大户都有交往。如：五原县大地主王乐愚、刘文、晏江县的大地主周成吉、张镇远、临河县的大地主李干臣等头面人物，都和屯垦队的负责人交际往来，关系密切。他们串通一气，互相勾结，损公肥私，鱼肉人民。

地方上的绅商大户，为了从屯垦队里捞到好处，除对屯垦队军官逢年过节，请客送礼外，有时还奉送大青马及其它贵重物品。而屯垦队军官，也本着礼尚往来的精神，回敬绅商大户。如：他们派遣屯垦士兵给大户们春天挖渠，夏天锄地，秋天的收割，冬天打场等等。而一般贫苦农

民则是：“人小帽子低，说话没人理”。成为他们共同剥削的对象。

（六）屯垦队进行反共活动

自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进驻在陕北后，阎锡山出于“防共”的需要，在晋绥两省各级军政组织中，建立了“防共自卫团”。五原县的“防共自卫团”，设在新城东门里永生号商号院内。

该团成立后，在屯垦队官兵中，普遍教唱“反共歌曲”，并散发宣传“反共”的小册子，让官兵们广为传阅。他们还经常组织宣讲会，用危言耸听的恶毒语言，诽谤共产党一无是处，用以煽动全体官兵仇恨共产党。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一天，屯垦四〇九团，突然将五原县第二完小校长胡毅，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拘押到团部审讯，并对胡毅家中翻箱倒柜的搜查了三次。

胡毅，字铁铮，系山西省定襄县人，黄埔军校四期生。在大革命时代，曾在徐向前元帅领导下的部队中当过炮兵营长，及至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流徙来到五原任教。为人性情刚直，心地坦荡，思想左倾，言论偏激，颇为当时五原县社会人士所瞩目。

一九三二年，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路经五原

县城，当时五原县政府准备组织各界人士出郊欢迎。当通知单送到胡毅处时，他用笔大书“不去”二字，一些人见了无不惊慌失色！后来，他们的学校果真没有派人参加欢迎。一九三三年，他曾组织过五原县教职员索薪运动，并在其中起过核心作用。在运动中，他受过伤，也被当时的五原县长赵鸣瑶收过监，坐过牢。

胡毅被屯垦四〇九团关押达半年之久。在关押期间，胡毅始终表现出正直无畏、大义凛然的革命风度。嗣因证据不足，再加上五原县各界人士运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出面关照，才得释放。

七、屯垦队被整编

阎锡山驻在河套的屯垦队，是安在傅作义眼皮底下的一根钉子，在傅作义主政绥远地区期间，事事掣肘，处处阻挠，以致傅作义所发布的政令，不能在绥远地区推行。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傅作义从河曲拉出晋绥军中的三十五军进驻河套，就任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从此，傅作义与阎锡山分道扬镳，另起炉灶。

关于河套的屯垦部队，傅作义曾经几度打算着手整编，以期实现绥远地区的军事统一。但由于屯垦二〇五旅旅长徐子珍是阎锡山的心腹，他

秉承阎锡山的意旨，不把傅作义放在眼内，坚决不同意整编屯垦部队，对此，傅作义也无可如何。以致此事搁置了数年，没有得到解决。

这支屯垦部队在河套期间，始终是属于阎锡山的人马。旅长徐子珍和阎锡山经常保持着密切联系，凡屯垦部队中的事无巨细，必须得到阎锡山的同意，才能做出决定。

一九四〇年春天，在五原战役胜利后，阎锡山改五临警备旅的番号为二〇三旅，同年又将二〇三旅的番号改为二〇五旅。这样频繁的变更部队番号，说明这支部队始终属于阎锡山部队的编制。其明显的用意是，河套屯垦部队是一支独立部队，傅作义虽是战区司令长官，也只能属傅调，不能归傅管。阎锡山生怕傅作义把这支部队吃掉，所以紧抓不放。

到了一九四二年，傅作义在绥远地区的军事扩充上，政治改革上，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也积蓄了自己的力量。这年冬天，傅作义认为整编屯垦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于是，采取了断然措施，在狼山县的蛮会，将屯垦二〇五旅改编为骑四军（军长董其武）所属的步兵旅。撤换了原旅长徐子珍，委任了靠近自己的原二〇五旅团长于瑞霖接任步兵旅长。该旅所属两个团，一团团长由赵泽生担任，二团

团长由白贵元担任。

屯垦二〇五旅的改编，这意味着阎锡山驻在河套的这支嫡系部队，已进入了傅作义的怀抱，从而，实现了傅作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在绥远地区军事统一的局面。这使傅作义高兴，阎锡山扫兴。

当阎锡山听到傅作义改编了他的二〇五旅的消息后，怒气冲天，把傅作义恨入骨髓。为了发泄他的怨恨之气，就在他战时总部所在地——山西省吉县，大造舆论，声讨所谓的傅作义“叛逆”。从此，阎傅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公开化了。

在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傅作义又把绥西的抗日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其中，将原来由屯垦部队改编为步兵旅的番号撤消，把该旅的士兵，用化整为零的办法，花插开编到六个师的直属营里去。如十七师和第十师的山炮营，第七师的工兵营等，就是由步兵旅的士兵改编的。这样一来，阎锡山的这支嫡系部队，被傅作义完全吃尽并消化了。

日本人投降后，傅作义星夜率部东进，准备接收敌伪占据的地盘。当他行至大同时，阎锡山派出楚溪春部出来阻挡。

这是阎锡山抱有嫉妒心理，怕傅作义扩大了

地盘，壮大了实力，成为他未来的劲敌，故派兵阻拦，不使东进。当时，傅作义委曲求全，不想与阎锡山发生对抗，立即折回了绥远。

八、屯垦队的衰败消失

阎锡山在河套创办的屯垦队，其整个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为新生阶段；由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为高度发展阶段；至一九三八年，转入衰败阶段；等到进入一九四〇年以后，则趋于没落，腐朽和消亡阶段。

屯垦事业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在于七·七芦沟桥事变。在日寇的大举侵略下，屯垦部队走上战场，参加了抗日战争，致使垦区成了一个空架子。尽管名义上，仍按原来的范围，把三十个连，改成三十个屯垦队，但每个垦区仅留十来个人，他们只能经营土地，收取地租，早已失去屯垦的意义，也完全改变了屯垦的性质。

在芦沟桥事变后，设立在包头的屯垦督办公署并入了五原屯垦办事处。在日寇侵占包头后，五原屯垦办事处宣布解散，人员留职停薪。一九三八年二月，太原方面才电召逃散人员回五原恢复了办事处。其后日寇攻打河套，办事处迁往班禅召。在日寇攻入河套后，办事处又一次宣布解

散，人员四散逃亡。一九四四年三月五原大捷后，在四月间，由屯垦办事处处长郭维藩召集被遣散的办事处工作人员来百川堡，又恢复了屯垦办事处，开始办公。但此时的河套屯垦事业，早已腐朽变质，一步步走向了没落的深渊。

回顾近二十年来屯垦部队的演变是，在进套之初，这支河套地区仅有的国家武装，对绥靖地方治安，保障人民生活，有过贡献，为人民所欢迎。其后，在屯垦的过程中，他们又对河套地区的农业、林业、水利、交通以及各项公共事业方面，作出过贡献，和人民建立了感情，密切了关系。自抗日军兴，屯垦队变了质，他们承袭了河套地主、奸商的衣钵，压榨人民，成为套在河套地区农民脖子上的一副沉重枷锁，逐渐地为人们所唾弃，所厌恶，终于走向了消亡。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省和平解放，长期遭受奴役、压迫的河套地区的各族人民，犹如拨云见日，枯木逢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走上了新生活，成为河套地区的真正主人。

可是驻在百川堡的屯垦垦殖联合办事处，在坐办田树梅的策划下，诱骗了一部分屯垦队的留守人员，参加了以崔正春为首的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军”。这些反革命分子，以百川堡为

巢穴，发展特务，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幻想蒋介石、阎锡山等反动派卷土重来，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螳臂挡车，蚍蜉撼树，都是些不知自量的行为。这些反革命分子，在人民的铁拳打击下，终于遭到了彻底覆灭的命运。

一九五〇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对甘心与人民为敌的以田树梅为首的一小撮首恶分子，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胁从分子则给予劳动改造的处分。将百川堡屯垦垦殖联合办事处，改为绥西军垦生产指导办公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七军，向每个屯垦队派去一个连的战士。参加垦区生产，原来的屯垦队长改为生产指导不久，又将原屯垦队队长一律调到集宁学习。从此，河套地区的屯垦工作遂告结束。

综观阎锡山在河套创办屯垦的组织纲领，可以看出，阎氏在三十年代时期，就已认识到土地问题是造成农民革命的根本原因。为此，他在河套创办屯垦，其目的是，企图采用改良主义的办法，实地试行其大力倡导的改革土地私有制为土地村有制，并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以达到平均分配，合理负担的要求。

他原想在河套屯垦中，作出成绩，搞出一个名堂来，用以刷新全国的视听，并为其“屯垦西北，造产救国”的论调找出根据。但芦沟桥畔的

一声炮响，导致了屯垦事业的寿终正寝，使得他这一主张没有来得及全面实现。虽然其理论及实施办法不无可议之处，然而，他这种作法，仍不失为改革土地私有制的参考。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出来，在河套屯垦的过程中，它整个贯串着阎傅之间的权力斗争。河套屯垦，原为阎锡山在绥远省牵制傅作义手脚的工具，也是安放在傅作义心脏上的一根钉子，这种勾心斗角的斗争，长达十余年之久。

阎傅斗争，由来已久。追溯起来，远在一九三〇年傅作义当上绥远省主席之日起，阎锡山从一九三二年登上晋绥公署主任的宝座后，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的序幕便揭开了。阎锡山气度不广，心存猜忌，为了钳制傅作义在绥远地区的活动，他把赵承绶的骑兵放在绥东，王靖国的七十师放在包头，东西挟持，企图使傅作义在绥远地区无所作为，其用心亦良苦矣。

傅作义在主持绥政期间，举凡在军事上、行政上，处处都受到阎锡山的扯肘，就连各县县长的任命，都得由阎锡山从太原委派，或者由赵承绶，王靖国推荐。甚至基层乡政权，也被屯垦部队夺了权，不能发挥作用。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二年，屯垦部队被傅作义整编后，阎锡山的势力才被挤出绥远地区。

阎锡山在河套军垦屯垦队分布地点略表

屯垦队所 在旗县	屯垦划区	屯垦队所 (乡名)	屯垦部队			屯垦队别	屯垦队新 村所在地	的旧地名	授数(顷) 给垦地	屯垦队新 名称	备 注
			团	营	连						
五 原 县 安 北 县	一 区	觉民乡	419	3	8	七队	南牛根	500	川惠渠	(1) 还开了一道摇 头娃娃渠, 坐了一座乌 拉濠大坝。	
		占元乡	"	3	7	八队	同兴堂		华惠渠		
		负喧乡	409	1	3	一队	新中公	200			(2) 屯垦队的驻在 地, 除表列者外, 410团还驻在板旦 沙呼尔席, 乃马岱三 地。连队名称不详。
		折桂乡	"	2	4	五队	刘蛇圪堵	500	柯惠渠		
	二 区	道五乡	"	"	8	二队	白头圪堵			威远南渠	
		敬生乡	"	2	2	三队	仁宝圪旦	500			
		子厚乡	"	3	7		三柜圪旦	300			
		乐善乡	"	3	9		红柳圪旦			鸭子图渠	

临河县	三区		三十四	良忱乡	410	1	2	五分桥	500	改兰淖渠	(1) 还挖了二道西大渠和大南渠。 (2) 陕坝园子渠口, 亦为410团第三营垦区。		
	宪智乡	"		3	8	祥泰裕		乐成渠					
	广胜乡	"		2	5	八岱滩	300	义惠渠					
	寿轩乡	"		3	6	苏台庙	100	寿轩渠					
	贵生乡	"		3		那直亥	100	边渠					
	通三乡	"		3		公产地	100	光惠渠					
	可言乡	"		3	12	崇发公	100						
	四区				东大社	407	2		白泥井	700		安惠渠	还建了一座水库。
	西大社							同兴东					
	临河县	七十师、七十二师、七十三师三个师垦队						祥泰魁	500	百川渠		祥泰魁改名百川堡	
军官屯垦一队、二队						祥泰裕	540			祥泰裕改名永安堡			
五原县	军官屯垦三队						董国隆	175	威远渠				

解放前后绥远省 农业改进所概况

周汝治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初冬，日寇侵犯绥西各地后，便盘踞五原城。绅士田喜亭当了汉奸维持会长。一九四〇年春，傅作义光复五原后，即下令逮捕汉奸田喜亭。在押解途中（郝进桥）就地镇压。不久绥远省政府即将田在世成西的庄园，及他的全部土地和财产，没收归公。就在这个庄园的基础上，于一九四〇年，正式成立了绥远省农业改进所（以下简称改进所）。任命农林处专员张立范为所长。这是一个省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下设农业组、林业组、畜牧组、会计室。所最高技术职称为技正，由李纪担任。他负责全所里科技工作，并兼任农业组组长。农业组内有技佐宋廷弼，技术员张亨业等。林业组由技士赵玉成担任组长。畜牧组组长由技士李殿祁担任。组内有技术员李光考。会计室主任刘文耀。会计员燕致中。秘书为所长以下

最高行政领导，由王涛担任。秘书下设人事干部张象威，文书薛成修，还有雇员二人专管缮写。办事员王仲魁，负责杂务。以及与下属各单位进行联系等。所内还设有国民党第十五区分部，由人事干部张象威担任区分部书记。全部正式职工约五十人。

改进所将田喜亭直接经营的六百亩土地，作为所内试验和生产用地。其余三千多亩土地，仍由原佃户耕种，设一个人管理和收租。改进所的下属单位，在份子地设有奋斗农场，由张守禄任场长。场内有管理干部和工人约二十人。农场本身耕种数百亩土地，由佃户租种，农场收租。在永安堡附近还设一个畜牧场，派技术员李光考负责。畜牧场曾引进并繁殖过荷兰牛，美利奴羊，安哥拉兔等良种家畜。林业方面，下设四个苗圃。第一苗圃在现临河市东门外（即巴盟林业研究所）。由技术员卢永祥负责。第二苗圃在邬家地（五原县复兴乡西效五星处），派技术员张亨业负责。第三苗圃在五原县西门外，由技术员邬堃负责。第四苗圃在原安北县西南郊的塔布村，由技术员刘××负责。这四个苗圃，是三十年代绥远省建设厅设立的。它们的位置都在沿黄河北岸。距离黄河较近的靠村镇的地方。其原意是为在沿黄河北岸营造护岸林提供树苗。后因黄

河沿岸没有专管造林的机构，没有实现。改进所成立后，这四个苗圃便交给该单位管理。每年春秋造林季节，政府号召各机关、学校、乡镇以及农户植树造林。这几个苗圃，对当时河套的林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改进所进行过有关各方面的试验和研究工作。农作物的品种选育方面：曾用系统选育方法选育出“临河六十八号小麦优良品种。”“狼山四百六十二号”、“米仓二百五十五号糜子优良品种”。这些新品种，一直到解放后很长时间，在农业生产中还大面积推广应用。它们在河套农业生产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培育果树方面，所内设立了果园。占地约五十亩，果园引进并栽培了杏、桃、海棠、李子、梨、苹果、葡萄等树种，填补了河套地区果树的空白，也为现在河套果树园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

蔬菜园艺方面：曾进行过多种蔬菜的引种试验。蕃茄（西红柿）就是从那时才引进种植的。我记的当年西红柿，果实累累，色彩鲜艳，非常好看。当时人们摘下一个，咬一口便呲牙咧嘴，吐而不食。那时人们不习惯西红柿的怪味，也不懂得炒菜熟食，尽是被咬烂而扔掉的。后来人们才逐渐习惯食用了。

那时在大顺成（陕坝北）设有中美合作训练所。美国人带来一些蔬菜和瓜类的种子，也交给改进所试种。蔬菜类中，有一种樱桃萝卜，状如核桃大小相似，红色球形。春季播种后二十五天，即可结果。还有一种蔬菜，名叫“甜菜”，形状大小似蔓菁，皮里皆是红色，味甜，切成细丝，不作其余任何处理和调制即可作冷盘，只可惜没有留传下来。

瓜类里有一种西瓜，花皮，小红子，名叫“地克森皇后”。现在夏季市场上有时还可看到这种西瓜，但因多年种植，已经串秧了。还有两种甜瓜，一种叫“蜜露”个较大，皮黄色稍厚，容易储藏，很象现在人们叫做冬瓜的甜瓜。另一种叫“香甜”，就是现在的“华莱士”瓜。改进所种的较早。后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中国，也带来这种香甜瓜种子，所以人们才把它叫做“华莱士”瓜了。

试种甜菜：一九四四年曾在份子地农场种植甜菜数百亩，生长良好。含糖率很高，很适宜河套种植。当年秋季即开设了绥远省甜菜制糖厂，张立范兼厂长。实际工作的由中央工业部聘来的三位工程师傅××、罗煦逸、侯敬民负责。当时缺乏机械设备，大部靠人工操作，可以制糖，质量不好，出糖率只有百分之十左右。味道也不正

常。一九四五年厂址迁到五原。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后，机械化制糖才迅速发展。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绥西的军政机关，全部迁回归绥（呼和浩特）。改进所也随着迁回。接着成立绥远省农林处张立范任处长。后农业处改为农业厅，张任副厅长。世成西便改为农林处下设的农事试验场。

一九四九年又改为“绥远省立第一农民试验场。”李纪为场长。呼市南郊五里营为第二农事试验场。五原县东门外原屯垦农事试验场划为世成西第一农事试验场的五原分场。一九五一年，世成西总场迁到五原分场，改称“绥远省五原农事试验场。”世成西改称工作站，由张亨业负责。

一九五二年五原农事试验按照其他省的先例，每省只设一个场，将五原试验场和五里营合并，称为“绥远省立农事试验场”。一九五三年以后即归到河套行政区和临河县管理，改为地方机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作者 =

页数 = 2 8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